特別合刊

全球策略信息

第十卷第四，五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5

通向復蘇之路

通向復蘇之路

chinese.larouchepub.com

全球策略信息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全球策略信息

第十卷第四，五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通向復蘇之路

導言：入主白宮的下屆美國總統對中國的重要性 *4*
公開信 *6*

1 我們需要一個處理危機的總統 *7*
1.1 一個稱職總統的必要條件 *10*
1.2 創造與選擇一個偉大總統 *13*

2 戰略問題 *17*
2.1 民族－國家的蘊育和誕生 *19*
2.2 實際利益 *27*
2.3 古典藝術：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30*

3 關稅和控制：核心選民 *38*
3.1 農業等值價格 *39*
3.2 農民與勞工 *44*
3.3 方法問題 *50*
3.4 保護性關稅 *52*

4 新時代的結束 *55*
4.1 新時代：一個戰略問題 *59*
4.2 核武器、亨利·基辛格和世界政府 *62*
4.3 經濟和道德 *66*
4.4 核武器和新時代 *73*

5 外交和經濟新政策 *80*
5.1 什么是相變？ *80*
5.2 相變：艾爾·戈爾和“長期資本管理”組織 *84*
5.3 對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選擇 *86*
5.4 歐亞大陸橋：對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回應 *88*
5.5 發展美國與歐亞大陸的伙伴關系 *92*

注釋 *95*

導言

入主白宫的下届美國總統對中國的重要性

今年 5 月 7 日，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的轟炸。事發之后，圍繞在中國人民腦海里的一個緊迫問題就是“誰是美國政策的制定者？”是那位在今年 3 月份中國總理朱熔基訪問美國期間倡議建立中美“戰略伙伴”關系……的克林頓總統呢？還是美國政界中一直努力通過制造虛假報告來把中國描述為新的對手的反華政治勢力呢？這個嚴峻的問題使中國人民更加擔心下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這種反華趨勢在美國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那將對中國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由于全球金融體系危機已經從根本上無可挽救，這場以 1997 年 10 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的全球性危機，目前正進入它的總危機的最后階段，毫不夸張地說：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全世界的命運將取決于誰將是下屆美國總統。衆所周知，自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強，美國是想要加入英美共同體帝國，仰仗其經濟、軍事上的優勢在世界各地謀求霸权，同時把英、美共同體以外的世界各地，視為其新殖民地？還是將發揚其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革命傳統，明確地提出反對英帝國的政策和野心。正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美國開始作為一個主權共和國來制定其外交政策，并加入了以尊重主權為原則的世界民族國家的行列。

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利用其全面的技術優勢來阻止其他國家去實現他們的目標；還是利用他們的科學技術知識來幫助不發達的國家，特別是幫助那些南部的國家去克服它們的落后狀態？所有這一切問題都明顯的與誰將是下一屆美國總統有關系。林登·拉魯旭目前是民主黨中第三位正式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其他的兩位分別是副總統高爾和比爾·布雷德萊。高爾所得票數與日俱下，因此他當選為下屆總統的可能性幾乎是零。而布雷德萊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因此，他從本質上是無法找到克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解決方法。那么，中國人民又是如何看待小布什的呢？中國人民應該從最近小布什回答如何對待臺灣海峽危機的問題上，來判斷他的未來政策。在最近他回答一旦臺灣海峽危機轉為兩岸冲突時，美國是否會使用武力來解決？小布什回答他將同意美國使用武力來攻擊中國大陸。只是在他那驚慌失措的父親和伯父給小布什打完電話的二小時之后，小布什才改口說，他也主張美國使用武力阻止臺灣獨立。

作為民主黨人的第三位總統候選人，林登－拉魯旭已經投入其畢生的精力去分析當今世界金融與經濟體系所存在的嚴重弊端和不公平性。同時他又致力于實現建立一個公正的，嶄新的世界經濟　秩序。早在 1975 年，林登－拉魯旭就提議通過建立一個國際發展銀行來取代當時已經腐朽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他所提議的國際發展銀行（IDB）主張把發展中國家所欠的高利息債務轉變為低利息的長期貸款。這些長期低息貸款主要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如果國際發展銀行的計劃能够得以實現的話，就有可能每年把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幾千億美元以投資方式或技術轉讓方式用于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的建設中去。

建立國際發展銀行的提議已經從不結盟運動成員國家得到了非常積極的反應。拉魯旭的大部分思想都寫入了 1976 年 8 月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舉行的不結盟運動成員國會議的最后決議中。前圭亞那外交部長弗里德、威爾斯于 1976 年 9 月

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具體要求。今天、弗里德、威爾斯成了拉魯旭的好朋友和堅定的政治上支持者。

衆所周知，不結盟運動中的85個成員國并不能實現它們的正義要求。相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提出了不得人心的更加苛刻的還債條件。西方國家以為，它們這樣做就會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

在今后的幾年里，拉魯旭和他的同志們將努力工作，為世界不同地區提出非常具體的發展計劃。其中包括為全部非洲設計的“基礎設施發展計劃’和“工業化計劃”。為中東設計的“綠州”計劃，印度的 40 年發展計劃，亞太地區的五十年發展與建設藍圖。此外，還有1989年之后東歐地區的重建計劃。該計劃是以“巴黎－柏林－維也納”大三角生產基地為核心的東歐重建計劃。最后就是拉魯旭 1992 年提出的著名的建設“歐亞大陸橋”的宏偉計劃。

在過去的幾年里，拉魯旭的這些計劃在全世界範圍的會議和演討會上提出過，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拉魯旭先生的周圍，接受了他的思想。這些人不僅形成了一個全球規模的運動，也從拉魯旭重建世界經濟計劃中看到了解決目前世界危機的方案與辦法。在中國，拉魯旭的思想日益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

毫不諱言的講，選舉下屆美國總統將是全世界命運的決定因素。同樣嚴峻的問題是在2000年大選結束之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最后瓦解很可能就要發生，很有可能今年就發生。這一切都取決于拉魯旭在美國的影響是否能够擴大倒足以讓克林頓總統采取積極的措施來重新組建一個新的不萊頓森林體系。

關鍵并非僅僅是林登拉魯旭一定要在2000年11 月當選為美國總統。鑒于目前緊迫的戰略局勢，那一天至今仍很遙遠。真正要做到的是就在今年內，拉魯旭競選活動必須在美國政治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只有這樣，美國才會積極地支持建立一個新的金融和經濟秩序。

拉魯旭不屬于那些只是根據選票多少才來制定自己政策的政治人物。拉魯旭本人就是一個創造思想的偉人。他堅信如果美國人民放弃他們的偏見和錯誤想法，并很快學會以古典的人文主義方式思考問題的話，美國是唯一有機會改變世界格局的國家。對于歐州文明來講，當然美國也屬于歐州文明的一部分，古典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很相似于中國古典的儒家思想。

在歐美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的古典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例如：美國革命本身就是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智慧指導下的一場旨在明確反對英帝國的理念和價值觀的復興運動。15 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曾在歐洲各國引起了廣泛的反應。它的目的就是反對14世紀的迷信和荒誕的偏見。18世紀，著名詩人哥特或爾特一尤發拉姆·萊興和著名哲學家墨斯一孟德爾森都對所謂啟蒙運動的壟斷地位進行了成功的斗爭，為德國古典文化的復興打下了基礎。到了席勒，貝多芬和哈姆勃特兄弟時，這一古典文化運動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頂峰階段。

因此，中國人民可以想象的到，象拉魯旭這樣一位偉大的導師和聖賢，如同中國的孔夫子一樣，參加2000年美國總統的競選就一定能够在當前世界危機和動蕩中給予美國人民正確的思想并改正它們的錯誤想法。

如果拉魯旭先生能够成功的當選、他那為21世紀的設想、將有機會得以實現。在這個設想中，建設歐亞大陸橋是整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核心。拉魯旭在政治方面主張尊重地球上所有國家的主權、并致力于復興所有文化的優秀部分。拉魯旭為21世紀所提出的高瞻遠矚的設想，將預示着是一個人類文明復興的新的里程碑。它將使整個人類和社會變得比已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美好！

1999 年 8 月 3 號

Helga Zepp-LaRouche

國際席勒學會主席海爾尕·拉魯旭

通向復蘇之路

林登・拉魯旭

公開信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日

羅斯福總統在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危機狀況下重建民主黨，現在也是我們重建為我們核心選民服務的民主黨的時候了。題為“通向復蘇之路”的這份報告中提出的各種觀點都反映在民主黨2000年總統初選的競選綱領之中。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這份報告主要是針對危機四伏的一九九九年最初數月而提出的政策建議。這份報告正開始在國內和國際上廣為散發，它既是為民主黨2000年的選舉搖旗吶喊，也是就今后幾個月中將對我們國家各個政黨和我國友邦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問題而做的公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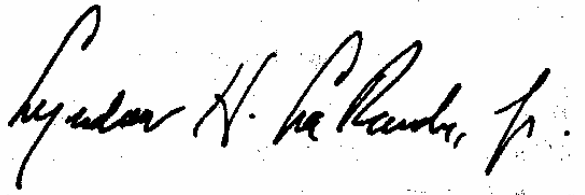
你們中的多數人對這份報告的初始反應或許是將之認為是政治競選運動中的一朵非同尋常的浪花。你們中的一些人或許還會錯誤地認為這份報告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加于人。但是，當你們讀完整份報告之后，你們會同意報告的觀點，認為只有這樣的報告才透徹地分析了當今大衆傳媒和當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領導人廣為散布的危險的政治虛構神化。你們中的多數人將會認識到，其中部分人已經認識到，其他人也將很快認識到，現在正是需要我們拋弃長期以來廣為人們接受的錯誤概念，拋弃所謂“又是一場政治”的錯誤認識。我們必須面對不斷深化的國內危機和外交政策危機所帶來的真正問題。

如果你研究歷史，你會同意世界正進入一個最捉摸不定的時期，不僅對我們國家來說是這樣，對全世界來說也是這樣。目前的這場危機，以及很快將會來臨的更嚴重的危機，將伴隨我們數月，甚至數年。也許會像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一樣，目前已經暴露出來的世界危機，其影響將需要今后十多年的時間才能消除，根據現在的估計，或許要到2008年十一月的大選才能解決。

我可以確有把握地對你們說，在今后數月之中出現的頭等大事，不僅是我們一般大衆料想不到，而且就連相對敏捷的政治人物也料想不到或不願思考。在今后數周或數月之內，這些問題將迅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只有粗心的白痴才會對之視而不見或干脆否認。

為此，我真誠地希望我們大家拋弃有毒的謠言幻想，認為只有不值得當選的戈爾副總統才能將我們黨的旗幟和政治綱領帶入二十一世紀。

在此，我謹向我的民主黨同胞們，向關注我們的共和黨人和獨立黨派人士們致以我真誠的敬意。



林登・拉魯旭

1. 我們需要一個處理危機的總統

我從一九八〇年開始就競選我們民主黨的總統提名人，現在我又再次積極地參與競選。我已經就此目的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登記。在登記之前幾個月我就發出預言：從一九九七年十月開始，世界將落入不斷惡化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最終階段。正是這一危機在過去四分之一多世紀里使世界淪入崩潰的邊緣。我反復警告說，從一九九七年十月開始，這一危機的最終階段將波及全世界，極其嚴重地打擊美國經濟。

正如我所警告的那樣，這一致命的危機在一九九七年十月爆發。自那以后，雖說有官方發表的虛假樂觀報導，世界危機繼續惡化，一次又一次地將處于絕望之中的人們那一點點幻想粉碎至盡。今天，那些蓄意瘋狂捏造的所謂“復蘇”報告仍然不斷從處于絕望之中的世界各大銀行流出，深受危機打擊的西歐、日本和美國政府也與之一唱一和。在未來數周之中，金融危機將更加令人可怕。就像西歐一樣，華盛頓和華爾街將會遭到毫無準備的滅頂之災，因為在一九九八年最后一個季度里，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之類的政府官員和銀行家都咬緊牙關，在顯然可以預見的下一波金融風暴面前打腫臉充胖子，拒不動作。這一風暴就在今年的第二周開始降臨。

在一九九八年的十一和十二月間，美國政府官員和華爾街與西歐資本一道，傲慢地宣稱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是一金融天才，反復聲稱“經濟基礎是健全的”，“復蘇指日可待”等等。對之我持异議。這場危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格林斯潘之類的美國、西歐和日本的中央銀行家和商業銀行家不想拯救人類文明，而是掩蓋他們的喪心病狂。因此，我認為格林斯潘是一個蠢貨，他不斷地使用短期通貨膨脹手段來挽救華爾街。考慮到這些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在危機的每一關頭都將采取愚蠢之舉，我預言最嚴重的危機將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很快到來。這一金融風暴正在降臨。本世紀最嚴重的金融風暴就在我寫這篇文章之際醞釀生成。

我最喜歡的詩人雪萊的著名長詩的結尾唱道：“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遠嗎？”我的回答是：“也許不遠，但是我只有在你們的幫助下才能實現這一天。”

當今世界上各種政治危機的基本事實是：只要目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存在，不斷深化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就將繼續惡化。在這一體系之下，即便是曇花一現的短期經濟復蘇也不會出現。這一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腐朽體系將被消滅，要么是由我所具體設想的、也是克林頓總統應該在一九九八年初秋就推行的新體系所取代，要么是在前所未有的國際金融經濟崩潰中被徹底埋葬，讓人類文明倒退到新的“黑暗世紀”。

當今世界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危機，有軍事冲突，有戰爭威脅，但產生這些危機的根源是繼續推行這些國際貨幣政策、金融政策和經濟政策。美國、英國和其它大國從一九七一年八月危機以來，就一直推行這些災難性的政策。除非這一趨勢得以糾正，美國今天所處的局面是毫無希

望的。如果一個總統候選人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就還没有回到真實的世界中來。

這就是我在競選中隊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所持的立場。也許人們會認為其他競選總統和高級職位的人將持有同樣的觀點。不過，只有他真正這樣做，才具有資格領導這個國家度過即將到來的危機。

因此，我在最初向聯邦選舉委員會進行登記時把我的競選綱領定為：立即行動起來恢復世界經濟。恢復的方法是立即回到戰后直到一九五八年期間的貨幣、金融和國際貿易關系政策上來。這些政策為戰后的美國、日本和西歐所采取，而且經過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因此，我確定以“拉魯旭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為我現在的競選名字。

我選擇這樣的名字是為了遵循美國政治經濟體系這一經過檢驗的歷史先例。當今最為人們熟知的這些美國體系的先例，是羅斯福總統采取的恢復經濟措施。我們必須像當年的總統一樣，立即采取這些措施來防止金融危機把美國拖入絕望的境地，拖入那種連我們的政府體系也無法幸存下來的深刻和持久的經濟崩潰之中。

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這些復蘇經濟的措施與最初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密切相關。這一體系當時包括的內容也是我們今天必須采取的，這就是：一、匯率相對穩定；二、實施基本的保護主義政策，如 1）大力發展經濟基礎設施；2）控制資本流動；3）控制匯率波動；4）協調國家的基本關稅政策，以保護和發育每一參與國基礎工業部門的就業。

我在一九八〇年民主黨總統競選中就以最強烈的語氣警告過，在那之后我又反復警告過，今天我將再次警告說：如果我們想安全地步出這一現在已經完全暴露出來的二十世紀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們必須廢除我們國家和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在尼克松總統一九七一年八月恐慌之后采取的激進變更政策和我們國家的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回到漢密爾頓－凱雷－李斯特－克雷－林肯體系的成功政策上來，即回到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政策上來。我們必須廢除那些與美國體系背道而馳的貨幣主義變種，如“自由貿易”、“放松管制”和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因為事實上正是這些政策直接導致了最近三十年中在美洲、西歐和世界其它地方爆發的所有重大經濟問題及其相關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廢除過去三十年間采取的政策，立即回到三十年前在我國和其它國家獲得成功的政策上來。

在任總統克林頓的職責，是毫無遲疑地迅速糾正這場全球金融經濟崩潰。他必須有勇氣并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采取一些初步的激進措施，以停止經濟崩潰的蔓延。2000 年的民主黨大選必須為這些緊急行動提供政治支持，這些都是現在身限困境的克林頓總統必須馬上采取的行動。與之同時，我們民主黨必須為下一屆民選的新政府，行政部門和國會，為我們合衆國的每一個州的政府，總結和改善這些緊急行動措施，并用之于今后幾十年中。

任何總統候選人，只要他不支持這些補救措施，都不值得當選。即便是副總統戈爾所謂的“新世紀”主張也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任何候選人，無論是否是“新世紀”之人，只要他不回到傳統的經濟政策上來，不大力發展公共工程，不采取保護主義政策，不維護國家主權，一句話，如果他不采取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初期階段采取的那些國家政策，他就將成為不僅是對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威脅，而且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威脅。我就是下一屆總統的最佳選擇，因為我將帶領我們國家采取這些補救措施，而且我也能够向你們推薦準備采取這些措施的其他有識競選之士，無論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

不可否認，從我競選民主黨的一九八〇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算起，距今已經快有二十年了。我年齡增大，而且最近又身有疾患。我正在盡速恢復健康，以承擔擺在我看來面前的責任。然而，在今天尚没有一個候選人像我那樣有資格擔當美國總統。當我們觀察一下在美國和世界其它地方不斷深化的道德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戰略危機，我的特有條件就顯而易見了。

所以，如果你們認真考慮我在前幾次競選中提出的問題和建議，并且將我的預言和建議采取的行動與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主要競選人物做一比較，那么你們就可以發現，無論是過去還是今

天，合理的結論只有一個。最近幾十年來，我一直是當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預言家，而其他那些持反對意見的經濟學家們一般說來都是錯誤的。除此之外，我在過去二十年間提出的經濟政策和其它方面的政策，現在看來是切中危機困擾的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實質問題。而直到今天，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大眾傳媒大肆吹捧的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學家、銀行家和政治家的經濟政策卻不是這樣。這些人中有阿登納、戴高樂、路德維格·厄爾哈德（Ludwig Erhard）、德意志銀行的赫爾曼·阿布斯（Hermann Abs）以及德意志銀行的殺手約爾根·龐托（Jurgen Ponto）。最糟糕的是德國德意志銀行最后一個具有清醒頭腦的行長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一九八九年被情報機構的職業殺手暗殺之后出現的那些瘋子。一九八九年的暗殺為當時英國撒切爾夫人和法國密特朗的政策實施去除了一大障礙（1）。自那以后，西歐各國就再也没有采取過清醒的經濟政策。

從其它方面講，只要没有更為適宜的候選人，我就是目前能够履行下屆總統功能進行一般決策和戰略決策的唯一人選。我的特殊才能正好能够在解決美國和世界當今面臨的最嚴重危機方面大派用場。這些才能包括：獨特的知識結構和穩定的情感，多年積累的豐富歷史知識和政治素養，在這些方面還没有任何一個候選人能够相提并論。從歷史角度看，我就像1932-1933年間的羅斯福總統那樣，有條件擔當總統來解決當今的危機。我也可以與一些當年的政治家不相上下，如領導戰后德國醫治戰爭創傷的阿登納，帶領法國的戴高樂總統。我的這些自我評價并非自欺欺人，在當今美國的總統競選中，已没有什么溫良謙恭而言了。這只是在關鍵證據之下所做的必然結論。

至于許多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對我參與競選的所謂“不利”之處，我要指出的是，你們中有很多人已經感受到龐大宣傳機器和我們聯邦政府某些肮臟部門長期以來對我的抵毀。這些機構包括司法部中最墮落的部門和所謂“秘密情報組織”中的其它部門，他們同心協力抵毀我，使用惡毒的反宣傳和肮臟的秘密伎倆，距今已有二十六年了。正如克林頓總統的一位前重要謀士指出：“他們絕不會為他〔拉魯旭〕平反昭雪…否則他會立即成為一個民族英雄…他們決不會讓他具有成為潛在〔總統〕候選人的能力。”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你們相信在我的名字上有什么“污點”，或者我的競選有什么“不利”之處。大量而充份的公開證據已經證明，對我進行毀名、起訴和其它肮臟勾當地整個行動，其根據全是政府和主要傳媒一手炮制的假罪名、假報告和對我人格的污辱。另外，美國司法部和聯邦法院的騙子們也參與了這一欺騙行動。那些堅持說“拉魯旭身上也有缺點”的人倒是應該好好檢查一下他們自己的良心是否優陰暗之處。

以事實為根據而不是靠道聽途說行事的民主黨人、工會領袖和其它領導人將會認識到，對我的抵毀實際并不會對我目前的競選造成政治上的損害。這是一塊勛章，是那些害怕和仇恨我的人和我們國家的敵人給我帶來的榮譽。他們只能依靠這些低劣的手法來消除我在美國和世界上的影響。毀名宣傳和秘密法律行動并不能損害我競選高級公職的資格，相反，這只能揭露他們不遵循真實和公正的原則，拒不認識產生蒙蔽他們自己的這些謠言和偏見的政治根源（2）。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我們對抵毀名譽的事情忽略不計，我們仍無法回避年齡和健康狀況這一問題。但是，你是擁護一個能够贏得這場戰爭解除對我國的威脅的的人呢，還是一個像木頭木腦的戈爾副總統那樣的三軍總司令？前者就像太平洋戰區司令和指揮仁川登陸的麥克阿瑟將軍一樣，后者則像輸掉戰爭的冥頑不化的喬治·麥克勒蘭（George McClellan）將軍一樣。我認為，只有一個方式可以解決我的年齡問題。這就是找到一個各方面條件具備另外一個候選人，使之參與競選兵選舉他。

但在目前，尚没有一個合格的其他候選人正是宣布參加競選。已經宣布參選的戈爾副總統在精神和道德上并不適合擔任總統，從根本上說是選不上的，因為民主黨的核心選民中很多人并不支持他。如果民主黨要提名戈爾做候選人，那只能說明民主黨準備將總統讓給共和黨的某個布什后代。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迅速采取一些行動，

我們也許可以選出合格并有希望贏得大選的其他人。在這期間，我必須繼續以合格候選人的身分參與競選，至少要堅持到另外一個適宜人選產生之日。

我下面將談談選擇、招募、培育和確定這一合格候選人所必須采取的步驟。

1.1 一個稱職總統的必要條件

我們民主黨人和人民大眾又一次到了憲法要求我們選擇一位總統的時候了。要想知道一個稱職總統在當年羅斯福總統遇到的金融、經濟和戰略危機條件必須具備什么樣的條件，關注事態嚴肅認真的選民必須把我們今天的各個候選人與過去最偉大的總統做一比較。這樣的探究應該是初中學生在美國歷史課中就解決的問題。不幸的是，我們的公立教育事業和大學教育在最近三十年間大大退化了。過去在所有受人尊敬的中學中，美國歷史課是一門必修課。今天，美國．歷史已經從中學教學大綱中刪除了，代之以剪報報導和電視播放的道聽途說。但是，事實畢竟是存在的，只是需要你去查找。

“美國總統”真正含義應該是這樣一份名單：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門羅、約翰·昆西·亞當斯、亞伯拉罕·林肯、威廉·麥金萊、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許還應包括被暗殺的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和約翰·肯尼迪。我們還必須在這名單中加上我們這一獨立的憲制共和國的主要創始人本杰明·富蘭克林。

除了那些在宣誓就職不久之后就去世的總統而外，我們大體可以把剩下的總統分為兩類：一是有缺點，因為他們要么是在關鍵問題上被嚴重誤導，要么是智力平平，無所建樹，或者兩者并存。因此，那些在其他方面有天才表現的總統如托馬斯·杰佛遜和詹姆斯·麥迪遜，他們是有缺陷的總統，在富蘭克林去世之后受到如阿爾伯特·蓋拉丁（Albert Gallatin）之流的外國勢力的控制。另外一類總統完全就是無賴，如範·布倫（van Buren）、波爾克（Polk）、皮爾斯（Pierce）、布坎蘭（Buchanan）、西德羅·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柯立芝和喬治·布什。

正是那一名單上的總統和富蘭克林以及具備總統素質的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和眾院議長亨利·克雷（Henry Clay）一道，為我們的總統們提供了維持生存的智慧血液，使我們的總統制延續至今。但在目前，我們已經到了總統制也許會被摧毀的地步。當前這一英國議會式的政變不僅威脅到克林頓總統，而且是直接針對着我們獨立宣言和憲法的主要精神。

將我列出的優秀總統和缺陷總統或平庸總統還有后兩類總統中的險惡總統的領導藝術做一比較，我們應該清楚“美國總統”的含義是什么，應該清楚我們選舉進入總統辦公室的人應具備什么素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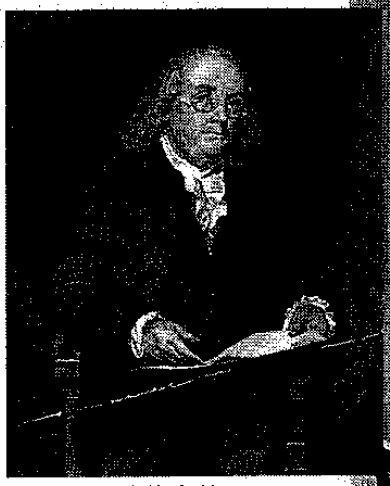
從那些優秀總統的著作和工作中，我們需要着重注意他們的世界觀和領導方法。首先，他們也像我一樣，始終認為現代歐洲的傳統是反寡頭政治的共和傳統，如同德國的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所說的那樣，這一傳統的根源是與現代歐洲對希臘文明的發揚光大。這些基本原則決定了政治領導藝術，而政治領導藝術的基礎則主要是每一男人和女人都是造物主形像這一常識。這種有關人類特性和自然權利和義務的普遍觀點也為偉大的摩西和基督教門徒約翰和鮑爾所反復強調。

總的說來，偉大總統的憲法原則和政治家藝術，主要是確定主權國家—民族共和國為最適當的人類組織形式。在他們看來，這一國體與土地貴族、金融寡頭和自命永恆的國家官僚機構所主張的那些統治傳統背道而馳。所謂隨意法的概念就是在本質上反映出地中海社群和歐洲社會的傳統國體，這一國體的實質是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淪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可憐犧牲品。在我們偉大的總統看來，人的性質是每一人均為造物主自身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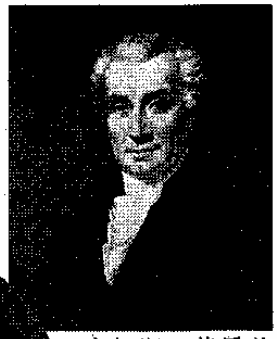
這是共和國體下可以合理確立的自然法則，也是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發動獨立戰爭，建立我們共和國所依據的道德和法律原則。正是這一原則在當年占了上風，盡管對洛克思想也有過短暫而有限的讓步，但最終是建立了一個在聯邦憲法

好總統的“短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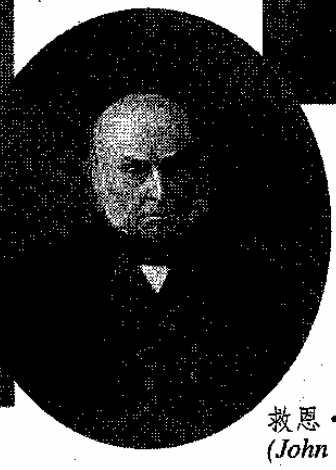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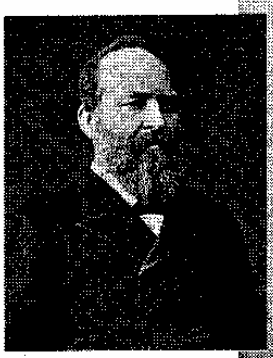
本杰民・佛然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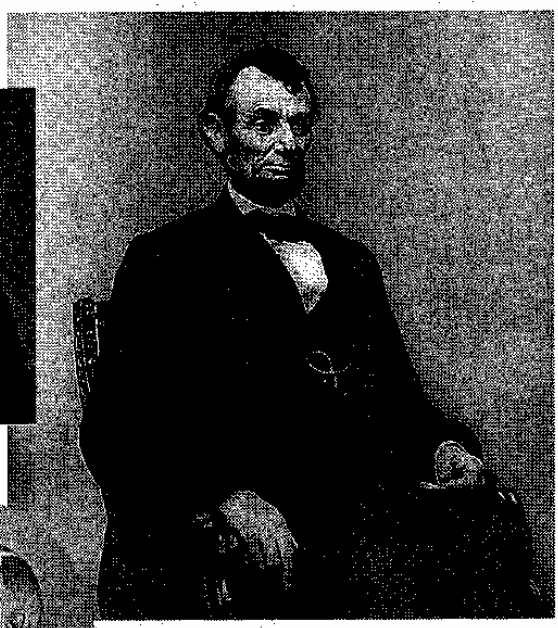
杰姆斯・莫恩若
(James Monroe)



救恩・昆司儀・阿達穆斯
(John Quincy Ad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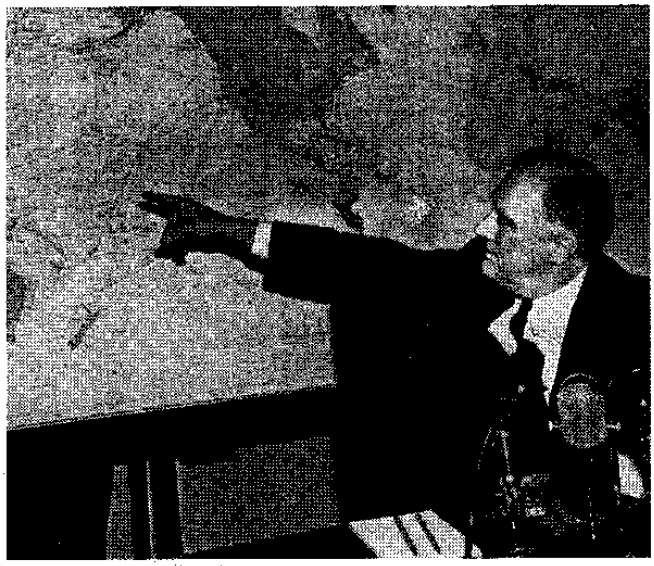


杰姆斯・伽費尤德
(James Gar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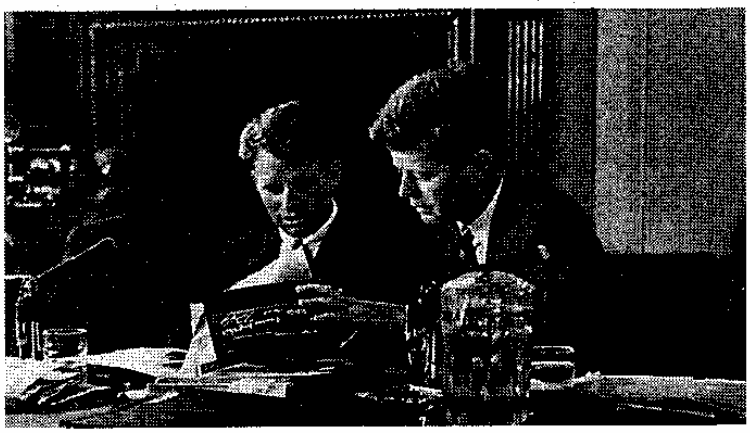


亞伯拉罕姆・林肯 *(Abraham Lincoln)*

威廉姆・麥肯因利
(William McKinley)



佛然克林 *D*・若瑟崴爾特 *(Franklin D. Roosevelt)*



江恩 *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右邊，
與其兄弟若伯特 *Robert)*

“一個“短名單”範疇的‘美國總統’之範例應該意為，我們必須在此名單上含蓄地加上我們國家獨立及共和國憲法的主要締造者本杰民・佛然克林。”

基礎上的共和國。所有其它的法律和政府形態都必須服從于這一至高無上的自然法則。這一自然法則以明確的語言和蘊涵的含義禁止各種形式的人間歧視。如果這一歧視的基礎是生物性區別，如國家或宗教的异同，種族來源的异同，或所謂低收入階級的天生劣等性，一概在禁止之列。這些形態的歧視，不僅與事實相背，而且也是對造物主個人的污辱，是不可容忍的道德淪喪。

洛克含蓄地認可奴隸制是一“產權”，來布尼茲對之加以嘲弄。來布尼茲的觀點正是反映出我這種自然法的概念。來布尼茲認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生權力。他的這一原則是1776年獨立宣言的奠基石。同樣，來布尼茲和我的自然法觀念，也以“普遍福祉”的語句反映在我們聯邦憲法的序言中，而憲法則是我們這一聯邦共和國內實施的所有真實法律的基礎。

與那些道德淪喪者不同，也與那些象西奧多·羅斯福和威爾遜這類在本世紀中曾占取總統職位的人不同，我們的偉大總統與我們共和國締造者站在一起，他們明白，我們國家的所有成就的根源來自于歐洲，來自于古希臘到現代的所有歐洲偉大的思想家，如來布尼茲。

不可否認的是，到今天為止，除了相對短暫的戴高樂總統的第五共和國之外，西歐一直是生活在議會制的國體之下，或者是生活在從理念上與議會制如出一轍的赤裸裸寡頭政治之下。比如，在議會制下，寡頭控制着政府，在寡頭控制的國家中，政府會在某種預先策劃的議會政變下很快被推翻。比如，英國的金融寡頭操縱着英聯邦和美國走狗，他們就策劃了一場針對克林頓總統的英國式議會政變。

當然，如果不是歐洲偉大的政治家、詩人和科學家，美國的歷史成就將微不足道。這些偉大總統和其他杰出領導人的著述反映出創造、發展和捍衛我們共和國的這些領導人思維發展的過程。這些領導人中包括：馬薩諸塞州的溫特洛普（Winthrop）和馬塞爾斯（Mathers），賓夕法尼亞州詹姆斯·婁干（James Logan），紐約的羅伯特·杭特（Robert Hunter），和弗吉尼亞的亞力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

比如，公開承認自己是英國外交代理人的基辛格也坦白，說托馬斯·哈伯斯、約翰·洛克、亞當斯密、杰雷米·本森、梅特涅親王或卡斯特雷里勛爵等的精神思維與我們的偉大總統們完全不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從一個身患小兒麻痹症的殘疾人發展成本世紀最偉大的總統，其過程就反映出這一特殊的思維發育。羅斯福總統正是在那感染發作的最艱難時期，通過對我國文化傳統的研究，從智慧和政治上得到新生，從而最終離開了病床，成為羅斯福總統。

概括而論，正如柏拉圖在其<<共和>>一書中所說，社會中人的性格主要有三種，這不僅存在于普通大衆之中，也存在于統治者和有勢力影響的人之中。過去和今后的美國總統也必須以此衡量。

一、道德淪喪、智力低下的性格可見于托馬斯·哈伯斯、約翰·洛克、杰雷米·本森、約翰·斯圖爾特·米爾等人的著作中，也可見當代存在主義者如尼采、馬丁·別爾伯、馬丁·黑德格爾、卡爾·杰斯波斯、漢娜·阿登特、金一鮑爾·塞特雷等人的著作中。這些人的世界觀根源是哲學家所說的“快樂－痛苦”或“肉欲”感官認識，其動力或許是所謂“七大罪孽”。這是柏拉圖稱之為最低級的道德。以性為主題的特別檢察官和超級色情文學作家肯尼斯·斯塔爾就是如此。

二、最高級別的思維和動機是哲學家們稱謂的“同時永恆”。這一概念的意思是：對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和我們大家來說，我們個人的有限生命的意義和真正個人利益的意義在于我們在人類中承上啟下的有益關系。我們從人類歷史中得到真理，又將我們的真理傳給未來的人類。明白這就是我們個人利益所在的人，將會把所謂生命有限的個人利益置于把真理發揚光大的個人利益之下，從而保障我們未來的繁榮。

這第二種性格，是社會中成效卓著的領導人的素質，是在嚴重危機時刻需要的素質，是柏拉圖稱之為“哲學王”的高級政治家的素質，是為我們造就了偉大總統的素質，也是幫助這些總統的高級幕僚所需的素質。

應該以這樣的個人利益來調動我們共和國的總統，尤其是在這種嚴重危機的時刻，偉大總統并不是在所有時刻都要散發出這樣的素質，但在需要他們做出決策的關鍵時刻，他們都能够挺身而出。正是這種后天培養的成熟和長年養成的決斷能力，使為數不多的偉大總統在關鍵時刻脱穎而出。這些能力是將身處世界危機之中的下屆總統所必不可少的。

三、介乎于這些道德低下與道德高尚之間，有一類但丁<<神曲>>一書中所描繪過的那種人。他們知識淺薄，因而良知受損，他們在死亡時必然會將其善行留予后人，而且必須學會戰勝自己，從而不讓對感官情感的崇尚占上風，不至于為了追求快感和避免痛苦而讓自己去促使邪惡的行為，或忽略道德上的義務。

以這三個標準來衡量，前國務卿基辛格無疑是屬於道德最為低下的人，他是一個令人憎惡的人，是處于但丁<<神曲>>中尤格利諾伯爵的那種人。與之相較，偉大的美國總統屬于這三類人中道德高尚的人。像杰弗遜那樣的總統則屬于中間一類人物，因為他從一個思維敏銳的政治家退化到二流人物。從歷史上看，在某些情況下，一個政治家可以高出他在尋常情況下的等級，同樣，也可能在敗壞條件的影響下，短暫或永久地淪落到他尋常等級之下。關鍵的他運是。目前這場危機所能接受的總統，只能是那種可以上升到最高等級的人。就像歷史上的偉大總統一樣，當局勢迫切需要這種最高素質時，這位總統便會以其政治家的藝術，挺身而出。

1.2. 創造與選擇一個偉大總統

這就要求我們要尋找能够與我匹敵的下屆總統候選人。我們如何才能發現那些可以發揮最高水平從政藝術，能够在我剛才描繪的挑戰中獲勝的候選人？他們在這么有限的短暫時期如何掌握那些必要的素質和知識？

這樣的候選人當然不能是從一片白板中產生，就像具有傳奇色彩的布拉格之拉比一樣，把戈蘭姆培養成為他做事的人。近期事態已經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創作一個戈蘭姆式的總統（或者，創造一個內塔尼亞胡那樣的以色列政府首腦或托尼·布萊爾那樣的英國政府首腦）。選擇接受培養的總統候選人，必須是已經具有成為合格總統候選人而必需的潛能。我們必須開始對潛在總統候選人的條件下定義。

即便一個人具有當選總統的潛力，他光是服從大眾指示是不够的。我們不能象教時裝模特或雪茄店的布第安人一樣，教一個人做總．用這樣的方法是無法產生具有生命力的總統的。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總統，而不是成為被總統顧問所包圍左右的白痴，這位未來的總統必須像林肯那樣，扎根于大眾之中，從實踐中學習，能够制定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策。這就是我們的下屆總統一旦進入白宮所必須具有的特質。

要想具有這樣的特質，必須以某種特殊的方式處理平衡民主黨不同核心選民的利益，尤其是平衡處理工會與農民這兩大核心選民集團的利益。我們知道，這兩大集團在過去一直是為其自身利益而互為指責，比如在降低農民補貼問題上的交鋒。依靠所謂"交換思想"和"互相體諒"一類的天方夜譚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我們必須找到一種真實而公正的爭端解決辦法，一種對所有合法選民均公正的解決辦法，而不僅僅是妥協（3）。

這種解決合法核心選民之間利益冲突的辦法，不能依靠現實主義的妥協，必須是基于柏拉圖<<共和論>>中蘇格拉底對希拉塞瑪丘斯和格勞康的駁斥。真正能够解決爭端的方法是以真實為基礎，而這恰恰是美國司法部近年以來很少采用的方法。由于我們熟悉這些合法的選民集團，同時也了解全社會的合法利益，知道他們之間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找到這一真理，找到這一真實的解決方法，就像尋找合理的普通物理真理的科學家一樣，以忘我的奉獻和認知能力來尋找這一真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種調和分歧的妥協，而是共同找到某種行動的準則。這一準則，決不是要某一選民集團放弃他們的實際利益，而是要求這些利益集團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公正和深刻的方式來理解他們的自身利益。

能否解決這些自身利益的冲突，是公民衡量政府官員如總統的領導能力的標志，尤其是在目前這種危機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我將在文中的幾個例子說明道德和真實的政治領導能力的原則。工會與農民院外活動中的爭端正是我們探討這類選民集團利益矛盾的好題目。

在闡述了一般原則之后，我將集中討論一下我所提議的2000年競選機制。如果我們在選舉中推出其他的候選人，我必須發揮重要的催化劑作用，向該候選人提供幫助，指出若想有效解決關鍵經濟問題和重大外交問題所必需的特質，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將決定目前這場不斷深化的世界經濟政治危機的發展結果。換句話說，我必須起到哲學家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大家”的作用，像智者一樣，引導適宜的年輕候選人成為一國之首。

在我看來，確定候選人的適當方式是立即確定一批成熟和具有領導潛能的領導人。總的目標是：從現在開始，在我們中間，確定一些最真實公正、具有豐富政治經驗與能力的領導人，從中再產生一兩個隨着選舉的臨近而出現的希望之星最後再從中造出一個眾多合格領袖中的帶頭人。以前，我們采用的是一種根據公眾輿論進行選擇的過程。我們必須對這一過程施加三方面的限制，盡管這一過程已經為民主黨內堅持富蘭克林·羅斯福傳統的核心選民組織所采用。

一、首先，這一候選人在法律和國家政策方面的思想必須遵循柏拉圖 << 共和論 >> 中蘇格拉底提出的真實與公正的原則，必須拒絕由 << 共和論 >> 中的人物希拉塞瑪丘斯和格老康代表的那類反派標準。這一特質也是門徒鮑爾（Apostle Paul）所說的思維本質。鮑爾也像蘇格拉底一樣，為蘇格拉底在 << 科林斯人 >> 第十三章中使用的希臘文術語“agape”下了定義。鮑爾將這一原則與基督教義等量齊觀，他認為，所有其它自稱的個人道德如果缺乏真實和公正，都將是一派空談，與欺騙不相上下。清除現有法律制度與條文法中的腐敗，在我們的法制體系中恢復真實公正的原則，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任務，因為我們這一處于危難之中的共和國的復蘇，將取決于這一任務的完成。

二、這一候選人必須是以理性原則控制自己。這一候選人必須崇尚并實施理性思維像科學家一樣，以此理性思維而達到認識世界、解決難題、發現真理的彼岸。他必須在政治和社會事務領域采取同一發現真理的方法，采取這一科學發現者在發現科學真理中所遵循的方法。候選人的這一特質，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在解決核心選民自身利益冲突時所必需的特質。

三、這一候選人必須在這兩個特質的主導下，有能力解決我們聯邦行政部門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暨恢復實物經濟，奉行主權民族一國家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我和其他人看來，克林頓總統有一些人所周知的個人弱點，他的知識和智力，遠遠高于大多數近代總統。雖然在歷史和對外關系方面他比大多數總統所知豐富，但是他顯然忽略了經濟的基本要素，這使他易遭攻擊，在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容易受到錯誤的影響，并且這也是他任總統至今麻煩不斷的主要原因。下屆總統必須能够把經濟政策與社會和外交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也是克林頓總統和所有近年來得及總統所缺乏的。

就這些方面和其它方面而言，我是最佳的總統選擇，可以極大的懸殊比分擊敗其他候選人。但是，除了無法避免而外，我們最好不要把我們的希望全寄托在一個人身上，不管這個人如何優秀。我們應該在民主黨2000年總統提名競選中有多個嚴肅認真的候選人。目前，作為一個候選人，我也將是一個按統一標準接受檢驗的人，這一標準適應于所有或許有資格競選高級職位的候選人，無論他是競選總統，還是競選需要有高超治國藝術的其它職位。如果這些目標實現了，我的作用將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作為下屆總統將不再是必不可少了。

我呼吁的第一點是，設定一個舞臺，邀請所有其他有資格的候選人參加，在這一舞臺上，表白他們自己。現在，先忘掉那些有關政治的愚蠢而不道德的觀念，在這方面我們聽到的太多了，如現在已死去的羅伊·科恩（Roy Conn）難兄難弟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所謂“第三條道路”應該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有資格的候選

人應該與全美公民中的核心選民，如工會工人、農民、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退休人員、以機被公司操作人員為代表的企業家、醫生、科學家和工程師，一道交換意見。我們將在羅斯福總統重建的民主黨內，建立起核心選民組織。我們不會就先前曾有過的觀點進行辯論，但是我們將就我們國家必須采取的政策進行爭論。我們不會高聲呼喊一聲標語口號或的東西，我們將在一起思考。

當我們走上這一舞臺時，我們應當承諾，我們和我們的民主黨必須深入到基層，尤其是那些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來就一直是抿住核心選民的人。我們必須依靠這些核心選民，以他們為有決心使國家復蘇的政治大軍。我們不應該依靠對我們有利的媒體宣傳，我們應該依靠這支政治大軍浩浩蕩蕩地開進投票站。

與這一步驟和程序相比，那些喪失原則的危險方法和戰術不過是一堆廢鐵。目前，這堆廢鐵正掌管在厄爾·弗朗姆（Al From）任頭目的民主黨領袖理事會手里，非常不幸的是，這一理事會影響頗大。

通過媒體影響公眾輿論而收取到期效果的做法應該拋弃。我們必須回到本杰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的戰時宣傳部長裴因、聯邦主義文件和十九世紀輝格黨所使用的戰斗方法上來。我們應該停止使用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競選辯論”之類的廉價雕蟲小計，因為這類辯論由電子傳媒及其幫凶（多數是編造的民意調查者）一手策劃并操縱的。我們必須確立全國性的政策，像我們國家的締造者那樣，把這些政策帶進投票站。過去三十年內，兜售狗皮膏藥式的政治競選充斥全國的政治舞臺，我們再也不能讓選民們經受這樣的侮辱和欺凌了。我們必須回到原有的選民政治活動上去，即由核心選民在集團的組織領導者率先與候選人一道，就人們關注的問題及政策進行討論。

由傳媒操縱競選的騙局應該結束了。這些傳媒大多數由我們的敵人所擁有，如華爾街和英聯邦的全球新聞辛迪加。我們不能允許以大約“二十五個字”加以總結。傳媒操縱政治競選之所以必須結束，是因為新聞人員并不思索，而候選人和選民又不允許只認真思考任何問題，因為黃金時間太寶貴了“請將你對我們愚蠢問題的回答精簡，即便問題和回答都没有什么意義。”

競選必須側重于若干基層本黨核心選民組織間不間斷的對話，這是羅斯福的民主黨的傳統。這必須是蘇格拉底的對話，而不是個人意見的辯論。公民不是要辯論，而是就關注的問題和政策進行探討。民主黨的本黨核心選民是勞工、非裔美國人、拉丁美洲裔美國人、老年人、從事科學與工程技術工作的專業人員以及傳統形態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尚未沾染上當今的貨幣主義流行頑疾，華爾街和共和黨極右翼人士，如金格里奇、迪雷、阿梅之流，卻居心險惡地散布這一流行病。

具有廣泛基礎的本黨核心選民的重要性在于：他們的利益恰好代表着美利堅合眾國的重大利益。與之同時，每一核心選民集團必然認識到他們自身的最佳利益也是全國的大眾福祉基本一致的。如果分屬于大大小小核心選民集團的大多數選民們能够在共同利益的旗幟下團結起來，追求大眾福祉這一共同利益，那么，我們的民主黨將不僅能够勝任領導我們國家的重任，而且能够得到公眾的支持，在下一輪大選中贏得總統職位和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

在這里有必要重復強調上面提出的觀點。所謂深入聯系本黨核心選民，不是指安撫些核心選民，不是指采用星期的晨間新聞訪談和其它電視秀之類的文字游戲，不是指喋喋不休的標語口號。這是指候選人與這些核心選民的代表保持接觸，確保政策設計思想是理性的，并使之成為民主黨決策的指導方針。我將在本聲明的下面一段中，給出一些這方面的例子。

選舉的結果必須是：2000年夏天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必須是羅斯福總統的民主黨的再現，是民主黨核心選民的代表的團結勝會，而不是戈爾選民代表的聚會集中。

這一次，我們不能讓所謂大眾傳媒專家來“包裝”候選人。這些操縱高手們對因果轉換過程又真正知道些什么？我所説的因果轉換過程指的是某種政策將從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大眾福祉。一個合格的候選人應該是這樣一個人：由他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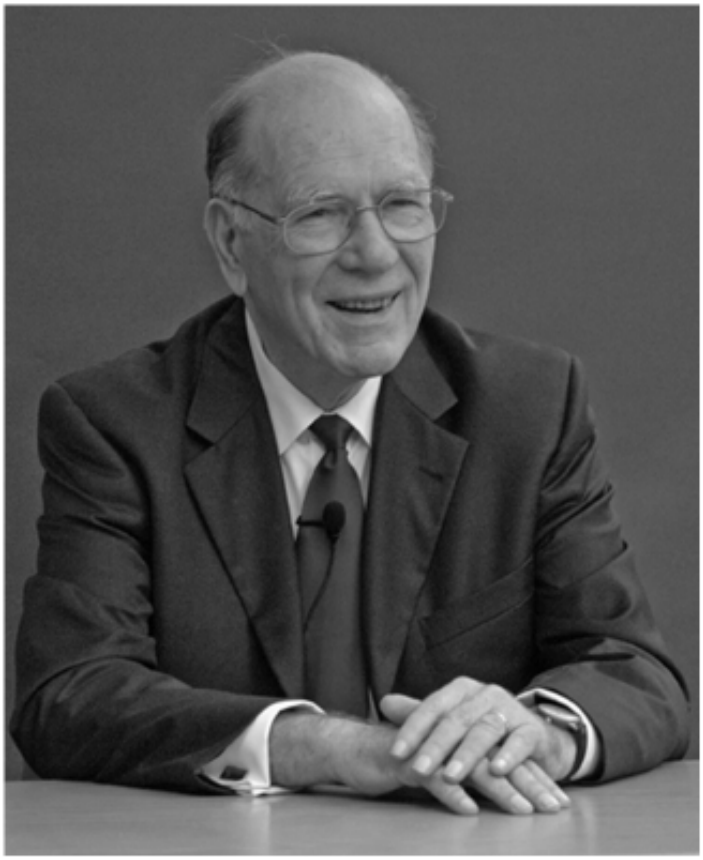
的傳媒代表發出指示，確定問題何在，采取何種政策，以及為何將此政策轉化為選民的理解。所謂“聯絡官”的道德責任不是展示候選人的包裝外殼，而是表達他的內容。如果這一要求將導致一些候選人從一開始就失去其競選資格，那么這對國家，對民主黨都將是一件好事。

如果主要候選人的代表們經常會唔全國各地的本黨核心選民的主要代表，那么結果將是雙方的探討，核心選民代表與候選人的觀點要么是徹底改變，要么是修改多次。與這一核心選民集團的代表在這一場合單獨會談，與另一選民集團的代表在另一場合單獨會談，是無法避免的，有時還很有必要。但是，只有當若干核心選民群體的代表坐到一起討論同樣問題時，討論才能深入認真。

這個問題可以用下述方式來闡述。設想有一個房間，各個核心選民群體的代表集聚一堂。再設想參加會議的人員是工會、非裔美國人協會、拉美裔美國人協會、退休人員利益集團、某些地方的政治人物、某些關注商討問題的專業技術人員，如醫生、某些企業家（最好是從事基礎實物經濟生產的企業家）、一些技能高地專業工程技術人員，一些科學家。擺在與會人員面前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避免會議落入一場盲人摸象似的辯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首要的目標是定義大眾福祉，確定如何實現這一大眾福祉，從而使各個核心選民群體的特殊利益能够通過認真的自由討論而得到保障，而且，這種保障比分別討論各個群體的自身利益更為有效，假如這些自身利益都互相矛盾的話。這樣的集中討論就是我所用的：“自由認真討論”的全部含義。如果讓那些販賣政治蛇油的宣傳鼓動家得以引誘各個選民群體為自身利益而互相爭辯，其實際效果則是，每一群體都將最終同意犧牲自己那狹義的特殊利益，同時也消掉其它群體的利益。讓他們為了芝麻而爭斗不休，最終必將失去西瓜。

只有在這種本黨核心選民代表就國內宏觀政策和外交政策進行探討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够確定誰是具有真正思維能力的政治領導人，誰可以成為總統候選人。由于近幾十年來競選總統的候選人們都是力圖通過媒體來左右輿論，這種具有真正思維能力的候選人真是寥若星晨。



林登·拉魯旭

如果我們發現了適宜做總統的候選人，那么誰將選他進白宮，而不是選某個辛迪加傳媒的產物？有資格做出這樣選舉抉擇的選民在哪里？這樣的選民又如何產生？只有在候選人與各核心選民群體的代表一道進行自由認真討論之下，這些問題才能得到回答。正是這種基礎廣泛同時又持續不斷的自由認真討論，正是在必然進入投票站的各路大軍之間的這種討論，可以提供解答這些問題的現實答案。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引入這一機制，以保障我們國家擺脫目前正困擾我國政治體制的那些超級危險。

2. 戰略問題

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你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你真正能够透過現象看本質，能够認清當今的重要問題。你只有更深入地認識事物才能做到透過現象看本質。你應該從近年來得及痛苦教訓中學到一些東西了，就像南北戰爭之前林肯總統說的："大多數人"在"多數時候"完全受騙。

你在判斷當今這非同尋常的全球危機之前，必須首先認清一些更深層的問題，一些你也許完全蒙在鼓里或者是有意忽略的問題。在我看來，你必須認真考慮那些常常為人忽略、但卻非常關鍵的問題。這些問題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當今多數公民都不很清楚，但無疑是對國內和國際戰略問題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僅對當今的美國有意義，而且對世界各國也有影響。

你們所處的時代，正是美國和世界各國在二十世紀中遇到的最嚴重危機的時代。就在我撰寫這份聲明的時候，在過去這十五個月中間，你們大家都生活在本世紀最嚴重的世界性危機的最終階段。在這一時刻，世界金融體系將崩潰。如果西方四國集團政府（這包括美國政府）繼續執行一九九五年以來所奉行的政策，那么，即將崩潰的就不僅是整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而且，也將包括主要國家（包括美國）的實物經濟。

一些國家，如非洲，正在從政治地圖上不斷消失。與之同時，美國、以色列、以及美國的武器販子不斷把新式武器推入這一地區，加劇混亂。僅以非洲為例，這一混亂局面在最近幾年就導致了六百多萬人慘遭屠殺。他們不僅是死于這場新的希特勒式大屠殺，而且是死于非命。更多的國家將在近期或不遠的將來以同樣或類似的方式消失掉。我們正處在局部戰爭和全面戰爭的連鎖反應的爆發邊緣，甚至是在中東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導彈的交鋒。

十五個月前在這一危機的最終階段爆發之際，你們中的多數人也和你們的政府和華爾街一樣，認為在全世界發生的這些重要事件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不定應該允許它們存在。那些關于經濟復蘇的愚蠢幻想到處比比皆是，并且作為民意測驗的結果經常出現在媒體中你們仍舊生活在一個夢幻的世界上。你們中的多數人仍舊認為中心問題是本地或個人的問題，或者是受主要媒體的欺騙，相信這些媒體所界定的主要問題。在你們中間的多數人看來，現實仍舊相距遙遠，甚至是好像在另一個宇宙上一個不包括你的宇宙上。你們就像是乘坐"地球號"空間飛船的旅行者一樣。能够引起你注意的問題只是你個人在這空間飛船上的問題，如自己的位置離主桌有多遠之類的問題。至于這一空間飛船向何方運行，你只是視若無睹，或者，為了方便和舒服起見，你干脆把這些問題置之腦后。

正如我在本聲明的開場白中所指的那樣，這場危及本星球的災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功。它是在過去四分之一多的世紀中逐漸積累形成的。正如我在很多年前多次告訴你們的那樣，目前這場危機的基本性質是可以預見的，它的惡果在多年之前就可以避免。我就是預見到這危機中的一個人，并且我也公開和反復地報告過我的預見。實事證明，我是正確的。當時在我向你們指出這

一點時，你們没有采取行動。你們只是關心自己的事情，集中力量處理本地所面臨的問題，或者是關注其它你們對之有興趣的事情。現在，這場我曾經預見到的危機發生在我所預見的時間。最後一點是，你們現在將被迫去關注這些根本的問題，這些你們多年以來一直拒不理睬的真正問題。

這些問題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前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唯一的區別是，經過這么多年之后，你們突然被迫關注這些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底問題。與這并不是因為世界突然之間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你們多年以來一直忽視的問題突然爆發出來。

你們現在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就是那些原有的政策問題。自從現代民族國家在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葉建立以來，這些政策問題就一直決定着現代歐洲文明國家的機遇或危機。只有抓住了這些中心戰略問題，只有認識到這些問題的互相作用，我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和有效地解決當今現代化生活的關鍵性具體問題。

你們不能在像過去那樣生活下去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面對現實的時候了。讓我們共同攜手起來，回顧歷史，面對未來。

寫到這里，我必須説明下面這一觀點。這一觀點雖然是在嚴格謹慎的科學推理基礎上得出的，但這并不等于是説這僅僅是一種學術觀點。明白我在這里提出的觀點，對真正認識今天所謂的實際政治問題至關重要。

正如我在本聲明的相關章節中指出的那樣，現代文明的最初定型大約始于十五世紀中葉的歐洲。這一下時期我定為是 1438-1492 年。這一歷史分期是準確的。如果對這一十五世紀歐洲文明的意義缺乏準確的理解，也就無法真正地明白在此之後六百年中歐洲和美洲的發展。這段時期的歐洲出現了法律和社會關系方面的劃時代的根本變革，這些變革不僅反映在各國之內的事務上，也反映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正是這一變革導致了封建社會和現代文明社會的分期（4）。自那以後，所有人類面臨的重要問題，都產生于維護這一變革的人和反對這些現代文明原則的人之間的斗爭。像那些力主彈劾克林頓總統的人，就是這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

看到這種關系，對認識現代社會與死灰復燃的封建傳統之間的斗爭十分必要。這些封建遺老的代表就是美國國會內的“新邦聯”少數派，以及新近暴露出來的與這“新邦聯派”結盟的戈爾副總統的華爾街同謀（5）。只有看到這種關系，才能真正認識產生希特勒納粹的根源，才能真正認識“新邦聯主義”及其華爾街盟友時對我們國家造成的國內國際危機，才能認識到產生這些危機的根源及動因。

認識到這種封建傳統在我們美國聯邦身上打下的烙印，可以使一些有時候迷惑不解的公民完全明了戈爾副總統的軍事政策，知道他的嘍羅委員會在轟炸伊拉克問題上的軍事政策為什么不僅是一個道德和戰略錯誤，而且，即使從軍事上講也是完全胡鬧，甚至是一種愚蠢的犯罪或神經失常（6）。設想一下，軍事冒險的支持者，把這一嘍羅委員會看成是一幫愚蠢透頂并帶狂犬病的封建走狗，在百老匯或好萊鎢的舞臺上東竄西跳。想想他們身披的外衣雖然現代，但外衣之下掩蓋的正是野蠻的習性和顛狂的大腦，只不過是不合時事地穿上了二十世紀末的現代軍事和非軍事偽裝而已（7）。

討論美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國內國際政策，必須要強調一點：導致美國建立的根本原因，就是十五世紀中葉發生的劃時代政治變革。由于歐洲國家自身在當時無法接受民族－國家的性質，無法解決由之而來的憲法問題，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就只能落到北美洲身上，結果就是獨立戰爭的及其后建立的立憲聯邦。

盡管爭取獨立和建立聯邦的所有思想基礎都發源于歐洲，其后又出口到美國，但是歐洲國家未能像美國一樣徹底擺脱封建寡頭政治的約束。美國的成功首先是在 1775-1789 年間的建國成就，其后又是在林肯總統領導下于是 1861-1876 年間進行的改革。正是這樣的成功，使很多國家模仿了美國的制度，成功走上現代農－工民族－國家共和制的道路。這樣的制度，首先產生于美國，基礎就是 1861-1876 年間的政治經濟發展。

由此可以說，不僅是美國模式產生于是1775-1876年間的歷史性發展，而且，“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定義也產生于此。在這方面，以本杰明．富蘭克林和林肯為代表的北美進展，展現出在法律和政治經濟方面的最高成果。這一未曾間斷的發展始于歐洲，最早是佛羅倫薩理事會，然后是以十五世紀后期出現的路易十一世的法國和亨利七世的英國為代表的第一批現代民族－國家。其后，在十六世紀期間，在歐洲已幾乎完全不可能實現這一劃時代的變革。崇尚改革的歐洲領導人開始把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變革輸往大西洋的另一端，讓北美享用了這一機遇，而在當時的歐洲卻放弃了這一機遇（8）。

這并不是西奧多·羅斯福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等人所提出的臭名昭著的所謂“拓荒牛模式”。這些劃時代進展確定了“美國例外”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美國例外”中展現的歷史課題，對我們的今天解決當前美國和世界所面臨的危機有着關鍵的意義。我剛才所指出的這一點，是在當前這樣的世界危機和美國危機情況下擬定卓有成效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我們的國民應該至少是對這些問題有一點基本認識，至少是要看到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對美國如何在這場方興未艾的危機中如何幸存。下面的段落也許會被人們誤認為是一些技術上或學術上的論斷。我們必須看到，只有認識到這些歷史事實，才能認識到美國是如何產生的，認識到美國如何在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展到今天這一地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共和國的領導人希望你們的孩子學歷史，而不是讓老師在中學中廣泛而論所謂“當前事件”。

2.1 民族－國家的蘊育和誕生

稍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要讓人民能够判斷人類文明為何能繼續存在下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標準，這些標準就是圖一中顯現出的三組曲綫圖。把封建時代、羅馬時代或更早時期的人口增長和預期壽命增加的速度與歐洲十五世紀中期的人口增長與壽命增加狀況作一比較。然后，再觀察一下1439-1440年佛羅倫薩理事會之后開始向全世界輻射的政治與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世界人口增長和壽命增加狀況。

設想一下，生活在今天北美的你，突然之間退回到預期壽命和百分之九十五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只有十四世紀中葉的社會里。設想一下，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將會如何。或者，把歐洲在一次世界大戰或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死亡人數與歐洲在創立現代主權民族－國家之前的封建時代的歐洲人口銳減和生活水平蜕變的情況做一比較。比如，可以與1239-1350年間（9）歐洲黑暗世紀、法國百年戰爭和英國玫瑰戰爭時期的狀況作一比較（10）。即便是最簡單的事實比較也證明，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體制的建立，是人類誕生以來最大的人文進步。難道你們願意聽戈爾副總統的話，把所有這些成就拋弃嗎？

向你們自己提一個問題：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中的哪些特點，是為人類帶來如此巨大福祉的原因？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必然也是制定國家和全球政策的關鍵要點，因為制定這些戰略必須要確立什么目標是值得追求的。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考慮兩個既互相聯系，又各有區別的問題。

第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是認識到共和體制與寡頭社會之間在法律原則方面的根本區別。即便是那些自認為有文化的人，在讀到這份文件之前，會真正地明白封建社會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基本區別。我們必須要把這一問題弄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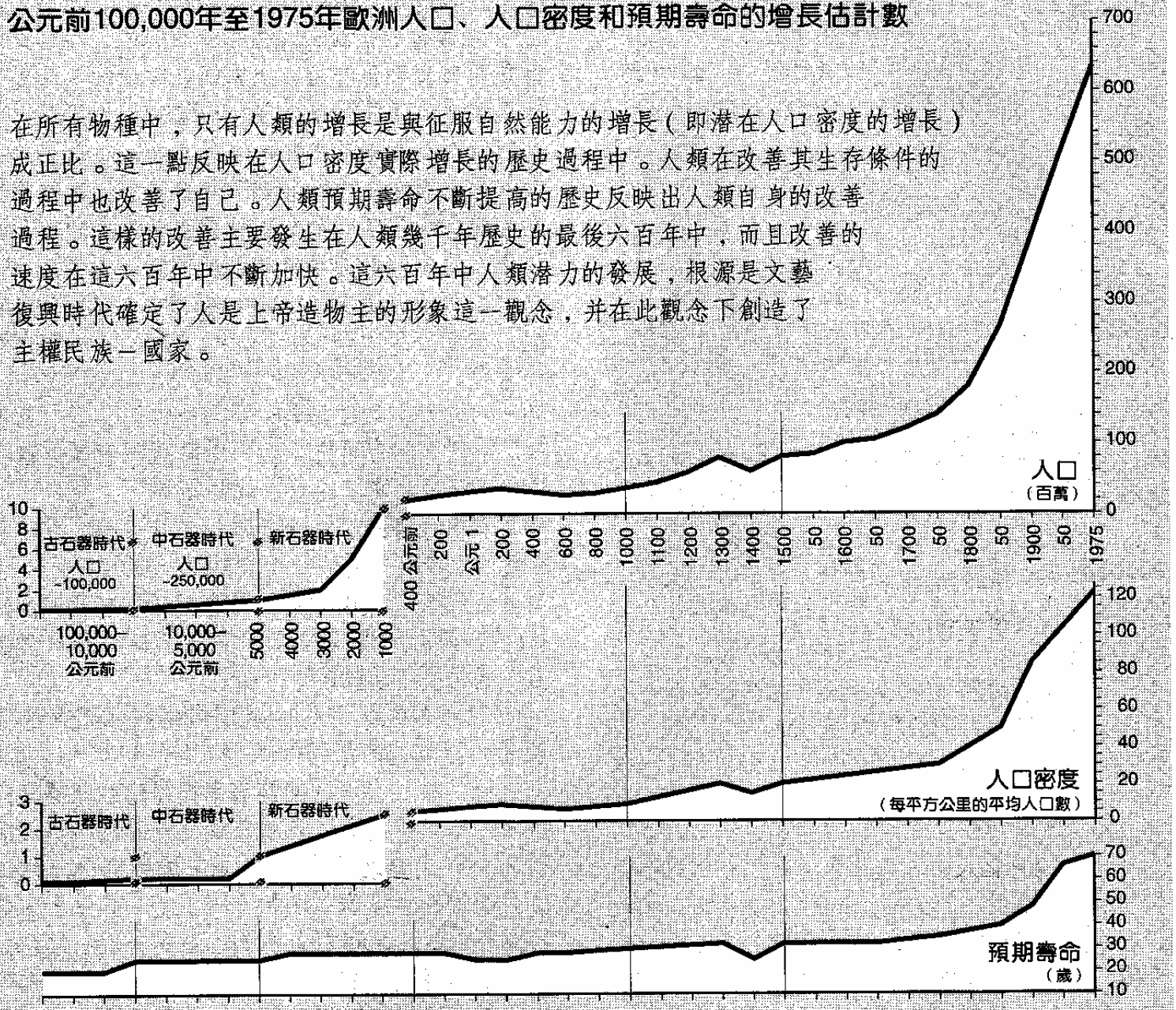
第二個問題是認識到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黃金時代所曾經用過的原則，正是這些原則徹底改變了十五世紀之前的歐洲，在壽命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帶來巨大的進展。因此，我們第一是要考慮現代民族－國家共和制與封建社會的原則區別，第二是要考慮那些使主權民族－國家優越于任何其它社會形態的政策原因。

從歷史角度看，1438-1492年間出現的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來得有些突然。不過，這也是一個漫長歷史發展過程的結果。單在波斯征服之前，希臘的城市－國家憲法就曾問世。這一歷史進程后來又經歷梭羅領導的雅典改革。希臘古典文化的出現更是加速了這一進程。希臘古典文化產生于雅典，是人類文化的一大劃時代進

圖1

公元前100,000年至1975年歐洲人口、人口密度和預期壽命的增長估計數

在所有物種中，只有人類的增長是與征服自然能力的增長（即潛在人口密度的增長）成正比。這一點反映在人口密度實際增長的歷史過程中。人類在改善其生存條件的過程中也改善了自己。人類預期壽命不斷提高的歷史反映出人類自身的改善過程。這樣的改善主要發生在人類幾千年歷史的最後六百年中，而且改善的速度在這六百年中不斷加快。這六百年中人類潛力的發展，根源是文藝復興時代確定了人是上帝造物主的形象這一觀念，并在此觀念下創造了主權民族－國家。



所有地曲綫圖都是基于按照現存學校人口統計的標準統計。沒有一個比陳述需要更多的精確性；然而，其比例可能區域性地變平，或者甚至暫時地，重點地變化，由于需爲調整而降低所有的有効數字，無黨派數值的質量和曲綫的比例。來源：爲人口和人口密度，緯廩·勘騍靨斡糴和鬏蔥耜，爲研究壽命和多種歷史統計的世界人口歷史地圖。

比例記錄中斷和變化。

步，其代表是斯各帕斯（Scopas）和普拉塞托斯（Praxiteles）的雕塑，索佛寇斯（Sophocles）和埃斯其魯斯（Aeschylus）的悲劇，以及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思想影響。導致歐洲十五世紀建立第一批民族－國家的關鍵因素，是基督的傳教以及他的繼承者們的努力。基督教的傳播在當時遍及地中海文明各國，傳播使者是柏拉圖古希臘文化的代言人。正是這種基督教的傳播，使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在十五世紀的歐洲首先出現。

這些基督教的傳教者們未以柏拉圖的語言及思想作為其傳播基督教的哲學媒介（11）。通過這一方式，在基督之后的歐洲文明的建立過程中，融入了這樣一個政治原則：以基督教對摩西主義的詮釋，每一個人都是造物主自身的形象，

表1
人口比較：歐洲與美國，1400年和1900年

	1400	1990	1990
	歐洲	歐洲	美國
預期壽命	-30	76	75
嬰兒死亡率 - 每1,000出生嬰兒一歲之內死亡數	200-250	7	10
人口密度 -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	20+	103	26
識字率 - 總人口中識字人所占的百分比	5-10%*	97%	97%

*對這一時期的識字人口數沒有係統的統計，當時歐洲各國之間在這方面差異很大。但是，只要不是對識字下嚴格的定義，那麼拉丁文的掌握率（在當時爲5-10%）可以作爲人口的識字率。當時，掌握拉丁文的基本上是貴族，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實際上處于牲口的境地。

這一詮釋表明了自然法的原則。這種基督教的自然法　概念有兩個互相獨立的意義：

1、所有的人，無論男女，在造物主之下都是平等的，不允許有任何偏見性的人為區分，即我們今天所說的不允許有“種族、出生國、階級或宗教”原因的歧視。

2、每一個人與造物主的相似并不是表現在個人生理特征上，或者是能够使動物之間加以區分的其它生理標志。與造物主的相似是在于人具有可以發育的認識能力，即通常所說的“神聖”的理性火花，從而使人絕對高于其它所有物種。這就是可以通過后天教育提高的認知能力，正是借助于這樣的認知能力，人們可以發現普遍真理和其它規律，并且可以在人們的大腦中復制這樣的發現。這種人生而具有的認識潛能，就是“理性”。

因此說，基督教最先闡述了某些政治原則，即人與造物主相似，所有人不僅生而平等，而且具有某些平等的自然權力。因此，社會的秩序必須適應于每一個體都是造物主形象的概念。這一基督教的原則，是歷史上最初對政治平等和自然法的真正詮釋。任何肯定法或習慣法均是在理念上與這一原則相孛，無論是傳授或實踐這些習慣法，均是與最基本的法律權力原則背道而馳的。

盡管有一些個別的例外，但是自基督誕生以後的頭十四年期間，這一原則在歐洲的各個政治社會中并没有得到普遍而有效的尊重。但是，也正是這一基督教的原則，后來又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深入歐洲文化。這種激勵的結果，最初可見于反對奴隸制的斗爭。聖·奧古斯丁的影響可見于恰樂瑪（Charlemagne）文明秩序的出現，巴黎阿布拉德（Abelard）、托馬斯．阿基納斯（Thomas Aquinas）、但丁和平民兄弟會的影響，是這一世紀中著名的里程碑，由社會中知識超群的少數人創造。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了十五世紀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如佛羅倫薩理事會，路易十一的法國重建，在亨利七世統治下英國對玫瑰戰爭創傷的醫治。這些后來的成就就是長期醞釀而成的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反映。

因為我們集中關注的是近幾千年來地中海地區，歐洲和美洲的變遷，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出一些具有廣泛意義的理論。

以此為目的，先讓我們再次探討一下柏拉圖在<<共和論>>第二卷中所提出的法律原則。在這部著作中，有關法律性質的概念分歧可見之于虛構人物蘇格拉底、希拉塞瑪丘斯和格勞康之間的爭辯，這些歧見對了解當今法律問題至關重要。代表這些根本歧見的一方是基督教關于人類特性和自然法則的概念，另一方則是特拉塞瑪丘斯的法律傳統，它從本質上講是封建獨裁的非理性概念，其當今的代表人物就是國會中的“新邦聯主義”幫和道德敗壞的希克曼·埃溫斯（Hickman Ewings）與肯尼思·斯塔爾（Kenneth Starrs）及其特別檢查官工作組。蘇格拉底代表着自然法，而希拉塞瑪丘斯和格老康則代表着低級而非理性的所謂“實證法”。特別檢查官工作組和衆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多數派中的詭辯者、種族主義者和色情狂們正是這一低級“實證法”的超級代表人物。

在這方面，柏拉圖及其先驅悲劇作家們均遵循着他們的杰出先輩雅典梭倫的思維路綫。柏拉圖在談到希臘治國經驗教訓中的法律問題時，提到一種不僅見證于希臘社會，而且也見證于古雅

典的埃及盟國及其敵國泰爾及美索波塔米亞的經驗。正是柏拉圖談及的這些法律及其相關問題的思維，給予十五世紀歐洲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創始人們以思想上的啟迪。這一由梭倫和柏拉圖開創的法律發展進程，后來又得到基督教有關人性質概念的補充，從而確定了“戰略”這一術語的確切含義，這一術語正用在我們今天對全球危機的描述之中。

美國和世界今天所面臨的戰略矛盾，實際上與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所面臨的矛盾没什么兩樣。這種根本法律原則上的冲突的社會基礎，是關于人之等級觀念上的分歧。矛盾的一方，如“新邦聯主義”幫，把人類社會從法律上定為有等級之別的社會，矛盾的另一方則是像林肯總統對我國憲法的修正那樣，認為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没有政治等級之分的社會。

1、無論是從神學還是法律的角度看，這種分歧明顯見于這一歷史事實：在歐洲和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古代帝國和封建社會里，將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大衆在司法地位上被定為任人宰殺的牲畜。

2、與封建的法律思想相比，受柏拉圖思想影響的基督教教義則對法律中關于真理和公正的定義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這一定義就是摩西關于人之性質的定義：每一男人女人都是造物主自身的形象，因而生而具有理性的力量，使人類與其它物種絕然分離開來并絕對高于其它物種(12)。

一個社會無論其形態如何，只要其大衆中有大量的人實際上淪為任人宰殺的牲畜，那么其法律前提就是：社會統治階層的特殊利益將由某一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治權力所代表，它將擁有某種隨意的法律制定權力，使之明顯高于社會的其它各階層。這種隨意的法律制定權力，又得到所謂“習慣法”的補充。這樣的法律中没有任何部分具有理性基礎，無論是政治統治階層制定的實證法，或是各種形式的習慣法，無一具有理性基礎。

在梭倫的雅典改革的影響下，柏拉圖創造了一套全面的自然法理論。<< 共和論 >> 第二部就是典範。在這一柏拉圖自然法原則的影響下，經過庫沙的尼古拉斯主教在佛羅倫薩理事會的作用，法國的路易十一首先引入了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這一新的國體。我們將回頭來專門討論自然法問題，但現在首先讓我們看看由實證法和習慣法代表的國體與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國體之間的區別。

在共和制下，國家及其法律的基礎是獨立于國家本身而存在的某種原則。這一基礎就是國家有義務關照它的全民，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換句話說，保障現有人群及其后代的普遍福利。因此，國家無權對其人民實施任何純粹隨意武斷的權力，國家的權力來源于普遍的理性。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種共和制與所謂“社會契約”論毫無共同之處。在這里没有任何契約的存在。國家的責任并不是來自于某種先已存在的契約，政府和法官的責任是必須遵循真實、正確和公正所代表的理性。因此，“誰將最終做出決策”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如何理性地做出決策”。這樣，一個合法的權力機構就具有以理性出發的責任，這樣的責任正是某些法官、檢查官和政治人物所缺乏的。除非為了澄清所要討論的問題時而外，我在這里不打算一一點名。

那么，我們所說的理性又是什么呢？正如柏拉圖在 << 共和論 >> 第二部中對之所下的定義那樣，理性這一術語最初是用于實物科學。

科學實際是一種不斷從謬誤中發展起來的科學。這就是說，如果不能發現某一學科上的最後定論的錯誤，那么就没有科學。科學產生于發現重大謬誤的過程之中。這些謬誤，乍看起來似是而非，尤其是那些對專業人員來說屬于“實體悖論”的謬誤。這種真理與謬誤互相矛盾而斗爭的結果，必然就是導致人們尋求某種經過實踐檢驗的自然規律。這些規律將說明謬誤的所在，并引導我們發現由于先前的知識局限而没有發現的自然規律。

因此，科學就是這種不斷發現的自然規律的集合，這些規律互相聯系，從而形成我們的現有

科學知識體系。判斷這些規律的標準是下面三種證據：

1、悖論存在的證據。這些悖論發展到非有解決方式不可的地步，因為任何演繹推論已經不可奏效。

2、關鍵實驗的證據。用于解決這類悖論的經過檢驗的規律實際上也是可以為當前實驗所證實的規律。

3、人類駕馭和超越宇宙的能力隨着我們不斷豐富我們所發現的規律而不斷提高。

這三個要素使我們要回過頭來看看人類獨特的某些性質即某些低等的物種根本沒有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人類個體大腦的絕對主體認知能力可以通過培育而不斷提高。這種認識過程不是單純的邏輯推理，而是人類的大腦具有認識悖論的能力，并且能够發現并證實可以解決這些悖論的自然規律，這種可以培育的能力唯人類的各個個體所獨有，它有時也稱為“神聖理性之火花”，是每一個體理性能力的集中。這種人類的特質實際上相當于使人類成為造物主按其形象所創造的男人與女人。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個人駕馭宇宙的平均能力的提高，可以通過這種認知過程（即個體的理性）而實現。這表明，個體理性駕馭宇宙的設計要求大自然要接受人類理性認知能力的調控。正如摩西在<<創世紀>>中提出的概念一樣，人高于自然，也高于其它所有物種。　正是這種通過理性而提高人駕馭宇宙能力的社會力量，構成了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基礎。

從實踐上說，國家可以通過兩種主要的相關方式，表明它是否以理性辦事。第一，國家可以抉擇那些有助于提高人類駕馭宇宙能力的實踐活動，如我們曾經提到過的那些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質的活動。第二，社會抉擇個體理性力量的發展，使全體人民架馭宇宙的綜合能力得以提高，并且加快這一提高的過程。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與創造性休閑的改善，則表現出第二類的實踐活動。簡言之理性和科技進步，是同一政治原則的兩個方面，盡管后者似乎直接產生有益的社會效應。

因此，共和制國體的含義就是理性力量的提高。

下面，我們還將專門論述這一問題的物質方面。現在，我們集中討論一下對法律的影響。

我們對寡頭社會的定義是：如果一個社會中大部分人群在實際上淪入受人宰殺的地位，那么就是寡頭社會，如奴隸制社會，農奴制社會和高利貸盤制社會。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就是針對墨西哥勞工和美國公民的高利貸剝削。北美自由貿易區導致工作機會外流，使美國公民的就業和生活水平日益惡化，同時，又利用實際上處于奴隸制的外國勞工。那些從北美自由貿易區獲利的人，實際上就是放高利貸的人，他們的利益如果是在一個道德社會中，將會因為是偷竊財產而被沒收。

如果一個社會把某一類的人群貶級為任人宰殺的牲畜，那么這一社會就有悖于人類的性質和理性。因此，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活動，那么它就像古羅馬帝國、拜占庭和封建社會一樣，是不道德的，而且從基本上說也是非理性的。也像美國的那些奴隸制支持者一樣，是不道德和非理性的。所以，我們應該問：如果說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權力來源于理性，那么，寡頭社會的立法權力又來源于何呢？<<共和論>>第二部中的特拉塞瑪丘斯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清楚的回答。這類國家或帝國的立法權全部來源于一種純武斷、非理性的權力。在這種權力下，人為地把國民置于受人宰殺的牲畜地位并使之永久化。這不僅有悖于理性，而且也有悖于人類的性質。

這種實證法權威的邏輯形態又來源于何呢？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合理的權威。正式引用的權威也是一些神秘莫測的胡言亂語，如托馬斯·哈伯斯（Thomas Hubbles）的<<巨獸論>>和約翰·洛克的<<人類認識論>>。這些理論都與特拉塞瑪丘斯的社會教條一樣，沒有豐富理性。說到今天，如肯·斯塔爾和亨利·海德（Henry Hyde）的衆院司法委員會，武斷的純實證法構成了暴君的所謂法律原則，唯一的差別只是不同時代或許有不同的事例。像英國虛構的<<蒼蠅爵士>>一

樣，他們的所做所為没有一些理性。在這里，只有權力的行使，權力行使的基礎是武斷決定的前提。仔細觀察一下，便可發現，這些前提完全是封閉神秘的。

這就是要求我們公布關于法律原則的關鍵要點。本小節一開始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十五世紀中葉之前歐洲封建體系與公元 1438-1492 年間出現的現代主權民族－國家之間在法律原則上有什么不同之處？十五世紀中葉的變革始自佛羅倫薩的全基督教教會會議，而后又經過路易十一的法國和亨利七世的英國而建立了現代形態的主權民族－國家，最後又經由哥倫布到達加勒比海而完結。哥倫布的發現本身也是庫沙的尼古拉斯主教的通信的結果。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為什么能成為兩種不同社會形態的分水嶺？

正如馮·德·海特（von der Heydte）教授在詮釋這些證據時所説的也正如我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解釋這一歷史事實所指出的，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可以總結如下：

1、在 1438-1492 年歐洲文明史出現的這一根本變革之前，地中海及其毗鄰地區的社會形態主要是具有巴比倫、波斯、羅馬、拜占庭性質的帝國和寡頭帝國社會的繼續，是與大約在 1239-1340 年間的歐洲維爾夫聯盟相關的反民族－國家"全球化"封建主義。

2、在所有這些形態的社會里，絕大多數人都只有任人宰殺的牲畜地位，法律没有合理性，既無真誠，也無公正。立法的權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或掌握在與之類似的人物手中，因為這些人是在統治階級的同意之下而被任命充任那些職務的。皇帝立法的權力來自于特拉塞瑪丘斯的論點，即"法律是權力人物的主觀意志。"唯獨的限制只是帝國的立法權不得違反已確立的習慣法，以避免起義反抗的風險。

3、因此法律中無理性可言，有的只是維護貌似的推理連續性，試圖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命令之間尋求連續性。因此，即便在現代社會，實證法優于自然法的做法總是反映出寡頭傳統的影響，與公正和理性的原則背道而馳。

4、在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下，實證法的地位為公衆福利所取代。在這里，全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繁榮昌盛的目標，是立法的標準，真實和公正是判斷法律的標準。

所以，這樣的原則與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大相徑庭，因為我們的共和國不能既保留奴隸又持有自由。如果没有全民的福利，没有在全國所有地方奉行一種讓全國所有人民享有福利的政策，那么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但卻被誤認為是全民的自由，誤認為是可以保衛所有人權利的自由屏障。

有四個歷史上的事例可以説明這一區別：一是英國大憲章的騙局，二是路易十一的法國，三是亨利七世的都鐸英國，四是從弗雷得里克二世到一次世界大戰凱澤王朝崩潰期間普魯士的改革者。

英國大憲章是許多邪惡的根源，這些邪惡包括了幾百年后駭人聽聞的英國玫瑰戰爭。大地主們在"重建政府"口號下強行讓約翰一世國王同意，國王不是英國領土上主權的代表，而只是在大地主們同意之下行使權力的地方官吏。這并不是對自由的支持，而是封建形式的血腥無序社會。一個民族若采用這樣的社會方式，必然導致自我毀滅。后來，英國又實行了一種與前相差無幾的制度。唯獨的差別是英國成了一個以威尼斯為模式的英荷金融寡頭，而不再是控制約翰一世國王的勛爵們。這種推崇無政府狀態，反對主權統治的寡頭政治，無論是屬于巴比倫時代，或羅馬時代，或拜占庭時代，或屬于任何封建形態的法制，均來源于寡頭主義所固有的非理性主義。正是這種根據個體寡頭和群體寡頭意志而實行的武斷統治，徹底摒弃了社會應有的法制秩序。

這種非理性主義后來在十七世紀的法國成為封建貴族的"世外桃源"。從思想上與世外桃源原則一脈相承的是所謂"自由競爭"的無政府原則。這一原則由推崇封建主義的思想家、重農主義者弗蘭索·奎斯納（Francois Quesnay）提出。亞當·斯密的思想完全是對奎斯納和圖爾加特的模仿，他完全采納了奎斯納的"自由競爭"

的封建主義思想，形成英荷寡頭金融思想家的“自由貿易”概念。

由于這些原因，在封建社會里，或者在金融寡頭統治的社會里，法律均無理性可言。在當今英聯邦國家和美國，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要求有純實證法體系，并且要求這一實證法體系與英語國家約翰·洛克的奴隸主義相適應。正如馮·德·海德特教授所說，在洛克思想指導下產生的這種“自由放任主義”變種，引起英語國家極端地重實證，就像斯塔爾之流一樣，比納粹的法西斯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法國的路易十一在他重建的王國里也曾尋求過某種與封建貴族的妥協以及和他們和平相處，但他將權力中心轉向由“平民兄弟”之類的教育機構培養的城市知識階層。“平民兄弟”后來在十六世紀中葉被封建反動分子所鎮壓。路易十一強調來自于平民和窮苦大眾的知識分子的作用，以法國的大眾福利為立法的理性標準。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法國成為一個主權一民族共和國，雖然它也保留了一些先前的封建秩序。

在亨利七世都鐸王朝統治下，英國的情況也十分類似。歷史事實與共同生活兄弟會培養的鹿特丹伊拉斯謨（Erasmus）及其朋友托瑪斯·莫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一致。亨利八世派人謀殺托瑪斯·莫爾并非因為亨利八世中了威尼斯間諜的美人計，迷戀上安·博林（Anne Boleyn），而是因為代表威尼斯寡頭政治的托瑪斯·克倫威爾利用亨利八世受損的精神狀態，誘使他的王朝進行支持威尼斯的反革命活動，以反對亨利七世宮廷中的共和黨人，他們與法國路易十一世取得的成功遙相呼應。

路易十一世與亨利七世的確代表了主權國家引進真正原則的事例。但路易十一世與亨利七世的繼承者都失敗了，這表明以君主制形式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十分脆弱，美國聯邦憲法的起草者深知國家統治藝術中的這一教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將道德和法律上都比較落后的歐洲議會制與美國比較完善的憲法共和制形式進行對比。我們聯邦憲法形式的創始人清楚地了解這些事例，這在十八世紀美國的歷史文獻中有明確的說明。

與流行的那些愚蠢的傳言相反，歐洲的議會體制并不是產生于實際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制，而恰恰是產生于國家寡頭政治結構，是寡頭統治的一種改良形式。這種歐洲議會享有的特權日漸增多，其原因是他們對民眾要求參與國家管理作出了一些讓步。盡管他們作過一些讓步，時至今日，歐洲議會絕没有超越寡頭政治延續下來的封建君主權位的範圍。實事上，議會政府的體制已日漸無能，無法統治面臨嚴重危機的國家。一旦出現危機，真正起作用的是國家的權力而不是議會的權力。否則，議會體制的權力越是強大，國家就越是無法應付嚴重的危機。在這個時候，議會就會面臨被推翻的危險。

所有議會制政府固有的悲哀狀況在我們美國議會中也有所反映。美國議會日益變得令人惡心，違反憲法，它跟在歐洲議會制后面亦步亦趨。在對克林頓總統進行彈劾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實際上已墮落到了叛國的地步。

在顛覆我國憲法的過程中，這種墮落的行為有兩個主要方面：a）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寡頭及其在國家的代理人，如前所述，其典型代表就是戈爾副總統的那幫密友，腐化墮落、危機四伏的長期資本管理辛迪加。長期資本管理組織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的核心，他們所起的作用正好與土地貴族在封建制脱胎出來的議會中所起的作用一樣。b）他們正極力把美國納入英國女王統治下的英聯邦，就象把豬趕向屠場，顛覆美國。戈爾副總統與長期資本管理組織有密切的聯系，他促使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在觀念上發生轉變，而且推行他所謂的“重塑政府”工程。這一工程實際上受到英國愛丁堡公爵的操縱。

回顧一下普魯士君主政治史上的一些關鍵事件，從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特（Jena-Auerstadt）兩次戰役中的慘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凱澤（Kaiser）的退位，我們就能更加深刻地了解議會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和我的同事在最近的會議和學術著作中對拉扎爾·卡諾事件作過概括。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歐洲軍事家在軍事上分為兩個對立的社會傾向，一派注重騎兵和步兵，他們需要良好的戰馬來訓練新招募的軍官；就象倫敦殘暴的指揮官

所作的，步兵常常進行操練，以便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另一派是以炮兵和工程兵的指揮官為代表。在這個方面，拉扎爾·卡諾是法國軍事天才；格哈德·沙恩荷爾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是德國的軍事天才。出身于炮兵和工程兵的軍官，如在西爾韋納斯·塞耶任校長時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影響極大，他們是軍隊中共和派的核心。西爾韋納斯·塞耶與今天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亨利·謝爾頓截然相反。

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特兩次戰役中，拿破倫使普魯士軍事指揮官名譽掃地；這為普魯士共和派創造了機會，在普魯士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法國綜合工科學校之間建立起實際聯系。其后，由于普魯士軍官中共和派改革人士的努力，1815年至1823年法、德共和派人之間建立起了有機的聯系；當時，拉扎爾·卡諾及其同僚正在法國（14）。正是由于耶拿和奧爾斯塔特兩次戰役的慘敗，普魯士軍隊中效忠朝廷的寡頭政治派別名聲掃地，這才使F·斯坦(Freiherr vom Stein)、沙恩荷爾斯特，以及類似沃爾佐根(Ludwig von Wolzogen)這些年輕軍官周圍的共和派人士能够精心策劃，使拿破倫在1812年俄國戰役中以及后來向厄爾巴島撤退時的遭到慘敗。

我和我的同事所進行的歷史研究的確表明，如果不是后來“彼得盧公爵”(Duke of Peterloo)、無耻的威靈頓和神聖同盟集團的成功干預，將威靈頓的傀儡、國王路易十八世強加給戰敗的法國，普魯士軍方肯定會支持拉扎爾·卡諾，使他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在1815年的大選中當選為法國總統。結果，卡諾被逐他鄉，先到波蘭，后到德國；法國從此一蹶不振。

自從路易十八世的耻辱之后，法國盡管也出現過象戴高樂這樣偉大的總統，但法國至今没有重振過去的輝煌，没有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卡諾在1815年成為法國總統，法國的情形就會大不一樣。與此同時，阻撓卡諾成為法國總統的努力對德國的共和事業也是直接的打擊。反動的親英普魯士王室開歷史的倒車，斷送了德國從前在政治上進步的傳統，德國從此屈從于梅特涅親王(Prince Metternich)暴虐反動的反美主張，屈從于1819年卡爾斯巴德法令頒布后歐洲的寡頭政治秩序，使廣大被出賣的德國民衆極為不滿，士氣低落。德國民衆至今也没有從那一次道德耻辱中完全擺脱出來。

普魯士和德國君主制的素質時高時低，但寡頭政治國家中的議會政府固有的缺陷最終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在英國成功地挑起和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比較典型的是，至今為止，歐洲還没有一部起作用的憲法象美國憲法那樣產生于明確的原則。我們美國人可能常常會違背自己的原則，但我們至少還有一個可能違背的原則。在議會統治下，甚至在更糟糕的寡頭政治統治下的歐洲，自由、真實和公正的原則僅僅存在于另一類憲法之中，即存在于最偉大的民族詩人、音樂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影響之中。這就象德國的情況一樣，比如，普魯士軍隊中許多最優秀的人才都產生于沙恩荷爾斯特的時代。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之后的普魯士歷史中，炮兵和工程兵出身的軍官的相對地位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這種政治影響又與工業企業家，特別是機床設計部門的代表所具有的政治影響互為補充；他們的政治影響與美國歷史上華爾街金融集團的影響完全相反。勞工、企業家，加上在農業、工業、根本經濟基本建設，以及科技進步帶來的高生產力方面的資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投資所形成的社會力量在迅速增漲，共和派推動力的政治影響也隨之增強。這在德國如此，在美國也是如此。只要在科技進步方面的投資在政治上占主導地位，共和派的作用就得到加強。反之，在改善根本經濟基本建設，工農業科技進步方面投資減少，常常與整個民衆的理性程度下降，共和派政治作用的相對減弱，寡頭政治及其走狗勢力的增強密切相關，所有國家無一例外。

所以，由于1964年至1972年新時代(New Age)以來日益高漲的反科學浪潮及其政治影響，特別是由于在1977年至1981年卡特執行時期美國非工業化帶來的嚴酷和令人驚愕的后果，美國在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投入急劇減少，其直接后果是，在美國聯邦南部和東南部各州的民主黨議會基層和其他派別中產生了“新聯邦”派系。新

聯邦派系最開始以民主黨“棉鈴蟲”的形式出現。原來那些民主黨成員很快便成為今天“新聯邦派”遠右翼的核心，成為國會里面共和黨人一邊民主黨的同路人。

由于類似的原因，改變民主黨選舉集團的組成，排除核心選民原來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會使民主黨擺脫羅斯福傳統的影響，受到英國首相托尼“第三道路”布萊爾、或鼓吹“第三道路”的原白宮鼹鼠“迪克”莫里斯（Morris）等人的控制，開始形成對調整環境十分關鍵的選民基礎。在1930年至1933年的德國，希特勒納粹利用上述環境，在1933年1月28日至30日倫敦導演的議會政變中迅速上臺，掌握大權。衆所周知的戈爾副總統的“改善環境”議程就具有同樣令人厭惡的含義。

議會共和制不是一張組織結構表，不是一份合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整體；它是活生生的社會機體。社會如何日復一日地調動民衆，采取行動，哪些積極的選擇在經濟中會產生更大的影響等等，這些就是共和制國家身上流淌的血液。社會進程的特性就是共和制法律的實質，就是共和制道德與智慧力量的源泉。一旦健康的進程得到鼓勵，共和制就得到加強；一旦共和制健康的進程每況愈下，共和制就會病入膏肓，并相應地受到威脅。

2.2 實際利益

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現代形式具有其他任何社會形態無法有效完成的積極功能。這些積極功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家主權本身。維護和保衛共和國及其人民不受國內外敵對（寡頭政治）擴張勢力侵略的權力。

2、建設和保衛國家貨幣及其信譽不受外國機構控制，維護國家貨幣和生產，以及其公民不受國內外不良活動的影響。

3、使用改善和調整國家根本的經濟基本建設，包括政府采取反對國內外敵對利益和影響的措施，改善和維護國家的整個領土與人民的狀況，包括公共衛生。

4、通過普遍的教育機構和其他措施，行使主權國家主要的責任與權威，推動科學技術和藝術的進步。

5、以資本密集和能源密集的形式加大對科學技術進步的投入。

在1789年至1791年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上述大多數觀點都已得到概括。報告總結了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的經濟及相關的保護主義形式的特征，這些特征闡明了從帝國的和封建的體制基礎上建立的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在國家生活狀況方面的取得的成就。

這些思想與漢密爾頓所發揮的主導作用密切相關，從1814年到1875年，人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當時，法國的拉扎爾·卡諾與加斯帕·蒙日（Caspard Monge）領導的綜合工科學校開展合作項目，他們派代表來到美國，幫助西點軍校的發展，使西爾韋納斯·塞耶校長領導下的西點軍校從形式上得到改善。西點軍校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日益重要的關鍵作用得到詹姆士·門羅總統、國務卿和后來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的大力支持；到1876年，美國經濟已成為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經濟。拉扎爾·卡諾與他長期的科學盟友，德國的亞歷山大·馮·洪堡作為歐洲科學的主要代表與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如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曾孫亞歷山大·達拉斯·貝奇密切合作；正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中我們參與了合作，建立起持久的聯系。實踐證明，在國家的命運處于危難的時候，這種聯系十分重要。

1438年至1492年間歐洲誕生的革命制度取得空前成功，這種革命制度，即衆所周知的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脫胎于封建制。經濟科學的發展與這場革命之間有着密切的關系，上述合作揭示了這種關系之間的內在奧秘。這體現在托瑪斯·愛迪生的深遠影響上；盡管貪婪的華爾街和愛迪生的反對者、反科學的《紐約時報》肆意詆毀，愛迪生的發明使美國和德國歡欣鼓舞。

現在要考慮的有兩個方面的關鍵問題。第一，作為科學的原則，如何才能應用已被證實的科學原則，如那些應用于人口統計特征中自動進行資料輸入改進的原則？第二，與此有關的問題是，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如何才能產生其他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曾、也無法產生的效益？

要回答其中任何一個問題，或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必須再次回顧，哪怕是簡略地回顧1438年至1492年的歐洲歷史。我們必須首先考察現代歐洲實證科學的建立，考察1440年由庫薩的尼古拉主教倡導、后來達芬奇、開普勒和其他人應用而建立起來的現代歐洲的科學方法，研究庫薩的著作《論學而無知》。

庫薩的《論學而無知》和其他關于科學方法的重要著作是對希臘古典科學、主要是1600多年前雅典柏拉圖學院著作的研究與整理。在柏拉圖學院中，厄拉多塞（Eratosthenes）的著作是從古典科學中發掘出的極其重要的部分。古典科學大約發源于公元前200年，當時古羅馬的影響日益增長，地中海地區文化逐漸衰落。庫薩發現了所謂的超限量基數的存在，并因此糾正了厄拉多塞在科學上的合作者阿基米德的重大失誤。這一事例揭示了古代經典科學與十五世紀新興的現代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系。

庫薩的重要發現對后來現代經濟科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這主要體現在科學的研究方法上：如何應用計算——通過不存在的事物——來間接地證實自然科學原則的存在與性質。庫薩的研究創立了現代實驗科學，而達·芬奇和J. 開普勒則是G. 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拉扎爾·卡諾和C. 高斯的在科學道路上的重要先驅(15)。

美國革命領袖，如富蘭克林和漢密爾頓的政治和經濟觀念，其主要源泉是萊布尼茲著作的兩個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萊布尼茲揭露了J. 洛克著作的欺騙性，美國人接受了萊布尼茲的觀點，接受了萊布尼茲在1671年至1716年之間對國家管理科學發展的論述，其中包括自然經濟學。萊布尼茲對洛克觀點的反駁不僅直接反映在我們的獨立宣言有關“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的觀念中，同時也反映在我們聯邦憲法序言有關“普遍福祉”的觀念中。1791年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論制造主題》中，他盡管采用了新穎的形式，但主要精神仍然是萊布尼茲的科學思想。

卡諾對機床設計原則的論述也源于同樣的主足點；他將萊布尼茲的幾何位置觀運用于具有革命意義的築城學著作。卡諾對機床設計原則的發展在“勝利的締造者”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卡諾是法國的軍事領袖，率領法國在1792年至1794年的戰爭中取得了徹底勝利，并將萊布尼茲創立的自然經濟學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亞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至1876年進行的美國經濟革命是西點軍校接受卡諾和綜合工科學校觀念的結果。1861年至1876的美國農業－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創造出按人口計算最快的勞動生產力增長。這一增長速度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因經濟受挫為止。1861年至1876年美國取得的成就使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日本、中國的孫中山將富蘭克林、凱里斯和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等推行的漢密爾頓式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作為本民族未來經濟發展的模式。美國1940年至1945年十分成功地進行了戰爭動員，它所依靠的同樣是1861年至1876年的傳統。

尤其是從一般經濟學領域我自己的發現中，以及經濟預測這一特殊領域中，我認識到，科學發現中那些解決難題的方法總是具有根本意義，然而決不簡單。成功的解決方法貌似簡單，但只有在通過所謂“關鍵的”或“獨特的”試驗對科學發現進行檢驗、證實之后，上述解決方法看起來才如此簡單。現在讓我來把這一解釋表述得更加清楚。這對理解經濟如何才能正常運行，或怎樣就不能正常運行，如美國今天的經濟一樣，至關重要。

一個原則在被發現和證實后，看起來會十分簡單；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但并不象看起來那么簡單。我第一次這樣講，你不一定能明白其中的含義；但思考一下。好好地體會其中的意義，直到你最后明白其中的意思。隨后我將論述學校將采用什么樣的教育方針來教育你和其他人的子女，那時我再來談談這個觀點，并解釋有關這個重要問題的講話。

例如，在自然科學中，真正的悖論都是一個或兩個不言自明的錯誤假設的結果。一種可能是試驗主體忽視了一個或幾個制約試驗主體行為的、不言之明的自然科學原則；另一種可能是觀察者強加給調查研究一個或幾個錯誤的、不言自明的假設。在第二種情況下，比較簡單的形式是假設缺乏根據。因為是無關的推定，這種錯誤可以用演繹方法來發現。在其他情況下演繹就不起作用。在后一種情況下，悖論的產生是由于觀察者不知道某些不言之明的假設，或無視這些假設的存在，而這些假設不僅是普遍正確的，而且與該試驗有更直接的關系，是進行該試驗不可或缺的。因而在后一種情況下，就象認知（創造性）思維的所有事例一樣，演繹（所謂的歸納方法也是如此）不可能起作用，因為必要的那些自明假設雖然在實質上是真實的，但在闡述悖論的理論框中并不為人所熟悉。這樣一來，上述情況都具有我們稱之為本體悖論的形式。

隨后，一旦發現了所需要的自明假設，并經過關鍵的試驗方法和/或觀察證實，就能够通過課堂活動或類似的圖表，演繹得到我們的發現。這一切現在看起來就象基本的事實一樣簡單，但在相關的發現被證實之前，這一切絕對不是那么簡單。

那些經過證實的原則具有自明的特性，它代表了本體悖論的解決方法。這些自明的特性不是相互平行、毫無關系的一些原則。就象我們要在運動的宇宙中確定我們此刻的位置，我們必須確定一個標準位置一樣，實驗自然科學的自明原則總是幾何學確認的“多連通”原則，這就是開普勒和萊布尼茲理解的意義，這就是高斯和黎曼所論述的原則。在任何真實環境中，宇宙中任何有參照意義的原則都是在相互作用。

在陳述中，我提出的關鍵一點是，目前已知的、所有已被發現的普遍原則都可以被描述，用最有意義的方式來描述就是開普勒-萊布尼茲-高斯-黎曼多連通簇（multiply-connected manifold）。這一事實向經濟學家和其他政治家提出的根本的實際問題是，那些得到證實的自然科學原則與人類平均駕馭和超越宇宙的能力的增長相互聯系，那么這種聯系的實際表現是什么？

既然自然科學悖論的解決方法需要試驗或實驗性觀察（如解剖學）的類比方法來證實，那么，在實驗中發現的特殊有效性就具有非常有趣的含義。為了檢驗假設的新原則而改良的試驗儀器，其形式與發現新的、普遍適用的機床設計完全一致。拉扎爾·卡諾對機床設計的論述，路易十八之前在G·蒙日直接領導下1794年至1815年間綜合工科學校對這些實驗方法的發展，直接間接地引發了科學實驗和生產方法上的突破，并帶來了萊布尼茲熱力機器應用原則上的新發展。

現將這部分概括如下：經過改良設計的關鍵實驗儀器和程序能精確地檢驗普遍自然原則的有效性。這給機床設計者指明了方向，在改良的產品設計和改良的生產過程中應該運用上述被證實的普遍原則。科學上有效原則的發現會帶來人類按人口和平方公里計算駕馭和超越宇宙的能力的增長，這就是它們之間的直接聯系。

這樣，我們在一方面就有了由科學產生出來的、經過證實的自然原則。在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了相同的原則，即按人口和平方公里計算人類駕馭和超越宇宙的能力的增長。我們將這樣一套至今為止經過證實的原則用無限量M來描述。用專業術語來表達就是：這些原則以高斯-黎曼多連通、超幾何簇的形式相互連接。在另一方面，由于這套原則的運用，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才成為可能。

為了實現科學帶來的潛在利益，改善人類的普遍福祉，有必要按照那些原則重新組織我們周圍的自然環境。這不僅需要生產組織和產品設計發生一致的變化，同時還需要整個人口與其居住區域之間的關系發生全面的變化。就一般而言，我們稱我們環境中發生的后一種變化為根本經濟基礎。交通系統、水資源管理系統、森林管理、開墾和保留的農業土地管理、動力系統、通訊系統、環境衛生項目、普遍醫療保健、普遍教育等等，通常由政府采取行動，或在政府的指導和規範下采取行動，使我們的整個環境的發展與我們對自然原則的認識水平保持一致。

那么，我們必須揭示出科學的奧秘。這是發揮我們領導責任的一個組成部分，以改變我們共和國的法律和公共管理。我們必須超越自然原則

的界綫，以上述自然科學和技術進步相同的方式來對待教育和文化。

2.3 古典藝術：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現在，一些讀者，也許有很多讀者都想知道，至今為止我說的用自然－經濟的原則來維護大衆的福利是否是將政府的作用過于簡單化了。產生這種懷疑的根源是一些十分熟悉并且十分普遍的偏見（16）。既然我們所預見到的這些反對觀點一直是最近十余年大衆意見的一個主要部分，這種錯誤的觀點必將反復誤導政府，最終形成災難性的頑固見解。在將科學作為驅動力，改變整個政策和其他環境，改善人民普遍福祉方面這種錯誤觀點危害尤烈。為了糾正目前流行的偏見，首先請大家注意自然科學本身所涉及的文化問題。隨后，再用討論自然科學同樣的方式來分析更加廣泛的文化問題。

今天，人們對科學家的實際作用普遍懷有錯誤認識，認為科學家是神秘的幻想家，是古怪的家伙。科學家產生科學的觀念猶如奶牛分泌乳汁一樣。正是由于人們對科學和科學方法抱有這種誤解以及類似的謬見，所以人們普遍無法認識到，古典藝術的創作方法在科學發現、并將科學發現成功地應用于增強人類力量方面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

所謂“古典作品”，我是用“古典”來指藝術作品形式的目的和方法，如斯科帕斯（Scopas）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以及現代達·芬奇、拉斐爾的雕塑。同時，古典作品也指古代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以及現代莎士比亞和席勒的悲劇。古典作品還包括古典音樂作品的原則和現代演唱方法，如佛羅倫薩的美聲唱法，其代表有達·芬奇、J. S. 巴赫、W. 莫扎特、J. 海頓、貝多芬和J. 勃拉姆斯。

在“古典藝術作品”的標題下，我們還必須包括最近已被拋弃的古典文學和高等教育的傳統。我們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必須依賴這些傳統才能繼續生存，在科學技術的應用層面上更是如此。科學技術的應用才能使我們今天所說的全體民衆普遍福祉的現代標準得以維持。所有這一切，以及與古典藝術作品的創作方法有關的問題，直接證明人與其他低級形式的生命絕對不同，他們之間存在着重要的、機能上的本質區別。

與經驗主義者，與所謂的浪漫主義非理性的盲從者，如 I. 康德，新康德派的 K. 薩維格尼（K. Savigny）教授相反，藝術不單純是“個人喜好”或習慣。藝術應該發揮功能，特別是對這一不可或缺功能的古典評價，具有與自然科學發現一樣精確的意義。而且，科學上發現的自然原則與古典藝術品有着相同的形式和根源。

自然科學的根本，古典藝術品實際表現的根本，是理性力量。這種能力無法用歸納或演繹來表示。只有依靠這種能力，人才能在個人心靈的獨立認知過程中發現真正悖論的解決辦法。有效的基礎科學的發現、或這一發現在另一個人心目中的再現，都只能依靠這種方式。同樣的發現原則是所有優秀課堂的特征，不論是兒童、年輕人或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公學或其他學校，概莫能外。

我在其他的論著中詳盡地論述過這個問題，這里我只簡單概括，說明這個問題的實際意義和戰略重要性。

試想，一位科學家新發現了一個普遍原則，能够解決從形式推理無法解決的自然科學悖論；在這一個過程中這位科學家心靈上有些什么變化？如果讓一位接受良好教育的學生面臨同樣的悖論，讓他在心靈上重新體驗上述發現的過程，并得到與原來的發現者大致相同的結果，這個問題的意義就會更加清楚。在考察這個例子之后，我們將表明，在藝術發現過程中，或者音樂表演家在重新發現作曲家的思想，并在訓練有素的音樂聽衆中再現這些思想的過程中，都會出現相同的精神過程。這樣我們就可以說明，科學驅動行為一旦被納入一個國家制定政策的過程，就會反過來有助于制定那些改善普遍福祉的政策。

在學生重新體驗原來發現的過程中，學生在受教育中建立起來的自信心會告訴他，他面臨的悖論是可靠的，肯定有某種解決方法，而要找到解決方法并不需要超過學生教育程度的其他附加手段。優秀的老師在學生身上培養起來的這種自

1988年，以前著名的阿媽的無私四重奏小樂隊的小提琴演奏員儺檗鉞·醭蕤蒽您（Norbert Brainin）和鋼琴伴奏員哀鉞·蓼德洧搿（Gunther Ludwig）正在排練。"藝術的嚴格意義上的功能，尤其是那責無旁貸的職責的古典的增值，不僅有如完全精確的物理科學發現的意義；而且，有經過正當手續的物理原則的發現的絕對存在的意義，在科學上，存在着與有效的古典藝術氣質完全相同的結構和原點。"

信心是教育過程中一個根本的情感部分。除非學生的娛樂本性已經在低劣的教育或課堂學習中泯滅，對任何一個身心快活健康的兒童來說，能够找到辦法來解決一個難題本身就是令人喜悅而又激動的經歷。這就是動機的特性，更恰當地說，這就是激情的特性。這種激情促進了最優秀的專業人員后來的發展。兒童的心靈，以及潛在注意力的力度和時間，都會因為發現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大大的得到激勵——他會變得熱情奔放！（17）

在那樣一種成功的課堂教育或類似的活動完成之后，有關那個兒童，年輕人或成年人心理活動中表現出的證據，我們又能得到些什么？如果我們無法直接觀察那些過程，我們如何才能了解那些過程？與 I. 康德在這個問題上非理性的觀點相反，我們有辦法了解兒童在綜合重復普遍原則原發現過程時的心理活動。我們有辦法了解，對此我們幾乎絕對有把握。讓我們一起來確定相關的證據。

首先，在成功地完成這一過程后，兒童心里有一種激情和喜悅。兒童領略到的激情的特性最為明顯。柏拉圖在其《共和篇》第二部中正是用這種激情來表達古典希臘術語阿加比（Agape）的特殊含義。在這個問題上，柏拉圖把阿加比視為對真實和正義的激情。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這反映了柏拉圖和我自己的觀點，激情意味着在一切事物中追求真實與正義。在《哥林多前書》第13章那個著名而又熟悉的問題上，使徒保羅表達的同樣是這樣一種激情。這似乎是一個優秀兒童與生俱來、向往真理與正義的激情；當兒童在自己父母、伙伴或其他人身上發現錯誤和虛偽的時候，我們經常會觀察到兒童會表現出一種似乎是本能的憤怒與悲傷。只要我們還是一個真正的人，即使已經到了成年，我們都會繼續強烈地感受到兒童這種奇妙的激情。

在這一點上，甚至在與寵物嬉戲玩耍中，情感健康的兒童對真理和正義的激情，直接表現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動物與人的嬉戲關系中，動物表現出的只是嬉戲冲動。（18）

第二，一個人可以根據幾個關鍵的參照點來識別另一個人在重新體驗原發現（例如）自然原則時的創造性（認知，心智）過程。這些關鍵的參照點就是：a）認識相關的悖論；b）認識到所說的悖論用歸納－演繹之類的形式無法解決；c）認識到概念化的激情一旦調動起來，就能使心靈

集中注意力去尋找解決辦法；d）認識到兩者都表現出所發現的原則解決了所界定的悖論。在這些共同的參照點的幫助下，兩個有關的心靈會構想出上述心智體驗和認識，在這種心智體驗之外的觀察者是無法洞察的。這一構想是多少有些獨特的概念，類似記住一個人活生生的臉的心理過程。盡管局外的觀察者無法洞察發現的心智過程，但這個過程已經具有自己的特性，只是缺少恰當的命名罷了。

為了使論述簡單一些，我們讓同一所學校的師生來重新體驗同樣的過程。我們假設這所學校是實行典型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學校，類似拉扎爾·卡諾接受教育的法國奧拉托利會（French Oratorians），或十九世紀德國席勒－洪堡教育改革的學校。在這些學校中，學生不斷受到鞭策和鼓勵，重新體驗原來發現普遍原則的心理過程。

為此，我們現在必須強調那些學生都熟悉的第三種體驗。學生掌握的那些重要普遍原則的許多知識，都是長輩或早期文明傳下來的，但學生是通過自己重新體驗早幾代人，早幾個世紀，甚至早幾千年的發現才獲得的，或者是經過十分類似的心智過程才獲得的。學生在心中熟記了無數面容和名字，那些先前發現者的姓名、地點、時間，學生回憶起促進發現的那些悖論的性質；同時他們也回憶起重復發現帶來的情感體驗。當學生思索的時候，他們會想象出許多先輩的面容，不同時代，不同地方所有那些重要的發現者會形成一幅類似拉斐爾《雅典學派》的圖畫。

同時，學生還具有第一手的認知體驗，認識到早先那些偉人發現的許多原則中必定存在着有效的認知聯系。這樣，認知變化過程的第三種體驗將前后發現的原則連系起來，構成一個多連通簇相互連接的形式，這在學生心目中就會形成更高級的概念。這些思想，與之相關的悖論構成了個人豐富的、有關普遍原則的有效的知識，構成連貫的、科學發現的普遍原則。（19）在這種情況下，這所學校的學生就更加熟悉、更加準確地了解到創造性過程本身，而不是了解僅僅通過直接感性認識來界定的事物。

這樣的心態，加上在現代專業知識領域較高的素養，這才能使一個人成為真正的科學家。科學家這種心態素質就是我前面簡略論述的，是心智體驗的概括。這種心態素質應該作為一個參照點，以便表現科學、藝術創作和古典表演標準之間的聯系。

現在，我們將這一點與演奏莫扎特或貝多芬的古典音樂作品作一比較。設想你在人生的某一刻成為了音樂演奏家。

首先，你絕不會簡單地演奏樂曲的每個音符，或照原樣理解那些音符或樂曲。你當然要避免在演奏中彈錯音符，或增加音符。但是，你同樣必須避免刻板機械地演奏原曲的那些音符，或主觀任意地按程式演奏原曲的音符。演奏的規則是，你必須盡可能按原作者的意圖來演奏，將音符看成是記憶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具有明確信息、需要去解釋處理的東西。演奏古典音樂就象高年級學生重新體驗自然原則的發現過程，你不能去尋求相關悖論字面的、主觀臆斷的意義，你當然也不能去尋求樂譜上字面的、主觀臆斷的意義。你必須重新體驗作曲家以前發現原則的過程，就象科學家通過解決相關的悖論重新體驗發現自然原則的過程一樣。這是演奏者在獨自重新體驗作曲家原來的發現，音符只是音樂主題思想的記憶工具，而不是要對曲譜本身進行字面的理解；演奏家必須將音樂的主題思想表現出來。（20）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暫時把藝術的討論局限于音樂。并把音樂的討論範圍局限于唱法的訓練與演唱方式，即佛羅倫薩美聲唱法。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將音樂作品和演唱局限于古典音樂的精華部分，如 J. S. 巴赫的作品、海頓 35 號作品以后的作品，W. 莫扎特在維也納凡·斯威頓（van Swieten）研究巴赫以后的作品、貝多芬、J. 勃拉姆斯的作品，以及其他嚴格運用主題通奏樂曲、美聲學派聲樂古典演唱者和器樂古典手法的演奏者。主題通奏樂曲由古典作家經過精確調音對位法創作出來，并在巴赫的作品中得以確定。這些限制簡化了我們在這里說明的論點。

古典音樂創作和演奏的第一條原則是真實與正義。換言之，首要的音樂情感不是感覺，而是柏拉圖和使徒保羅所說的情感——阿加比。這是閱

讀或試圖演奏這類作品的首要法則。你必須確定那種特殊情感的基點，即那類作品的特征，樂譜只是這些特征的記憶工具。那種情感，那種對“這首樂曲的感受”必須在相對完美的演奏過程中引導演奏者和聽衆。

第二，與此相關的原則是悖論原則；在藝術中，悖論要通過隱喻來認識。在所有藝術形式中，隱喻是歧義的最終形態，它被強加于直接陳述之上，使兩個或更多相互排斥的陳述意義變為堅實的一體，使同一話語包含所有那些直接陳述不同的意義。柏拉圖在其《巴門尼德篇》(Parmenides)中表現出的反語形式就是最好的範例，我們可以將其改寫為，“我是一個連貫的過程，其基準點是彼此不相容的A、B、C和D，但我在形式上與任何一點，或任何兩點的結合都不一致。”

為了讓有較高音樂素養的人有所參考，我特別作如下説明。在古典主題通奏樂曲中，隱喻指示巴赫的對位法。對于后來的作曲家，巴赫作品中最重要的參照點有兩處，即他的《音樂奉獻》和《賦格藝術》。提到巴赫最多的是莫扎特，比如在他的鍵盤幻想曲K475中；其后，在貝多芬、勃拉姆斯和其他人的許多作品中都提到這一點。隱喻性悖論的原型是運用一系列彼此不同類型的利第亞音程，就象莫扎特領悟巴赫的《音樂奉獻》而創作出的作品一樣。

在真正的對位復調中，作品最重要的思想是由兩種方式來定位的。第一，正如科學上自然原則靠本體悖論來定位一樣，在音樂中，相關的悖論由樂曲中過渡部的隱喻形式、合符規則產生的不諧和音來表現。第二，通過直接或間接引用同一作者或其他作者表現的思想來定位。

這些悖論看起來不協調，但絕不是主觀隨意的不協和音，絕不是浪漫主義的“經過段落”或現代派或后現代派的噪聲生產形式。相反，它以真正悖論的形式出現，如同促進學生重新體驗發現自然原則的悖論一樣。在音樂中，相關悖論出現的時刻，一組貌似不協調的音程在作品復調中以有規律的對位形式產生。正如悖論促使學生的心靈重新體驗自然原則的發現過程一樣，音樂悖論靠形式推理無法解釋。這時，在一個充滿歧義，即反語的音程中會有數個隱含調穿插其中，構成一連串有序的不協調和音，這就是所謂的利第亞音程，即典型的悖論，促使聽衆在心靈上與作曲家產生共鳴，體驗作曲家試圖表達的音樂主題。(21)

在整個過程中始終要記住，就象斯科帕斯與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塑一樣，古典音樂作品與埃及、希臘古代綫性雕塑相反，它不是一件“物品”，而是心智的重新體驗，是重新體驗發現更精美原則的過程，與學生重新體驗發現自然原則的原過程相似。重新體驗音樂思想是第一次接近音樂感受；只有反復體驗那種感受，有時甚至是好幾年，即使是最優秀的演奏家才會最終“準確地把握作品的意義”。

前面的論述強調了如下事實：即古典音樂是所説的創造性激情阿加比支配的領域。音樂作品的實質是特殊形式的思想；這里，我將這種思想與普遍原則的發現聯系起來。雖然創造性的古典音樂作品一方面象春天的馬駒一樣歡暢活潑，但歡暢活潑決不允許破壞阿加比原則：即音樂思想的真實與正義。所有這些論述的結果就是音樂演奏的原則；著名指揮家W. 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稱之為刻意表現樂譜音符的意義，自始至終達到天衣無縫的統一。

正因為如此，所有現代歐洲文明中的古典音樂作品要么具有“宗教音樂”的特性，要么帶有特別的基督教思想標準。只要看一看巴赫和其擁護者的音樂你就會十分清楚。這就是説，音樂隱含的主題就表現為阿加比的情感特性。這在奧古斯丁傳統中表現得有條不紊，在現代古典復調音樂再現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古典復調音樂創立于十五世紀的佛羅倫薩，大約在1438年至1492年間，這也正是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共和制出現的歷史時期。音樂中隱含的基督教特性表現為阿加比激情與真實正義原則的結合。這些音樂帶有宗教性質，這是因為它含蓄地頌揚和肯定以造物主形象創造的男人和女人，每一個男人和女人作為思維的產物，在同時永恆中都找到自己真實的身份。(22)

音樂中蘊藏着力量和美。因此，這樣的樂譜必須細細的讀，最好還要演奏和傾聽。

現在有必要對藝術作品的某些原則進行界定，但前面提到的政治目的要求我暫時中斷對文化主題的論述。我暫時站到一旁，象莎士比亞的合唱隊一樣，以便提醒你，我們現在的主要議題是藝術中不可缺少的政治含義，而不是站在非政治的立場上來考慮藝術問題。我在這里討論藝術，目的是要指出藝術與政治之間關系的性質和重要性。更深入地探討藝術問題只能在其他著作，其他時間和其他場合去完成。在此，我將概括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強調古典悲劇相關和明顯的政治含義，并含蓄地突出悲劇作品的原則與音樂和詩歌的關系。音樂與詩歌相對有些區別，但都與政治有關。(23)

在古典悲劇中我們看到了思想表現最為強烈的藝術形式，它與國家政治的關系最為直接、最為緊密有力。悲劇中最優秀的是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的作品，克里斯托弗·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馬耳他的猶太人》，M. 塞萬提斯的準悲劇或喜劇《唐吉訶德》，以及莎士比亞和F. 席勒的作品。所有偉大的古典詩歌也有類似的思想交流，但常常與政治的聯系比較間接，不够明顯。你可以自問一下：藝術作品與政治關系是什么？在調整政府政策的哪些方面藝術能恰當地發揮作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偉大的悲劇作家，他們的回答十分明確有力。(24) 古典藝術作品在調整文明社會的國家政治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古典悲劇是其中最明確、最容易理解的範例。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先討論一個關鍵問題。

上面列舉的例子，第一，學生重新體驗自然原則發現的原過程，第二，古典主題通奏樂曲的演唱與體驗自然原則的原發現過程類似。這兩點表明，人類的關系根本不是今天學院派社會理論錯誤地定義的那樣，是社會關系中的基本特性。個人的人性表現在獨立個人的認知力之中，人的認知力無法用感覺、知覺來直接觀察。所以，人類關系只有在參與每一個體獨立成功地重新體驗普遍自然原則的原發現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參與兩個或更多個體近乎完美的獨立體驗過程，這才是人類關系的基本形式。這種關系與動物的關系，或類似動物的關系有本質的區別。

參與重新體驗普遍原則的原發現過程具有兩點意義，人類的社會形式與動物群體的根本區別就表現在這兩點意義上：

第一，思想必須以上述那種唯一的方式來定義。

第二，文明社會根本的功能是應用那些思想的發展來協調該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關系的協調超越若干代人，從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跨越了同時永恒。

這兩點意義確定了科學實踐，確定了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并完全確定了所有社會關系的原則，其中包括國家政治。

這兩個因素說明了在道德和智力上墮落的現代社會及其教育政策的特征。現代教育根據所謂的“信息理論”，以學習“信息”為基礎；而從前的社會與此相反，其自我管理的教育體制和過程依靠的是古典人文主義關于人性的觀念。我們所說的“人性”是指先知摩西對人的定義 —— 按上帝的形象創造男人和女人，是指基督教的原則觀點和人文主義的教育方法，其基本的原則我已經作過了界定。

在這個問題上，一切有效的科學和藝術都表現了古典藝術作品的這一原則。因而，所有稱職的政治家都必須遵循相同的原則。

現在結束這一必要的論述，讓我們又回到悲劇的主題上來。對于“悲劇”一詞，人們有一種糊涂但十分流行的理解，錯誤地認為悲劇就是描寫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痛苦或遭受的災難。然而，富于理性和文學素養的人在使用“悲劇”一詞時，其意義根據古典希臘作品和現代歐洲作品來確定的，這些作品我已經提到過。如果我們不按這樣的意義來理解悲劇，我們便會墮入愛麗絲的奇妙世界，人們信口胡說，詞語的意義純粹是主觀的，容易引起差錯。

根據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馬洛、莎士比亞和席勒反復不斷、前后一致確立的標準，“悲劇”應該按我使用的意義來使用，只能是指某個社會，或該社會的主要人物遭遇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災難，災難的降臨完全在于主人公執意拒絕和糾正可能致命而又不言自明的荒唐觀念。這種觀念已植根于受害者 —— 名人或社會 ——

的信仰體系。悲劇的性質在于，人類及其個體都具有創造性推理的能力，受害者應非常清楚自己不言自明的致命錯誤及其一般的實際意義。悲劇的原則是，悲劇性的人物的并没有真實的理由無法意識到、并且糾正不言自明的致命謬見。(25)

我們不去討論那些杰出的有關案例，例如論述法律原則的《安提格涅》，我們只集中討論兩個突出的例子：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和羅俄斯在1812年至1813年打敗拿破倫·波拿巴，取得輝煌勝利的軍事策略。在歷史學家和悲劇作家 F. 席勒的研究基礎上，在研究西班牙尼德蘭戰爭和三十年戰爭的基礎上，L. 馮·沃爾佐根制定了打敗拿破侖的戰略。正如席勒在他出版的歷史研究中提到的，對后一次戰爭的研究構成了席勒《唐·卡洛斯》和《華倫斯坦》三部曲歷史背景。我們選擇的這些例子足以説明舞臺上古典悲劇的原則，説明這類悲劇在現實歷史中國家進行最關鍵決策時的重要作用。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的悲劇人物不是受折磨的普羅米修斯，而是折磨普羅米修斯、自取滅亡的宙斯。普羅米修斯遭受永世折磨的原因是他不願向宙斯透露宙斯自取滅亡的辦法。用折磨來讓普羅米修斯吐露秘密的企圖失敗以后，宙斯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拒絕承認普羅米修斯對同時永恒的承諾。劇作家指出宙斯悲劇性錯誤的后果：由于宙斯悲劇性的錯誤，宙斯及其同黨、奥林匹亞山的衆神注定要被滅亡。(26)

腓力二世統治下的西班牙也是自取滅亡的實例。西班牙摧毀了自己企圖繼續統治的陸地資源，愚蠢地導致了西班牙的衰落與滅亡。在政治與后勤的戰略問題上同樣的悲劇性失誤，使威尼斯現實生活中一邦小丑爾虞我詐，將中歐卷入1618年至1648 年間的三十年戰爭，最后敵對勢力雙方同歸于盡。

馮·沃爾佐根主要根據席勒的著作制定了俄國人打敗拿破倫的戰略。為此目的，馮·沃爾佐根不僅爭取到 F. 斯坦周圍普魯士改革者和席勒的朋友 W. 馮·洪堡的支持，而且還贏得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支持。拿破倫拒絕了當時最偉大的軍事天才、法國“勝利的締造者”拉扎爾·卡諾的嚴正警告，一意孤行，愚蠢地進攻俄國，最后完全陷入馮·沃爾佐根設計的圈套，全軍覆滅。

直到今天，美國某些高級軍事官員仍没有從現代史上那些杰出的戰爭中吸取教訓。諸如參謀長聯席會主席H. H. 謝爾頓、國防部長W. 科恩、副總統戈爾等這些軍事領導人，如果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繼續一意孤行，只會斷送美國，毀掉自己，就象腓力二世悲劇性的錯誤斷送了西班牙、拿破倫在1812年俄國戰役中葬送了自己一樣。

古典悲劇的普遍原則就是這樣的警示，這是雅典詩人梭倫著名詩歌中反映出的主要精神。梭倫表達的主題是提醒未來的雅典人，他們當中流行的糊涂觀念會使他們重新陷入梭倫改革前的悲慘境地。在這個問題上，美利堅共和國的締造者及其聯邦憲法的起草人中最優秀的思想家，將梭倫的詩歌作為參照的範例，以此來確定憲法的條款。國家政治最重大的問題是如何預防民衆因自己習慣性的愚蠢行為 —— 因自己習慣性的見解 —— 而毀滅自己，這正象梭倫生前警告雅典人一樣。

憲法法律相應的原則是，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自身管理方面進行了偉大的革命變革之后，如梭倫在雅典完成的革命以及我們新近使美國得到自由的情況一樣，他們應回過頭來思考他們認為有必要摒弃的那些習慣，他們應該約束自己的后代，決不能重復從前習慣所反映出來的那類不言自明的錯誤。

這就要求革命者在未來采取預防措施。我們同樣還需思考未來會出現的新情況，這些情況與革命時期并不相同。他們必須預見到在未來的新形勢下，不言自明的錯誤觀念會産生同樣普遍的問題，它會以新的面目、甚至以致命的形式出現。

在古典悲劇或實際生活中，悲劇的原則表現為，第一，民衆的傳統習性形成的觀念和傳統習性控制下的行為會導致整個民族走向滅亡。悲劇的實質不是偉人對善良的民衆作了什么壞事，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民衆可能因自身的所作所為毀滅自己。由此可以推導出，個别人物可能成為悲劇結局的載體。掌握了政府實權或對國家安寧具有類似的影響，這就會使國家的大權落入一個或

數個主要人物手中，馴從的民眾則會因此而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災難。

德國并没有選擇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完全是由于英國銀行家和 H. 沙赫特背后華爾街的同伙在敦倫一手策劃的議會政變。然而，在 1933 年 1 月 28 日至 1934 年夏天期間，由于一系列政變，希特勒在德國掌握大權。一旦希特勒大權在握，他的倒行逆施必然導致德國的悲劇。同樣，對克林頓總統的彈劾使戈爾副總統暫時代理總統，這可能成為美國滅亡的悲劇性因素。一個國家大多數人的愚昧行為會將某個人推向權利的頂峰，這會在國家后來悲劇性的結局中表現出來。這就是悲劇的邏輯。

因此，在現實中，西班牙由于馴從于腓力二世的愚昧行為而毀滅了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席勒的《唐·卡洛斯》悲劇中，唐·卡洛斯和波薩侯爵被安排來防範腓力二世（真實生活中）的愚蠢行為，避免給西班牙以及整個歐洲文明帶來災難。在劇中，卡洛斯和波薩以不同的方式成為三個可能挽救西班牙的人物中的兩人。但他們没有成功，西班牙終究没能逃脱被毀滅的命運。(27)

這樣看來，將席勒的《唐·卡洛斯》視為一部虛構的故事是愚蠢的，甚至更加糟糕。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藝術問題上和現實歷史中會表現出極其淺薄無知。馮·沃爾佐根利用席勒對悲劇的論述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這個例子説明，《唐·卡洛斯》劇中表現的歷史原則是真實有效的，其中包括西班牙在尼德蘭推行近乎自殺性政策的歷史。我在這里含蓄地，或以其他方式提到的偉大悲劇，没有一部表現的不是現實歷史中的真實原則。

古典作品和國家政治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我描述了這些關系的原則性質。第二，在緊接下來的部分我將這一原則應用于能説明真實國家領導藝術的個案：這一原則在政治領導人與我描述的“核心選民”的商議過程中將如何發揮作用。

行為的根本性質在暗中確定了所有的社會關系，并因此確定了政治藝術的本質。行為的根本性質就是通過在心智上重新體驗科學原則和古典藝術原則的原發現過程來傳播思想。在檢驗兩個學生之間的關系的情境下，我們可以確定行為的根本性質：一個學生重新體驗某些自然科學普遍原則的原發現過程之后，向另一個學生提供一些事實，使第二個學生也可能成功地重新體驗同一發現過程。

如果兩個學生之間傳播的僅僅是“信息”而没有思想交流，我們在比較這兩種關系差异時就能更清楚地了解上述關系的重要意義。

在第一種情況下，他們交流的是所謂的“信息”，他們之間只有令人反感的（即霍布斯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在行為主義者和其他無數馴獸師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們將自己的技藝應用在人類的受害者身上。換言之，教育變成這樣一種狀況，教師和教授是專家兼弊腳的馴獸師，他們對待學生就象對待人類的牲口，他們不是在傳授知識，而是“信息”。在哈佛大學教育系、與行為主義者有關的種族主義的空論家就是這些觀念的代表。

在第二種情況下，教師對待每一位學生就象是在培養未來有創見的天才。我們訓練并激勵學生去學習那些普遍原則的偉大發現，為他們提供盡可能真實的前提條件，使他們能重復自然和藝術普遍原則的原發現過程。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教育思想在一般民眾關系中也得到反映，這表現為平行的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在可量化的農業生產效果上，在制造與操作技術能力上，特別是在機床設計、在科學、工程及其他事例中，截然相反的兩種教育方法的對比結果一目了然。在產品設計和生產過程中，在相對較快地引進技術進步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教育方法最顯著的對比結果，或最不顯著的對比結果。在技術進步的環境中，家庭成員使用、安裝、維護和修理家庭工具設備的能力，同樣能反映兩種教育思想的差异。

正如赫拉克利特堅持認為、柏拉圖在其《巴門尼德篇》中説明的那樣，物質的本質是本體變化。作為一個數學術語，大家熟知的高斯－黎曼多連通簇，由于有效自然原則的作用，向好的方面轉變可以在引進新的自然原則的情況下，參照人類生產、相關行為特有效果的改善來測定。這

就是說，得到證實的原則 N 在應用中數量增加，人類生產和相關活動的相對反熵（anti-entropy）就增加。在實際生活中藝術和相關原則應用的數量 M 也是如此。

由此看來，自然與藝術原則以成對的形式在學生及其他人中間產生與再現。這種產生與再現的速度，生產及相關實踐活動相應的變化，就是維護和改善社會普遍福祉賴以存在的變化因素。

就自然原則而言，在 N 個自然原則中，有關的功能關系相對比較清楚。而在 M 個古典藝術原則中，其作用就比較難以理解，最終也成了更重要的挑戰。梭倫和柏拉圖就曾強調指出，社會成員堅持種種社會偏見的傾向就是國家政治最大的困難所在。所有社會偏見中最壞、最致命的就是不能或拒絕接受下列觀念：由于人們具有認知潛能和認知功能——我在第二部分對此已作相對較多的論述——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就的；國家和社會的法律，社會－經濟的實踐都是按自然法則而自治，而自然法則的第一價值就是人的認知（心智）功能，就是對認知功能的培養和應用。

古典藝術品及其實踐是對社會關系這一原則進行檢驗的領域。檢驗的方式是與發現自然原則相同的認知（心智）過程。藝術作品與政治關系最直接的表現是古典悲劇；但是，由于每一部古典藝術作品都能讓我們去探索豐富多彩的人性的潛能，去探索捉摸不定的人性特征，因此，從最終的效果和道德效果而言，古典藝術作品都間接與政治有關。

獨立個體通過認知（心智）過程能够發現和應用已被證實的自然原則，其作用是成對社會關系最直接、最主要的形式。社會關系表現為重復其他人心靈中特定的發現，分享成功的事實，這就確定了制約人類平均生產力、最根本的社會合作關系。然而，人與自然之間的實際關系取決于社會關系本身的秩序。發現社會關系的普遍原則是個體認知過程之間的關系的自我檢驗。后一次檢驗是藝術作品的領域，是檢驗人類個體認知能力之間關系的領域，是靠人類認知能力進行的研究。

一旦我們喪失了藝術原則感，我們就喪失了認識和控制那些導致社會自我滅亡的、愚蠢行為的能力。然而，這些關系都是古典藝術表現的主題，都處于人與宇宙普遍的自然關系之中。除非我們的社會行為模式與人類物質條件的改善同步發展，藝術將淪落為文化悲觀主義。所以，藝術的任務不僅僅是培育更好的社會關系，我們應該認識到，藝術的作用還必需與人均社會生產力的增長協調起來。否則，社會就會失敗；長此以往，社會注定要受到懲罰，在道德上失去生存的合理性。

當社會及其領導者被悲劇性的缺陷所侵蝕，一個文化就會象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走向自我毀滅。悲劇性的缺陷常常以不言自明或類似不言自明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表現出來，這種習慣改變了適應環境的累積效果，致使自己走上自我滅亡的道路。今天，人們對狂熱的貨幣主義和新時代思想普遍采取容忍態度，在過去三十年中，這種容忍態度在西歐文化，特別是在美國文化中產生了咎由自取，自取滅亡的效果。在目前盛行的反應模式控制下，這就使地球上我前面提到的國家和其他更多的地方，多少注定要很快被人遺忘。

古典悲劇的主要功能是讓我們警惕這類危險，這種危險可能就在我們自身，就是流行的、我們頑固堅持的官方或民眾的意見。悲劇的這種功能是古典藝術原則和更普遍的藝術活動的集中反映。這種功能的目標是迫使我們去看清、去理解、并去糾正潛在致命的悖論。致命的悖論就反映在我們身上，反映在有關社會關系不言自明的觀念上。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該應用古典藝術作品的形式，應用與發現自然原則同樣的認知能力去解決悖論。

那么，讓我們以這樣的思路來看待民主黨總統侯選人在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傳統政黨中核心選民打交道時應該采取的態度。

3. 關稅和控制：核心選民

在歡樂的“歐洲勝利日”過去近二十年后，美國公民和國家逐漸在國內占有巨大的優勢，我們幾乎所有的人似乎都認為，除非絕大多數人都同意毀滅國家和自己，美國是不可能被摧毀的。如今，在肯尼迪總統被謀殺剛剛三十多年以后，事情就已經非常清楚。在最近的幾十年中，我們自己，至少是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因為盲從而毀掉了一個原本十分偉大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絕大多數的人仍在我們之中。

那種橫行肆虐，自我毀滅的邪惡最簡單、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疾病——“消費主義”。消費主義這個時而狂暴的風氣發展到今天已經經歷了約三十年的時間，與其為伍的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風氣在我們中間流行，這些風氣反映出同樣的道德墮落和精神錯亂。

例如，如果農民因市場價格遠遠低于農產品的實際成本而破產時，時髦的消費主義者會幸災樂禍地說：“市場價格是合理的！”如果我們的勞動力大軍因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的全球化形式而無法找到體面的工作，只得從事報酬極其可憐的“服務性工作”時，洋洋得意的消費主義者會高叫“那又怎樣！”“如果我能從肮臟的囚犯勞工或者國外買到更便宜的東西，有什么不好？對我來說，合理的價格就是最低的價格！”這樣一來，自欺欺人、政治上強硬的消費主義者自然會堅持說：“我用不着擔心農民，我的牛奶是從超級市場上買來的！”

“消費主義者”與嗜毒者頗為相似。就在昨天就有一名嗜毒者被送往醫院，“還沒進醫院已經死去。”消費主義者貪得無厭、利欲薰天，這會使他一次又一次、越來越深地陷入自我毀滅的泥潭。

消費主義者會讓我們想起馬來人捕捉猴子的辦法。據英國媒體報道，馬來農民通常用一種叫“馬來捕猴機”的工具來捕捉猴子。捕猴機極其簡單，是一個細頸瓶，固定在柱子或樹干上，里面放一只堅果。堅果的大小剛好能通過瓶頸。貪心的猴子發現堅果后將爪子伸進瓶子，抓住里面它想要的堅果。由于它拒絕放弃手中的堅果，它就無法將爪子從瓶子里收回來。它拒絕放弃手中的一只堅果，結果成了農民全家晚餐上的佳肴。消費主義者就象那只猴子；許多上當的互助基金投資家、金融派生機構和類似的連鎖信騙局都跟那只猴子沒有兩樣。即使是撒旦本人，在捕猴機的發明者面前也會自愧不如。

純粹的貪婪只是消費主義風氣一種狂熱形式。看一看美國民眾的政治信仰和其他行為，他們被廣泛流傳的占星術任意操縱。今天的星相學，就象异教福圖娜女神（Fortuna）信仰和賭博一樣，已經成為又一種危險的异教崇拜，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危脅。今天破壞性的江湖騙子“埃爾默·根特里”（Elmer Gantrys）主要是那些電視福音傳教者、煽動仇恨者，如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和杰里·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占星術崇拜、減肥的種種危險方法和其他保健風氣一樣，他們用异教迷信和騙局來宣傳他們的崇拜。同樣，迅速蔓延的生態崇拜也是今天最有影響的偽科學時尚。男男女女，如痴如醉，成了瘋狂的“環境恐怖主義者”；窮困錯亂的人甚至在家中焚燒自己的房屋，或

參加類似有組織的集體自殺，以便體驗某種星相學、宗教或其類似的迷狂，對國家的內部安全造成極大危脅。

所以，與嗜毒者類似的自我毀滅的狂熱分子一樣，消費主義者帶着貪婪的欲望關注着那些騷動，有意無意地在毀滅國家和他們自己。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悲劇。因此，人民當中盛行的觀念常常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是來自我們內部的敵人。

就這樣，你們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或失去了農場，或失去了醫療保險；這都是因為其他某些人，比如華爾街的騙子，搶劫了你們，以便能保持他們給你們生存開出的“合理”價格。在你們幸災樂禍，損人利已，得到“合理”的價格時，你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你自己的痛苦完全是自作處受，是自己貪婪，顛狂行為的報應。當你今天或明天坐在家里，不名一文、窮極潦倒時，你是不是會用“最低價格”來度量自己自私自利、一步一步走向毀滅的歷程？“消費主義”這個瘋狂的風氣就是促使國家和自己滅亡的方式。看見周圍正在滅亡的一切，難道你就不會說“我們應該有更好的辦法”？

的確有更好的辦法。這就叫“精神健全”。沉疴需猛藥，是采取理智的政治行動，使國家和人民恢復清醒的時候了。我們首先來看看農民與某些被誤導的工聯主義者之間有關“農業等值價格”的爭論。討論一下使核心選民，如農民與工聯主義者能走到一起的方式。這也許會使堅持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傳統的許多選民回到清醒的政治道路上來，使我們整個國家恢復清醒和理智。

3.1 農業等值價格

消費主義思想散布的瘋狂觀念，其最可悲的例子是農民與工會選民之間出現的幼稚的冲突。這一冲突在七十年代重新復活，在冲突中工聯主義者既沒得到物質上的好處，也沒得到名譽上的利益；而美國有效的農民組織卻完全消失。我們以此作為恰當的客觀事例，說明如何處理民主黨核心選民之間的關系。

回想一下1977年至1981年卡特曇花一現的政府。1970年至1972年尼克松總統錯誤推行伯恩斯經濟和貨政策，七十年代中期國務卿基辛格一手炮制的石油價格鬧劇，這些都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為了治療這些副作用，1977年，密爾頓·弗里德曼教授（Milton Friedman），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亨利·基辛格開出了第一劑貨幣主義的蛇油。結果給美國曾經欣欣向榮的農業體制造成巨大的災難。絕望的農民將隆隆的拖拉機開進華盛頓，要求卡特總統還他們以公正，結果沒有奏效。僅這一次事件還不足以在1980年卡特總統爭取連任時擊敗他；但隨后一系列的事態發展終于將卡特趕出了白宮。

就在這個時候，我于1979年至1980年參與了民主黨1980年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競選，這后來成為“反三方委員會”意義重大的事件。反三方委員會于70年代中期在農民、工聯主義者和其他領導團體中發展起來。1977年至1980年的運動盡管持續到80年代末，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更長，但在運動中涉及到的農民和勞工在1981年初已開始退卻，在當年中期運動基本結束。例如，1980年在我爭取提名成為民主黨候選人時，美國農業運動（AAM）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聯盟，到1981年初便已癱瘓，幾乎消亡；到1983年春，美國農業運動實際上加入了它1977年至1980年的敵對力量，并給我和其他人發出信號，意思是他們早就期待着有一個體面、平靜的政治結局。

這一可悲的結果完全出乎誠實的農民或工聯主義者的本意。他們完全被雙方背后形形色色的政治和金融利益所操縱，甚至包括來自白宮與副總統喬治·布什特殊利益十分密切的圈子，以及詹姆斯·貝克爾第三（James Baker III），他們在1980年選舉后對農民進行卑劣的政治威脅。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民主黨的圈子，所謂的“波爾·韋維爾”派系在1980年至1981年間已經逐漸成為共和黨喬治·布什陣營中遠遠右翼的成員。在敘述了這么多的背景之后，我把這個問題的討論局限在與今天問題有關的兩點上：1）政治金融集團操縱的方式；2）民主黨本應完成，但沒有完成的事情。

讓我們看一看農民組織的這一邊提出的問題。正象全國農民組織（NFO）的成立是為了對抗農業局向貨幣主義投降的路綫一樣，美國農業運動的出現是為了填補一個無能的政治法律騙局形成的政治真空。這一騙局依靠政府腐敗資助，維護金融機構的利益，反對全國農民組織的領導核心。

最典型的美國農民是應用相對的高技術，家庭內部或家庭經營200至400英畝土的農民，或經營相應規模牧場的農民。除了某些特別有奉獻精神的機床企業家外，美國農民是所有行業中最勤勞的實業家，他們是農產品和生產過程的技術帶頭人，在生產技術和農業管理方面受過良好的教育。我所見過的主要農民組織中大多數全國和地方領導人都是异常聰明的公民和稱職的農民。我見過他們相當多的代表，當然在我的朋友和其他人中也有些人精于投機專營，讓人十分難堪。

從我認識的，或聽說的主要農民組織的領導人來看，農民當中的主流相對都具有較高的素質，包括具有較強的道德觀念。無論是遇到霜凍、疾病、干旱或滂災，他們都力爭生產出高質量的農副產品。他們具有傳說中那些職業道德，在令人厭惡的經濟環境下他們不得不這樣。聯邦政府和金融家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相互勾結，迫使整個美國農業舉步維艱。農民典型的信念是絕不放弃工作，只要一息尚存，他們就會完成工作。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國農業和農民一直面臨三種威脅。第一，不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看，典型的美國農場都只是小型耕作，在市場中他們必須艱苦奮斗才能生存，而市場又是由世界上某些最強大、最殘酷的金融辛迪加所控制。第二，農民必須應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腐敗墮落。明尼蘇達人的傳記，例如，飛行家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和他英雄父親的傳記，或前副總統蒙代爾和他父親的傳記都表明，農業州選舉的代表常常被迫代表金融家在農業中的利益而不是生產農戶的利益。目前，由華爾街在聯邦行政機構和國會中控制的資源所代表的金融利益往往是農民的敵人。第三，自從英國廢止《谷物法》以后，典型的金融寄生者意識到廉價產業勞工的利潤，玩弄政治伎倆，犧牲農民的利益，利用廉價的食品來欺騙有組織或無組織的勞工，使他們成為金融家的工具，與農民作對。后一種因素導致了1965年后消費主義風氣的出現。

北美農業政策問題在歷史書籍中有詳細的論述，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中葉馬薩諸塞海灣殖民地。這里，我們只要回顧一下在林肯總統大選之后農業等值價格發展過程中幾個主要特征就足以說明問題。為此，我們應強調，自從共和國創立以前，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歷史中的主要問題都集中在美國政治經濟體制與其主要對手、英國金融寡頭君主制的冲突上，體現在美國明顯的保護主義與英國所謂的“自由貿易”的冲突上。有時美國政府是愛國者，站在農民和美國自身的合法利益一邊。但更多的時候美國政府就不那么愛國，常常站在倫敦、同時也是華爾街一邊，犧牲農民的切身利益，常常成為英國君主制的前哨而不是美國領土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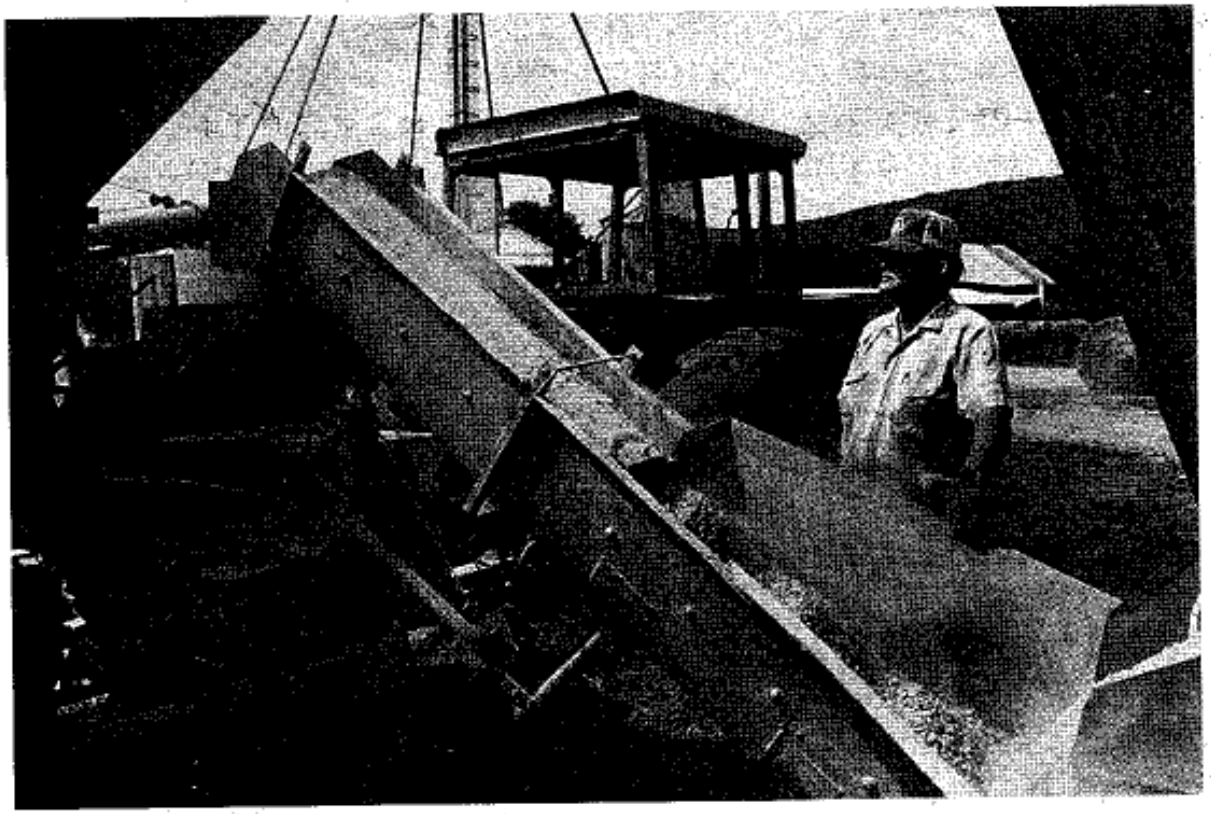
農業等值價格問題始終是愛國者與買辦之間在農業問題上的分界綫，這是二十世紀大多數時候衆所周知的問題。究其本質，農業等值價格必須為國家戰略目標服務，滿足三個基本要求：

1．國家糧食和相關農產品供給的質量與數量必須滿足國內外戰略對農業產出的質量和數量的需要，滿足按人口和平方公里計算對農業生產率的要求。

2．為此目的，支付給農業部門的價格將高于農業部門實際產生的直接和間接成本；要滿足上述要求，其差額應等于估計的平均營業利潤。

3．上述計算將以當前需要與預計未來需要為基礎。必須考慮到為了實現當前和未來的目標，農民和政府機構今天必須投資，改善資本。

公正地說，如果考慮到所有相關的戰略問題，其中包括為了上述目的所需要的農民數量和土地面積，所謂的和所計算的等值價格應該是，在當前情況下公正估計的、支付一般農民的價



由于旱災使牧場干枯，一個佛吉尼亞農民嘎嘎出聲地擠壓玉米去喂小牛。"在整個二十世紀，已知的愛國者和買辦走狗在包稅區問題上的分界綫始終是和農場價格對峙一樣。"

格。這就是說，當平均經營價格在連續數年內降到等值價格的 90% 以下，某些農民要滿足合理計算的、國家戰略需要的生產實際資本，就要受到低于標準的價格的影響。

當經營價格連續數年降到等值價格的 60-70%，這就意味着，我們政府是在允許、甚至鼓勵偷竊大多數農民的生產性資本和生活積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長期以來我一直將農民中喬治·布什的支持者看成是布什聯盟中的農民，將變幻莫測的"波爾·韋維爾"菲爾·格拉姆的支持者看成是布什聯盟的政客。如果我們允許價格大大低于上述價格，或允許價格過低的現象持繼若干年，我們是在不可逆轉地摧毀我們未來的糧食供給源，這實際上是在謀殺世界上某個地方日益增長的糧食消費者，其中包括美國國內相當數量的糧食消費者。

這就是對國家糧食供給政策基本問題的客觀估計。下面我們將概括北美等值價格觀念產生以前的歷史。

美國農業等值價格的發展有其歷史根源。從十七世紀英聯邦統治下的馬薩諸塞建立起小型的共和制的時候開始，美國人民就將棘手的北美荒原改造成居民肥沃的領土。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溫思羅普和馬瑟的政策就是例證。到十八世紀初，殖民者的主要思想是向西挺進，將整個大陸改變成新的共和國的基地。新的共和國創立的政治經濟原則就是科頓·馬瑟以及受馬瑟影響的年輕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思想。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殖民地自治政府奉行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政策就是修建公路和水路，將阿巴拉契亞山脈貫通，打開到西部領土的通道。當時本杰明·富蘭克林，以及其后的喬治·華盛頓正逐漸嶄露頭角，成為溫斯羅普、馬瑟、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亨特（Hunter）和斯波茨伍德（Spotswood）思想的繼承人。

在十七、十八世紀，直至狂熱親英的特迪·羅斯福總統推行相反的政策以前，可航行的水路，公路和鐵路向西擴展，并因此帶來了新開辟道路沿綫農業的發展。這是我們年輕的國家軍事、國家安全和經濟政策的基礎。

基本建設的發展與技術進步交織在一起。詹姆斯·門羅總統、J.Q.G 亞當斯總統，以及他們關鍵的合作者馬修·凱里，亨利·克萊和德裔美國人弗里德里克·李斯特（28）以更豐富的方式

繼續推行上述政策，成為后來林肯總統的開路人和向導。衆所周知，美國西點軍校這所偉大的工程學校在西爾韋納斯·塞耶領導下的發展就是上述政策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克·李斯特在美國和歐洲早期鐵路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是上述政策的一部分。隨后，由于麥考密克收割機制造技術和賈斯特斯·利比格（Justus Liebig）化學成就的影響，政府贈與地學院體制和美國農業部建立起來；以費城為中心、橫跨大陸的鐵路成功地將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起來，農業沿鐵路向西擴展。

通過這一段經歷，我們主要的愛國者清楚地認識到，真實產生的農業產品的成本應包括：經濟基本建設的維護與發展、將荒原改造成沃土、完成這一切需要的技術進步、包括公衆教育和提高家庭消費水平、生產者不斷從技術上改進質量、增加產量等成本的總合。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農村電氣化規劃，就象早些時候美國工程兵在水資源管理方面作用的發展一樣，體現了人們對糧食真實成本的理解。人們意識到，糧食成本不是單個農場和牧場成本的相加，而是開發和維護美國整個土地面積，使其成為肥沃和技術進步的土地資源，以滿足糧食供給的戰略需要所需的成本。

這一現實在本世紀農業等值價格問題的發展中得到了反映。在即將結束的本世紀中，兩次世界大戰軍事和相關的需要，促使聯邦政府認識到農業等值價格政策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安全，以及發展和維持我們的軍事力量都有重大意義。順便說一句，西點軍校培養的最優秀的軍人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但那些愚蠢的家伙，如今天現任國防部長科恩、亨利 H. 謝爾頓將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或副總統戈爾，他們没有，也許永遠也不會認識到這一點。

如果被迫支付給農戶的“高價”等于農業等值格的 100%，甚至更低，只有可悲的文盲或道德觀念錯亂的人才會找出理由聲稱消費者受到欺騙。

我們不能將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一塊面包或一袋土豆作為指數，只能用實際市場籃子（不是價格）計算，以 1966 年至 1967 年標準的農戶產業經營作為指數。考察農戶的糧食成本（名義價格）在整個市場籃子的名義成本中的百分比，比較農民為經營農戶消費的農產品所支付的價格和經營農戶在商店中購買同樣農產品所支付的價格。

然后，再將同一農戶糧食消費內容的質量進行比較。排除消費者飲食習慣中如某種脂肪過多、不利于健康等因素，家庭食品消費中有什么樣的相對變化？

現在來分析支付給農民的價格與產業經營家庭在商店購買食品支付的銷售價格，檢驗兩者中間的價格構成。讓我們來看一看零售商的成本與價格構成因素；用商店貨架空間的綫性經營面積來衡量，計算那一貨架空間綫性經營面積的商家的成本與支出。在付給農民的價格與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之間，差別究竟在什么地方？

首先比較 1946 至 1967 年期間的差別。

然后思考 1967 年以后某些不愉快的變化，其中包括 1971 年尼克松總統和阿瑟·伯恩斯有關金融與貨幣錯誤政策的影響；70 年代中期國務卿基辛格與倫敦策劃的石油價格騙局產生的影響；其后卡特政府推行的金融貨幣政策，以及 1981 年春里根總統愚蠢地決定步卡特之的后塵，繼續支持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卡以及沃爾卡提出的三方委員會匯率政策。

研究七十年代及以后中美洲國家和南美洲國家債務水平的趨勢會十分清楚地説明在 1971 年至 1981 年期間摧毀美國農業的那些同樣的問題。

1．比較中美洲和南美洲所有國家的債務加上那些國家的實際貸款轉讓的總額。再加上 1971 年至 1988 年任何選定期間到期債務產生的還貸利息。然后，在總額上減去這個期間這些國家還本和還息的總數。根據這樣的計算，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加起來，總共在債務帳目上幾乎不欠國外債權國什么錢。然而，今天這些國家的外債大大超過他們在七十年代的債務！我想出來了！你看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977 年至 1988 年的債務騙子局！（圖 2）這都是根據“映象”推算出來的，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浮動匯率的管理方

圖 2A

拉丁美洲國家銀行統計數字

(10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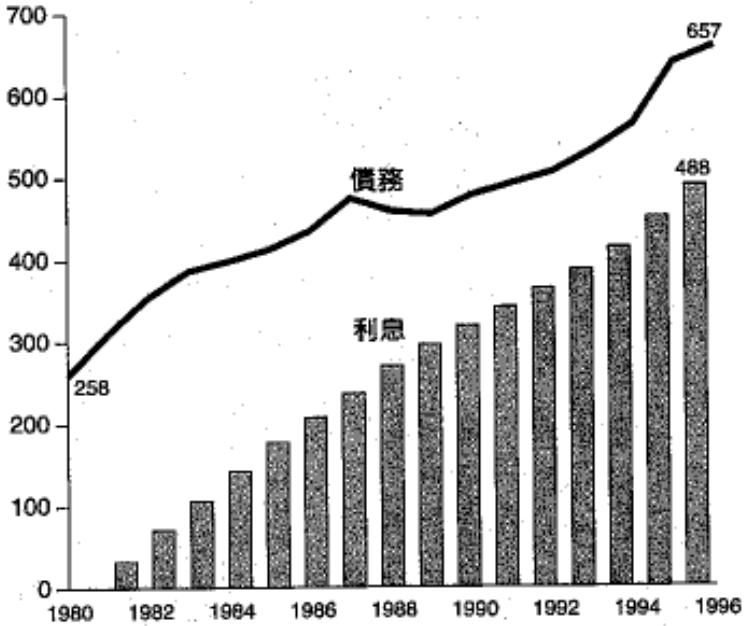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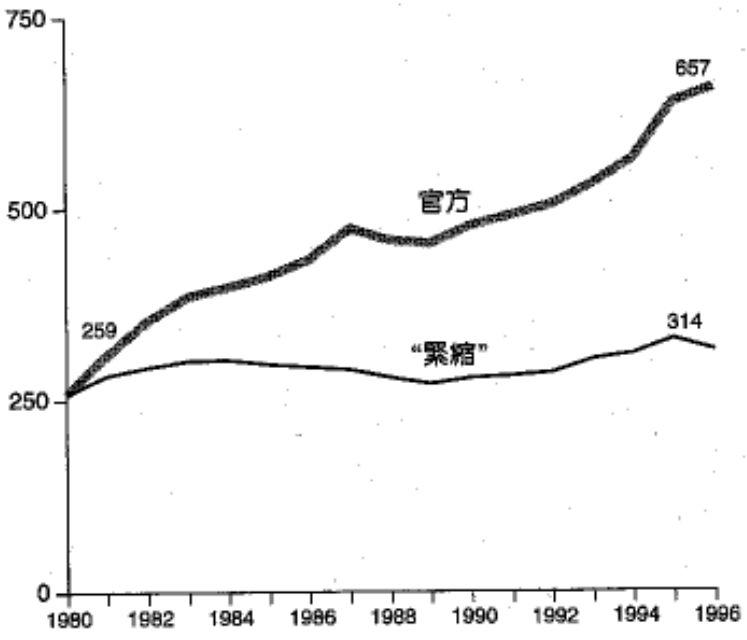


圖 2B

拉丁美洲國家: 外債

(10億美元)



1980年至1996年期間，拉丁美洲國家支付4480億美元償還外債的累積利息，盡管如此，官方外債從1980年的2590億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6570億美元。盡管上圖扣除了分期付款和該地區的新貸款，但在考慮這些因素之後，（圖2B）1996年的欠債會從6570億美元"緊縮"到3140億美元。

要計算出這個地區完全"緊縮"的合法外債，我們還必須考慮拉丁美洲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出口價格下降，進口價格上漲），非法資金外流，以及強制性地區貨幣貶值。這一切加起來將使總的合法債務低于零。

式完成的。1971 年 8 月，尼克松總統愚蠢地推行浮動匯率體制。美國農民的情況也很類似，正如喬治·索洛斯（George Soros）等人上演了 1990 年至 1998 年俄國的債務騙局一樣，喬治·布什總統和艾爾·戈爾副總統的金融搭檔導致了當前美國農民的艱難處境。

2．在國務卿基辛格任期的最后幾年中，他為倫敦"七姐妹"即石油卡特爾效力，在令人震驚的石油價格騙局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急劇上漲的能源價格成為非石油輸出國和某些石油輸出國的貸款－債務不斷陡漲的起點。

這兩個例子使我們重新回到 1975 年至 1991 年冲擊美國農民的形勢上來。

如果將食品價格中所有非農業費用除開，從戰后時期到 70 年代中期，美國農業生產顯著的技術進步在美國消費者的農業淨成本中占有非常低的比例，這涉及到許多因素。在資金問題上，最關鍵的因素是農業產品在資金密集和能源密集方面迅速增長。例如，大量的鋼鐵以鋼管和農業機械的形式投入美國的農場和牧場，農業（和其他）生產消耗的能源不斷上升。資金密集的高增長率使農業對貸款成本十分敏感。能源密集使農業對能源成本的上漲更加敏感。能源價格上漲，卡特政府推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武斷的、瘋狂暴漲的利率，這些對美國農民都是沉重的打擊。和儲蓄和貸款業一樣，美國農民直至今日始終未能恢復過來。

為了確保美國農民没有喘息的機會，三方委員會破壞性的工作，卡特政府解除管制產生的連鎖反應，以及對農業等值價格相應的攻擊，都給予農民以更沉重打擊。1980 年，里根在競選中因反對三方委員會政策而擊敗很有把握、一直領先的喬治·布什而贏得共和黨的提名；大選中他又在同樣的問題上擊敗卡特。但在里根總統執政期間，農民的處境并未改善。里根政府中三方委員會的鼹鼠比卡特政府中多得多，其中包括喬治·

布什。加恩－聖－杰曼法案完全顛覆了被沃爾克破壞的儲蓄和貸款業，聽任布什副總統那幫垃圾證券中的同伙肆意搶掠，就像爭奪腐尸的禿鷲。卡特政府推行肯普－羅思法規將無法擺脫的債務危機轉變成了華爾街豢養的怪物，這個怪物甚至危脅要吞噬聯邦政府本身。

所以，到1982年至1983年，作為政治運動的美國農民運動實際上已經消亡。我的朋友和我都曾努力挽救，如果當時得到有組織的勞工和其他某些選民更有力的支持，農民運動的消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現在我們必須研究這一段歷史，以便了解具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傳統、以核心選民為基礎的民主黨必須用什么方法進行重建，這是國家最需要的時候了。既然我們討論了農業等值價格的某些重要歷史和其他有關問題，我們準備考察農民與勞工之間的政治關系，以此作為範例來研究核心選民的組織問題。

3.2 農民與勞工

自從十九世紀開始，除了我們共和國傳統上的國外敵對勢力，如邊沁（Bentham）、卡斯爾雷（Castlereagh）、帕默斯頓（Palmerston）領導下的英王國和梅特涅（Metternich）為首的神聖同盟以外，在國內還有四個主要的敵人。

英王國一直在企圖摧毀我們共和國，將美國重新納入英國的控制範圍。國內四個主要敵人中的三個就是這樣一伙英國死心踏地的工具，長期從事叛逆活動。（29）其中第一伙人是極有權勢的家族，在1814年哈特福德會議的叛逆活動中他們扮演了主要角色，因而引人注目。他們是新英格蘭的“高貴血統”，仍保持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貿易商的傳統。第二伙人與華爾街有緊密聯系。這伙人通過創建曼哈頓艾倫·伯爾（Aaron Burr）銀行而組織起來。艾倫·伯爾銀行是當時英國外交辦公室的御用工具，伯爾受英國外交辦公室主任杰里米·邊沁的操縱。伯爾、馬丁·範·布倫（Martin van Buren）、J. P. 摩根和奸詐的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代表了受倫敦控制的華爾街的利益。第三伙是南方各州的奴隸主及其走狗，在目前包括了阿爾伯特·派克的三K黨，以及相對的羅伯特·佩恩·沃倫（Robert Penn Warren）和威廉·楊德爾·埃利奧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領導的“納什維爾農民黨”（Nashville Agrarians）。

從1814年“哈特福德會議”的罪惡陰謀之后的活動，到1865年在倫敦的唆使下，瓦解蓄奴州與反蓄奴州之間的聯盟，分裂美國，這三伙人的行為臭名昭著。在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將軍1864年代表民主黨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麥克萊倫是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利益的保護人。

在國內的第四種敵人是心地比較簡單的一類。第四類敵人表現出的行為是，美國大多數公民往往在無意中被人利用，相互攻擊。原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把這類人稱為被托馬斯·霍布斯野蠻的“個人對抗全體”的哲學思想敗壞了的人。（30）這就是霍布斯、洛克、亞當·史密斯和杰里米·邊沁所謂的“享樂主義的原則”，“占山為王”的游戲，或“吃掉你的鄰居的政策”。所以，在后一個問題上，林肯總統會說，我們大多數選民總是被愚弄，成天忙于與其他選民的恩恩怨怨，爭權奪利，在國家處于日漸加深的衰弱、日益擴大的貧困、或受到國內外宿敵顛覆的時刻，從不關心拯救國家于危難。這是一般的模式，前面已經提到，第四種敵人有時使農民和工聯主義者在農業等值格和消費主義的問題上相互對立。

在最近幾十年中，民主黨在農業等值價格問題上主張“廉價勞工”態度是愚蠢和自我挫敗行為的範例。這種做法令人反感，使民主黨在民意測驗中常常得不到支持。例如，戈爾副總統在“重塑政府”的口號下，推行全球化廉價勞工的政策，他利用反勞工的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威逼墨西哥類似奴隸的勞工成為自己的工具，搶奪許多美國民主黨選民體面的工作。

戈爾副總統的非法政治產物北美自由貿易區（31）對美國產業勞動力帶來嚴重危害，勞工和民主黨愚蠢地支持或容忍反農業等值價格、主張廉價食品的行為，以及所謂的“取消管制”的措

施也同樣造成了嚴重危害。我對農業等值價格問題了解得比較清楚；在整個過程中我都在場。

民主黨領導層中甚至也有人在助長農民與勞工之間在農業等值價格上的冲突。這種癌疾在許多地方以類似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在林登·約翰遜總統執政時推行“貧窮計劃”的主要腐敗之處。在尼克松執政時期所謂的“福利改革”政策下，貧窮計劃迫使貧窮的農民與有組織的勞工去爭搶日益減少的利益。奧韋廉（Orwellian）在霍布斯“個人對抗全體”，“某些豬比其他豬更平等”的思想上形成自己的觀念，他用極其可笑的奧韋廉觀念所取代“機會均等”的原則。

人們在等候室無意中驚駭地聽到一個戰后出生的人說：“她就不能理解這會花費我們多少遺產。”這是指老年父母高昂的醫療費用。這立刻讓人想到在荷蘭，一種合法的謀殺形式被稱作“非自願協助自殺”，這種謀殺形式已經得到通過并開始執行。這同時讓人想起在30年代及后來那一段時期，納粹推行類似的“無用的吃飯者”計劃。人們已經聽到第四種來自共和國“內部的敵人”的聲音：“我才不管農民；我在超市中買牛奶！”

要解決兄弟間相互殘殺和冲突，真正的辦法就在于經濟學家描述的“勞動分工”。對此，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791年12月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論制造主題》中作過論述；天主教思想家則將其描述為“休戚相關”。漢密爾頓對功能性相互依賴、制造業與農業相互依存、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相互依存作過論述；從今天更高的立場上來閱讀這份報告，我們會發現它的預見性。漢密爾頓的描述可以恰當地概括為：“有用的人都相輔相成，都需要發揮良好的功能。”

一個國家內的人民如此，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如此。所有形式的勞動在功能上都相互依存，如果我們站在經濟科學更高的立足點來看，所有形式的勞動都是有用的。這就以最簡單的方式說明了其中的共同利益。除了我們所理解的勞動外，還應包括生產思想的活動，這涉及到自然與其他原則總量的增長。這樣，相互依存，以及隨之而來的共同利益的含義就相應擴大了。這就意味着從實物經濟和其他角度來看，勞動分工的意義就擴大到了永恒。

與某些雇主或其他人狹隘、無教養的思想相反，真正工資的含義不是過去勞動的報酬，而是象花費在培養未來勞動力上的支出一樣，是對未來經濟的資本投資，因而也是對社會未來的投資。正如將荒原改變成良田，正如對新建的工廠、更好的機床、或研究與開發進行投資一樣，工資必要的內容不是雇用勞動者上周所作的工作；而是因為今天他的教育、經驗和工作條件的改善，他或她明年或在下一代能够更好完成的工作。經營利潤的含義使人們注意到這個基本的事實；如果排除騙取工資或類似的偷竊等道德問題，經營利潤唯一真正的來源是下一階段淨生產力的收益。這種收益產生于在過去階段中物質經濟業績的改進。誰要是没有理解這一點，誰就得去學習最基本的經濟知識。

我們有理由猜測，今天國會里共和黨人中亞當·史密斯的崇拜者，特別是那些遠遠右翼人士，如蒙特皮勒林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愚蠢的前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英國失敗的“弗蘭肯斯坦怪物”試驗、現任首相托尼·布萊爾必須學習經濟學簡單而又基本的課程。真正聰明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應該比他們了解得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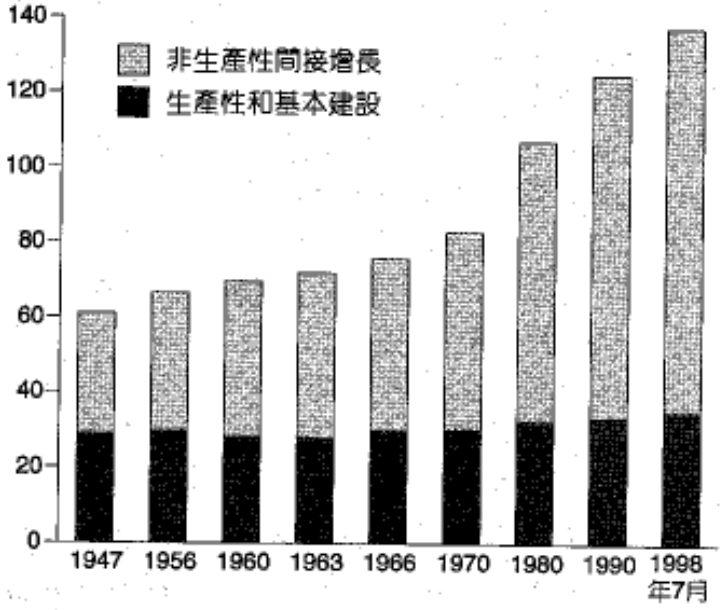
阻礙人們了解基本的經濟學事實最主要的政治原因是雇用勞動力社會成分的變化。物質財富生產中雇用的勞動力比例逐漸減少，使勞動力流向那些收入高、不過也有收入低、卑微的，常常甚至是寄生性的服務行業。（圖3）從事實際商品生產的經驗，如農業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的經驗，使人對經濟問題具有理性的認識；從事卑微服務性工作的人，相對于三十年前，容易對經濟問題產生較差的理性認識。我并不想讓人對三十多年以前的勞動力產生美好的幻想；我在當時，以及現在回想過去，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幻想。我只是想強調，在過三　十多年中，人們對經濟學的理性認識已下降到災難性的程度。

在實際生產過程中，企業管理，工程技術人員和雇用的職工，包括在生產車間從事管理的白領雇員的工作是對“我們賣主”提供的原料或半

圖 3

美國勞動力, 1947-98: 非生產性間接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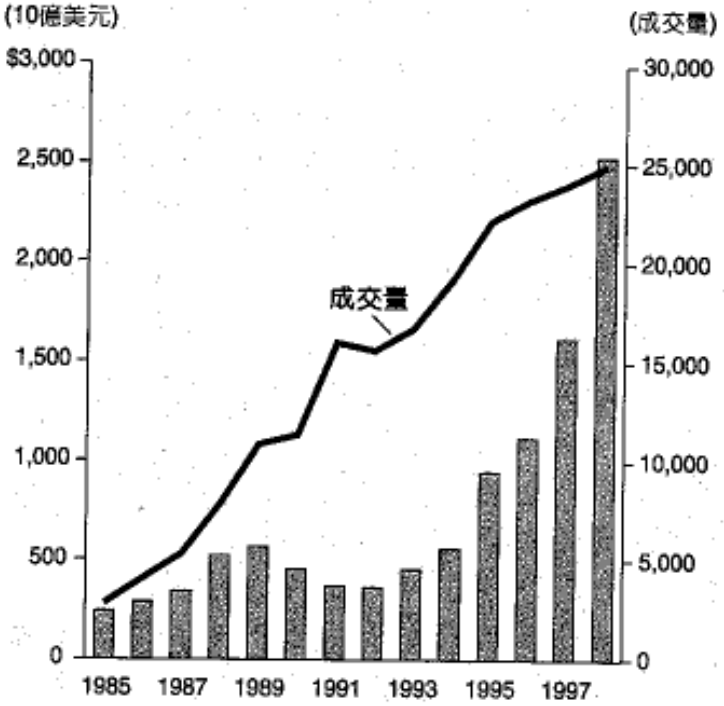
(百萬工人)



資料來源: 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

圖 4

全球兼并與買進公告, 1985-98



資料來源: 證券數據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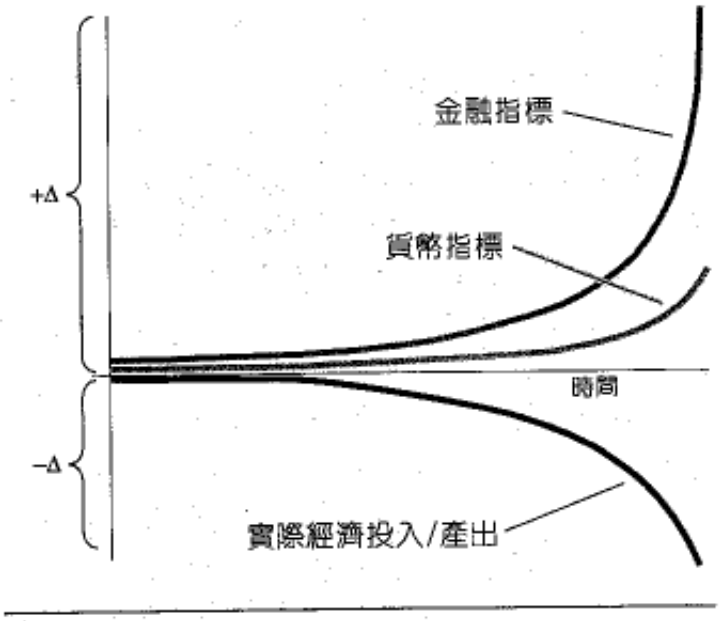
成品進行加工，我們再將其送往下一道工序，直到大家熟悉的“成品”的最終消費點。作為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來看，美國主要的自我形象是高生產力的農業－工業經濟。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由于“后工業化社會”神話的肆意蔓延，這個形象發生了悲劇性的改變。我們在許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后工業化經濟”；與三十多年前相比，這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來看貧窮的根源，我們畏縮心靈感到厭倦的根源。

看一看最近二十年公司之間瘋狂的兼并、買進和接收浪潮表現出的相關性。(圖 4)我們的經濟完全變成華爾街投機專營、同類相食的經濟。其后果是什么呢？在今天“垃圾債券”和投機牟利的控制下，很大一個部分的勞力和整個仍然十分重要的生產能力已被削弱，這對我們經濟是無可挽回的損失。公司之間連鎖信式的兼并、買進和惡意接收，使北美的經濟和歐洲的經濟一樣，變成用自己的胳膊和腿來填飽肚子的商業群落。(32)

考慮一下，今天要維持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同樣的生活水平，每周工作時間和往返于家庭與工作單位之間的時間要增加多少。讓我們看一看，并扣除家庭消費中甚至是邊際的部分，這部分目前只是某些家庭收入的臨時津貼。后者只是家庭總收入的一部分，是美國聯邦儲備體制極度通貨膨脹在泡沫和笨蛋經濟中注入貨幣和信貸的副產品。從投機市場獲得的資本收益，其中的一部分被用來作為公共基金帳戶或零售和其他銷售的支出；從那里，資本收益的某些部分變為信貸，一滴一滴地流入家庭消費。所以，只要華爾街極度通貨膨脹溢撒出的部分仍在繼續細流，給廉價勞工或家庭收入某些補貼，人們就暫不會覺察基層全面蕭條的發展速度，看不見通貨膨脹對今天或明天零售價格、失業蔓延和家庭收入的影響。

請看一看我的“三曲綫”圖。1995 年底我在歐洲參加了兩次會議，在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中“三曲綫”圖首次與讀者見面。(圖 5)這張圖表描述了自 1966 年至 1967 年開始的形勢變化后，美國和世界經濟變化的幾個最重要的參數。

圖 5
典型的暴跌函數



圖中描述了三個變量，每個變量都按人口計算。最上面一條向上的曲綫代表金融指標，其中包括所說的“派生”指標。中間一條逐漸向上的曲綫代表貨幣指標，大體相當于美國的 M-3。下面一條向下的曲綫代表實際市場籃子指標。這張圖描述了主要是美國、西歐和日本經濟從 1966 年至 1967 年開始至今潛在的發展趨勢。1966 年至 1967 年是 1967 年英鎊貶值，以及其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 1968 年 3 月采取危機行動的起點。這些又是 1971 年 8 月舊布雷頓•伍茲體制系崩潰的前奏。上圖的右邊代表從 1997 年 10 月開始，現行國際貨幣體制正在運行的終點。在圖右端幾乎垂直的最上一條曲綫“金融指標”，預示了極度通貨膨脹的崩潰過程。這于 1998 年 8 月爆發，并從此延續至今。這會把我們引向本世紀最嚴峻的經濟衰退，引向全球性，或幾乎是全球性未來美元、英鎊和日元以及即將出臺的歐元極度通貨膨脹崩潰 — 除非在最近的將來開始啟動我所描述的、新的貨幣和金融體制。

這張圖表現的不是三個彼些獨立、或半獨立的因素交匯到一起。這個三個指標是同一個多連通簇的組成部分。下面是主要的函數相關性：

1．在目前的狀態下，全球化金融體制的繼續存在不是依賴于從已經加速崩潰的實際財富生產中獲得的經營利益，而是靠在金融體制中注入貨幣而產生的金融資本收益。這些資本收益，甚至我們滿懷希望期待的資本效益（正如毫無價值的互聯網股票的價格在瘋狂攀升一樣），是整個體制主要金融收益的來源，以及金融指數繼續上升的杠杆。簡而言之，整個金融體制代表了“約翰法”式的金融氣泡；一旦氣泡停止膨脹，就會出現內爆。“砰”地一聲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2．為了防範金融泡沫崩潰，必須維持貨幣指標的增長速度，向貨幣機構付款，促進金融泡沫的增長。既然整個實際經濟在實際經濟賬目上是淨虧損運轉，通貨膨脹需要的支付增長速度只能靠同類相食的辦法，靠損害實際經濟的緊縮辦法才能達到。這就反過來加速實際經濟的萎縮。

最近國際貿易暴跌，美國和西歐工業和相關產業的就業率急劇下降，而且以后的勢頭會更猛。這都是上述緊縮措施的反映。即使代表美國及戈爾副總統的“新的冷戰姿態”極大地增加了軍費開支，建議采取措施，推動蕭條的經濟，這也許會使曲綫有細微變動，但無關實旨。與此同時，金融氣泡膨脹的速度，為了繼續支撐氣泡而加速貨幣流動的速度已經到達某種極限，支撐金融氣泡的任何進一步努力都會引起冲擊波效果，就象冲破了所說的“音障”。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維持這個體制的努力只能使它“轟”地一下完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看清了 1998 年 9 月中以來金融形勢的發展，但華爾街或華盛頓政府都沒有準備采取理智經濟政策的迹象。華爾街、華盛頓、以及大多數西歐國家和日本都已要作出反應與德國和它的外國顧問促使它在 1921 年至 1923 年間對魏瑪極度通貨膨脹氣泡作出的反應一樣荒唐。當時的金融氣泡將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納粹推上德國重要的政治地位。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七國集團政府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最近已作絕望和瘋狂的反應，決定自

1998 年 10 月起，推行“暫行的危機管理辦法”——極度通貨膨脹。

由于七國集團政府，艾倫·格林斯潘和其他人在 1998 年 10 月作出的瘋狂決定，全球金融危機在 1999 年 1 月中旬已經廣泛惡化。但是，那些亡命徒至今仍頑固地拒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那些中央銀行和政府準備在未來的數周內，仍然象 1998 年 10 月那樣采取瘋狂的行動。其結果之壞，將超過我的大多數讀者現在能够預見的程度。如果這種“擺脫困境”的努力沒有使金融體制炸個粉碎，七國集團政府和其他人在這次危機之后，肯定會對下一次危機作了更瘋狂的反應，大大超過 1998 年 10 月或 1999 年 1 月初他們的反應。

這就是偉大帝國瓦解的方式，就象詩人雪萊虛構的奧西曼迭斯傾復在荒漠之中。當行將滅亡的帝國衰弱到一定的程度，它們完全喪失了繼續存在的道德合理性。他們一意孤行，自我毀滅。他們過于瘋狂，甚至無法想象在現行全球金融體制不可避免地滅亡之后還有其他生存的可能性。

對上述形勢的分析將我們帶到組織核心選民這個關鍵問題上來，使我們去考察在農業等值價格問題上農民與某些工會團體的分歧所具有的更廣泛的意義。

在這樣的形勢下，無論當前全球的金融和貨幣體制出現什么變化，我們的工作，我的工作，特別是民主黨的工作是采取和執行有效的政策，確保共和國和我們的人民能生存下去，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懷着這樣的精神和承諾去應付安德魯·梅倫（Andrew Mellon）時代的大蕭條，我們必須牢記這樣的精神和承諾，并把它作為我們今天的口號。

成功的關鍵在領導。我們大多數公民，特別是核心選民都願意去戰勝比庫利奇（Coolidge）和安德魯·梅倫總統三十年代更嚴重的蕭條。但是，不能勇于責任的軍事領導人無法成功地應付險惡的戰爭；同樣，如果沒有承擔經濟責任的政治領導人，沒有合格的領導，我們的公民往往不能動員起來，成為反抗經濟毀滅、爭取勝利的隊伍。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美國人曾團結在羅斯福總統的周圍，進行“被遺忘的人”的事業；今天他們期待着新的國家領袖和其他輔助領導人的出現，期待着在危難之際地方選民中能出現團結一致的領導。

英國操縱美國國會中遠遠右翼的野蠻人，對克林頓總統發起日益凶惡的攻擊；結果，克林頓總統的支持率卻直綫上升，據報導接近百分之八十！從中我們應該學到一些經驗和教訓。每當總統發起反擊，他的支持率就迅速上升。為什么？原因不是選民相信克林頓總統，大多數人并不相信他；選民憑自己的感覺作出反應。盡管克林頓總統優柔寡斷，在反勞工問題上與陰險虛偽的艾爾·戈爾一唱一合，但他是遠遠右翼接管國家的最后一道障礙。絕大多數選民支持克林頓的主要原因是，他們非常害怕一旦總統失敗他們將面臨的結局，他們的擔心完全是有根據的。

這一次克林頓總統絲毫沒有他常常表現出的優柔寡斷，在危難之際他表現出的勇氣代表了一種領導素質，這是國防部長 W. 科恩、亨利·謝爾頓將軍以及副總統戈爾等首腦委員會一把手絕對缺少的素質。讓我們回顧 1948 年。哈里 S. 杜魯門從來不會“動搖”，1948 年他在小鎮競選中表現出的戰斗姿態壓倒了穩操勝券的總統候選人湯姆·杜威：第二天在回家的一路上，共和黨人流下了不少失敗的泪水，草地上確實沾滿露珠。杜魯門是個糟糕的領袖，但他表現出領袖的素質使他贏得了每個鄉村角落的選票。這一結果是自我陶醉的杜威始料未及的。同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愛德華 R. 默羅（Edward R. Murrow）播送著名電視記錄片的聲音引起雪崩似的反響，沉重地挫敗了當時的遠遠右翼分子，挫敗了被認為是不可戰勝的競選班子參議員喬·麥卡錫以及“迪克”莫里斯卑劣的兄弟羅伊·馬庫斯·科恩。沒有領導的號召力，即使是非常強大的軍隊也無法團結一致，戰勝組織嚴密的弱少的軍隊，正如今天國會和新聞媒體中堅持彈劾克林頓總統的派系一樣。

領袖的表現形式、大小和素質盡管有所區別，但在預見到的危難之際，只有領袖才能動員民衆，避免失敗。民主黨的領導核心大多數十分軟弱，戈爾十分軟弱，但如果沒有克林頓總統表現出的堅定素質，總統已經完了，這個共和國也

許已經完了。不要依賴“迪克”莫里斯那套軍服在民意測驗中的作用，不要等待選票，要以領袖的素質去爭取選票。選民們正在等待，準備作出反應。核心選民會作出反應，正如總統最近受困，其支持率卻直綫上升，其中離不開核心選民積極的反應一樣。

在深刻和廣泛的危機面前，要取得勝利必須將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團結一致。鼓舞人們士氣的因素在于道德的某些基本考慮。我們不能讓核心選民淪落為道德猥褻的地方“軍閥”，為了爭奪一點可憐的戰利品象土匪一樣相互攻擊。要把選民團結起來，形成戰斗集體，選民必須相互信任。空洞的宣傳，比如今天精于民意測驗、虛偽的政客所作的典型的詭辯，是無法奏效的。領袖產生于現所謂的“民眾意見”更深的層次。領袖素質植根于一種真實的意義。這種領袖素質會改變民眾意見，甚至迅速、深刻地改變民眾的觀念。

怎么可能改變民眾意見？如果一個時代流行的觀念會逐漸將一個國家引向自我滅亡，到了這個時候，誰還會如此愚蠢，將信任建立在民眾流行的意見之上？大多數人了解目前的事態，但他們只會聳聳肩，說，“誰能改變市政廳？”“誰會去改變民眾固有的觀點？”如果無法改變民眾的意見，國家就毫無希望。因此，要應付當前的危機，領袖必須具備兩個特殊條件：1）他必須讓人明白，民眾的意見是可以改變的；2）他必須讓人明白，他提出改變信仰是基于求真；從真實的角度來看，需要放弃的信仰是虛假的信仰。

領袖必須説明的最關鍵的真實是，民主黨的傳統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在民主黨核心選民中，不論是個人或是全體，他們都有明確的共同利益。體現這種共同利益的是農民企業家、工聯主義者、以及“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為主的少數民族中的主流。他們的確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根本利益超過了他們之間偶然的分歧。農民和工聯主義者在諸如農業等值價格問題上的相互冲突説明，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總的、真正的共同利益。

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在論述真正的“共同利益“時，有兩個問題需要説明，我已經説明了其必要性。第一，我在此時此地勾劃出的艱巨事業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完成的；第二，大多數聲稱保衛”共同利益“的人都不是真正在這樣做，他們要么口是心非，要么不知道該怎么辦。

有些人自詡為維護美德的旗手，鼓吹維護政治和宗教權利；只要一提到“共同利益”這個詞，這伙虛偽的小人、騙子，以及其他招摇撞騙的家伙，如臭名昭著、幼稚的民意調查者“迪克”莫里斯，立刻就會起哄。他們會煞有介事地宣稱，只有他們才真正得到啟示，發現了唯一的“共同利益”。其中有些騙子玩弄民意調查，另一些人則針鋒相對。在這些宣傳叫賣聲組成的大合唱中，人們聽到這樣的原則：“只要我們團結在……”

在騙子刺耳的大合唱中有一個持續的音部。那些未來的騙子菲尼亞斯 H. 巴納姆斯（Phineas H. Barnum）都一致認為，要欺騙廣大民眾，“你得實際一些。你説得對，夫人，那才是出路。”他會極力模仿演員 W.C. 菲爾茲（W.C. Fields）的表情，邪惡地眨一眨眼，旁白中帶有一絲惡毒的坦率。他的嘴角抽動一下，暗示他的隨從，“心地單純。你知道我的意思。”

要引進任何原則，例如要引進對民眾來説全新的共同利益原則，需要有與科學家發現普遍的自然原則同樣的條件。第一，必須出現信仰危機，出現已有的信仰無法解決的悖論。第二，必須激發起熱情與關注，以及相應的專心致志。科學家或學生成功地發現解決危機的原則，或重復上述發現均離不開上述因素。

我們以退休老年人為例。他們對公共基金帳戶上看起來很高的收益已經習慣。老年人開始依賴這些利益，甚至用它來解決每月簡單的生活，最好還有一點結余以備急用。只要老年人仍相信新聞媒體和公共基金的代表所編織的謊言，無論發生什么情況他都會一如既往，依賴公共基金，他或她很少在這個問題上采取理智的態度。相反，他們會象《推銷員之死》一劇中威利·洛曼，或奧尼爾戲劇《賣冰的人來了》中的希基一樣，絕望地抓住習慣信仰的稻草，甚至在無稻草可抓時也是如此。（33）年紀大一些的人都能回

想起來，在 30 年代大蕭條的前前后后，有許多人就是這樣。

這就是一種個人危機，它自然而然地影響到許多選民。這種個人危機預示着突然和深刻的變化；普通的政治民意調查者要么是不願意，如果他能够的話，要么是無法預測這些變化，即使是為了自己也是如此。歷史上充滿了本來可以預見的突然變故，這些變故使絕大多數受害者，其中還包括所謂的重要專家，始料未及。

如果不加以控制，這些危機會迅速引起絕望和悲觀的情緒。正是因為如此，當魏瑪政府的極度通貨膨脹將德國普通家庭的積蓄一掃而光的時候，希特勒便在慕尼黑啤酒廳的武裝暴動中從默默無聞的小卒一下子被推到權力的頂峰。在 1932 年底的大選中，希特勒和納粹的勢力正在衰退，1933 年 7 月 28 日倫敦策劃了針對德國馮·施萊謝爾政府的政變，1 月 30 日，倫敦的 H. 沙赫特使希特勒重新掌權，一時間德國民眾極度悲觀。針對馮·施萊謝爾的政變一個月之后到國會縱火案，希特勒控制了德國整個的政治生活。

我們應該看到，作為慣例，試圖用“危機管理”的策略來防範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就象 1988 年 9 月中以來克林頓政府支持的那樣，這完全是同樣極其愚蠢的行為。這可能導致隨后針對現政府的政變，為法西斯或類似的暴政開路。所以，在 9 月長期資本管理的災難以及 10 月七國集團會議之后，克林頓總統對“危機管理”的屈從實際上必然導致 11 月后的第二次投票，引發參、眾兩院彈劾的浪潮。

這與平常討厭的、馬拉松式的仲裁或類似的塔維斯托克（Tavistockian）、勒維奈特（Lewinite）的社會工作方法完全不同，這決不是企圖“消除分歧”。我們不應該讓步；民主黨已經以種種形式作過太多的讓步了。我們只能去探索真理。如果不是以真實與正義為基礎，任何對“共同利益”的領悟都會毫無價值；這里所說的真實與正義是柏拉圖和使徒保羅所理解的意思，是希臘詞語阿加比的含義。

因此，我們要考慮一下農民與工聯主義者關系的一些技術細節，以此作為真實解決我們核心選民共同利益的普遍原則。

3.3 方法問題

第一個需要解決的、純粹而又簡單的問題是謹慎考慮農民、工聯主義者和其他核心選民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貨幣不是實際利益，不象食品和其他有形商品，貨幣是無形的，也不代表某種服務，如醫療，或科學和工程學科的教育，能產生受益的有形效果；醫療和教育因而類似有形商品的消費。貨幣是一種虛構。貨幣的產生是靠印刷或發行被稱作“錢”的金屬或其他材料的硬幣。貨幣是通過發行一種針對發行機構的信用形式才具有貨幣的性質。貨幣的發行機構常常是政府或私立銀行，如聯邦儲備體制或其他私立銀行。只有在人們似乎相信它是貨幣的時候，貨幣才繼續享有作為貨幣奇特的神聖地位。這就是信用人被稱作“債權人”的原因。有時，如在 1923 年德國魏瑪政府時期，貨幣必需的信用與債權人的地位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

所以，就象有淡啤酒一樣，也有準貨幣。這樣來稱呼是因為它比真正的貨幣包含的內容要少。在今天的美國，M-3 一般包括各種貨幣和準貨幣，被認為是有信用價值的通貨形式，這是因為重要可信的官員和統計機構都這樣認為。

貨幣是虛構、并不具有內在的經濟價值，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賦于買賣的商品或服務的相對貨幣價值按買賣商品或服務的人均或面積計算，常常與單位市場籃子的內在價值無關，或關系很少。的確，貨幣常常用來買賣并不存在的商品或服務，或沒有內在經濟價值、甚至負價值的商品或服務。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黑利伯里學院（Haileybury School）經濟學家們宣傳這樣的神話：“自由競爭”的過程，正如瘋狂的理論家艾爾·戈爾胡說的，會“民主地”“從統計學上”聚集到“合理價格”上。如果這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就是一種神秘的謬見。萊布尼茲于 1671 年就奠定了經濟科學的首要原則，內在經濟價值應按市場籃子計算，按產品生產和銷售的方式，以及中間消費者和最終消費者的相對有形效果來計算。

實際市場籃子的效果包括個人、人口壽命和其他人口學的因素的相對變化，以及勞動生產力的相對變化。有人認為某些神秘的、非理性的機構，如金融市場，能以某種秘密的、統計的方式決定商品的實際貨幣價值。如果鼓吹這種迷信的目的不在于欺騙，這種觀念在無知迷信的民眾中純粹是政治虛構。

例如，一方是耕種200到400英畝土地的農民，另一方則是擁有買賣整個主要金融和政治部門的能力的國際食品卡特爾，人們怎樣才能在他們之間構築“平等（競爭）的賽場”？真正的“平等競賽場”實際上是農業等值的價格調節、保護性關稅、規範公共交通管理、能源供給等公共設置等等。相應，體重250磅的凶手與體重140磅的小伙子之間的“平等競賽場”有時就是散彈槍，或者可靠的警察。下一次你再聽見世界商海中狡詐的騙子在鼓吹“全球化”可以營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一定記住那位帶着散彈槍、體重140磅的小伙子。戈爾的密友喬治·索洛斯就鼓吹“全球化”，他們這類騙子摧毀了許多的國家；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想到要拿起保護主義的“散彈槍”。

除了所說的創造平等的競賽場之外，為了政府和民眾的利益，理性的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來控制市場。在科學技術進步、資金密集、能源密集方面進行有益投資，以提高國家的實際生產力，增加區域的就業。對這些投資所征收的稅額應大大低于金融資本的收益。慈善事業和其他公共利益的服務業為政府承擔了某些負擔，在稅收法規中應給予特殊待遇。關稅應該保護和推動合符國家利益的產業。一個自尊和理性的國家應該考慮家庭能够承受的最低稅率標準。但按照這一標準，對收入較低的家庭征收相同的稅率，如所謂的“統一稅率”的作法，在道義上和經濟上都是錯誤的。

簡而言之，主權國家應控制金融市場，明確法規中差別程章的細則，以及不言而喻的游戲規則，使市場運轉符合國家、人民及其子孫后代的利益；符合美國憲法要求的普通福利。如果你不喜歡，你盡可以移居英國（如果英國願意按接納你）。在英國，你可以象1776年、1789年、1812年和1861年至1865年時期我們的先輩一樣，更好地比較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代表的美國體制與亞當·史密斯等代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體制有些什么區別。

讓我們根據上述參考系來考慮農民與工聯主義者顯而易見的冲突。

我們向工聯主義者提出如下問題：“你是否贊成最低工資保護？你是否相信工會有權爭取合理的工資率？你是否贊成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安全保護？你是否贊成健康保險？你是否贊成工作環境安全標準？你是否意識到取消運輸管理后貨運業和司機失去了規範？你是否意識到取消服務和運費率的管制后帶來的一系列的不公平：美國許多經濟破產的地方再也無法參與競爭，發展產業，解決工作安置？你是否贊成每個人都應得到公正的待遇，享受這些不可缺少的管理和保護措施？”我們將這些措施統稱為勞動價格和農業等值價格保護。為什么農民不應該享受同樣的保護？

你是不是贊成那部分選民，如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有權享受同樣的規定和相關的保護和管理？那么，我們干嗎要喋喋不休地議論我們有權用更低價格去購買食品，損害農民的利益？我們的選民為什么要降低身份，象谷倉旁的牲口一樣，為撒落在地上或糟里的殘渣而你爭我奪呢？這里而涉及到一個什么原則？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這里面涉及一個什么普遍原則，一個對每個和所有核心選民都同樣有益而又十分必要的原則？

解決核心選民之間明顯的利益冲突的辦法在于擬訂出即將着手的工作，在議事日程的后面列舉出所有明顯的、直接的個人利益冲突，那些窮凶極惡的騙子正是利用這些利益冲突挑起選民相互攻擊。解決辦法在于確定共同利益的原則，再根據共同利益的原則來確定每個選民特殊的利益，這是排在議事日程首位的重要問題。共同利益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共和國獨立的創始人和憲法確認的普遍福祉。這就是民主黨領導人中每一個，同時又是全體有益的派別將使用的辦法。

為了從最新的參照系下來重新界定普遍福祉的原則，讓我們先看看三十年代建立的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34)

應該承認，每周工作40小時，以及或多或少類似的工作時間標準，在今天來看是歷史的遺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放弃了這個標準；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做在道義上是正確的，這是特殊的環境使然。在戰爭結束時我們應恢復40小時工作時間標準，我們没有完全按這個標準做，原因是后羅斯福政府錯誤的方針帶來的國際國內環境。在五十年代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美蘇關系出現裂痕，每周40小時的工作標準又得到恢復，并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中。從1966年至1967年開始，美國逐漸大幅度削減太空計劃和其他高經濟刺激項目，每周40小時工作時間隨之化為烏有，從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復。

40小時工作時間標準體現的經濟原則是，為了確保勞動力能達到一定標準的實際經濟淨生產力，生產中有兩個一般的要求必須確定并得到滿足：

1、整個人口必須具有標準的物質條件，包括人口統計學規定的家庭和相關的生存物質條件，以滿足人口的繁衍，保證其職業勞動力具有與潛在的技術與生產力水平相應的生理與智力潛能。

2、不少于大約60%的職業勞力力必須是工人、技術人員或專業人員，從事農業－工業生產，或從事基本經濟建設硬形式和軟形式的開發與維護。基本經濟建設是生產和勞動力家庭實現生產潛能的先決條件。如果這一比例因大量失業，或因銷售以及其他形式的服務業或管理人員的蠶食而降低，勞動力的整個生產力極其危險地受到削弱，就象最近三十年來出現的情況一樣，我們的經濟已退化到讓人迷惑不解的“后工業化”或“信息”經濟。

勞動力的生產潛能取決于勞動分工中的智力精英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部分精英主要在科學發現、進一步發展自然和藝術原則，以及實現那些根本目標的教育和其他文化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整個勞動分工的中心部分，科學與技術進步通過機床設計部門向整個機床領域輻射，然后輻射到改良的產品類型、知識精英的類型、資本密集、能源密集基本建設的發展、生產能力、以及專業工程人員和技術人員將技術進步溶入一般生產和分配過程的領域。

滿足上述要求取決于勞動力的素質。而當代勞動力的素質要求個人和家庭有一定的閑暇，即每周工作大約40個小時。一些特殊的職業，如企業家或專業人員，不一定都得遵守這個標準。工人40小時工作時間中必須包含智力生活，這至少是企業家或專業人員工作時間表的一個重要部分。(35)

在這一切里面，就業政策和家庭收入政策最重要的目標是為自己的后代創造更好的命運。不這樣看待問題的人不具備作父母的資格。在懷孕以前，那些謹慎的未出世的靈魂肯定希望享受公平的勞動保護，以確保生育他們的父母能承擔義務。(36)這些問題真正觸及到共和國的締造者所界定的“普遍福祉”更深刻的含義。

在討論了對共同利益有關的種種思考后，一個核心選民的代表就會對另一個核心選民的代表說，“行了，告訴我你要圓滿地完成工作，你和你的家庭需要什么條件。”當所有的選民提出自己的問題，發表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以后，普遍福祉中有關共同利益相當可行的觀念就多少確定了下來。

3.4 保護性關税

在前面一個部分，我強調過貨幣只是一個便于管理的虛構，并不是內在經濟值價的度量。即使是生產和貿易管理的工具，貨幣本身也無法正常發揮作用。貨幣必須受到其管理工具的制約，如保護性關税、信用政策、税收政策、形式調節手段，以便使原本無價值的貨幣發揮理社會期望的作用。

這里還有其他一些困難需要考慮：在談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強調過，經濟過程的內在價值無法用數量（即綫性的數量）來計算，没有一個簡單的標尺。宇宙中人類生活的一切只能用特殊的、

非綫性的標準，反熵式的變化標準來計算，正如古代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將變化確定為計算標準一樣。經濟過程中唯一理性的標準就是物質經濟的反熵增長形式。我在前面已經表明，所有實際經濟增長都是科學和技術進步，都是對與古典藝術作品形式有關的那些原則進行開發與利用的結果。古典藝術作品的發展形式不僅與作為科學的普遍歷史實踐有關，同時還包含了普遍的歷史實踐。

基于上述原因，要成功地管理國家和全球經濟過程，必須把它看成是實際經濟過程，其支配特征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古典藝術作品形式的表現。這樣，政治藝術的難題就體現在高斯－黎曼有序的多連通簇所表現的意義上。多連通簇的變化無法用綫性模式完全表述出來，也無法用歸納演繹的邏輯方法來解決。我們也許可以用歸納演繹來描述經濟過程的效果，但我們絕不能用歸納演繹來描述那些效果產生的過程。我在學術上公開的競爭對手試圖進行長期經濟預測，結果都徹底失敗了；而我作的預測一直都比較成功，這説明方法的選擇是問題的關鍵。

在高斯－黎曼反熵式有序多連通簇中，包括實際經濟過程中，從一個簇到下一個簇變化的制約因素是引進新的原則和應用新的原則。在作為科學的經濟學中，在作為政治實踐的經濟過程中，這些新的原則表現為新發現（或新應用）的自然原則與普遍的古典藝術本質相結合，這樣，向新的更高狀態的明顯轉變必然是應用未知的、不確定的原則而產生作用的表現。激進的實證主義者提出古怪的無序自明綫性過程，即人們熟悉的莫頓－斯科爾斯公式（Morton-Scholes Formula）。獲得諾貝爾獎的斯科爾斯公式竟可悲地無法預測經濟形勢的變化。有人主張從實證主義的思路來理解上述轉變過程，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我們要想法糾正這種幼稚可笑，同時又帶欺騙性的觀點。

上面所説的問題并不只是抽象的學術問題，與企業日常的生產與分配實踐活動毫無關系。華爾街和華盛頓的理論騙子千方百計試圖摧毀美國進步農民的實踐，摧毀曾經十分成功、現在正面臨毀滅的工業康采恩；在這個過程中，正是我在這里又提到的非綫性變化根本制約着、并且確定了成功的經濟政策和可能導破産的經濟政策。甚至在微觀的個體企業日常的生產活動中也是如此。

在微觀的個體企業中，生產實踐非綫性的，或反熵的本質在于我早些時候論述的個人心中反熵式、認知過程作出的判斷，在于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這一關系確定了那些個人認知過程之間的關系。

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在企業的活動中，更為復雜的企業管理特征得到論證之后，制定政策的非綫性活動被看成是“實際建議”，這很容易引起誤解。企業政策的制定和實踐最復雜、最關鍵的特性常常被理所當然地看成是實用性的東西，這完全是因為這些特性超越了以前會計師的理解，超越了其他歸納演繹對現行企業實踐活動模式的解釋。如果這些特性是正確的，但不“現實”的話，在形式主義者就没有現存的術語來描述他不能理解的問題。在“老板”將它作為政策采納以前，官僚主義者稱它為“非專業的”，甚至“草率”的；一旦“老板”將它制定成政策，官僚主義的形式主義者便禮貌地把它稱作“實用的”，與諸如“現行標準學説”或“專業化的”相對。

要反映出在結合原則中發生的變化，理性管理國家政治經濟的方式表現為“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讓瘋狂的無政府主義者捶胸跺腳，就象小説中的朗佩爾斯蒂爾茨金（Rumpelstiltskin）高聲抗議“命令經濟”的措施一樣。為了調整經濟和對外經濟關系，促進經濟環境決定因素的變化，在投資與商業中必須采取關税壁壘和其他形式的控制措施，這也稱“限制”（臨界與系數的結合）。采用并堅持這些措施是為了防範經濟不致于失控；如果不進行調節，經濟很可能失控。

所以，為了對新技術或新認識的其他情況作出反應，我們常常推行關税壁壘和相應的措施，使經濟避免遭受某些我們不希望出現的影響。在經濟過程的某些階段急需進行調節，但任何綫性原則都不能使經濟繞開危險的暗礁。順便提一下，這就是按計算機的模式來管理經濟，或管理一個企業必然會失敗的原因。

控制措施要完成的是制定臨界限度，如最低工資水平、每周標準工作時間等等，以防止經濟過程出現混亂。否則經濟過程就容易失控。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些控制性預防措施的重要性，讓我們來看一看伯納德·曼德維爾這位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律師的情況。他是由弗里德里奇·馮·海克（Friedrich von Hayeck）、密爾頓·弗萊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英國最冷酷的奶媽、原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組成的蒙特佩勒林協會的傳奇英雄。這個協會是全球傳遺產基金會和其他許多女巫集會的大本營，那些披着頭巾的野獸和其他怪誕的遠右翼分子常常在這里聚會、呻吟。

從在原則上看，曼德維爾與下面這些人撒旦式明顯的享樂主義毫無區別：威尼斯的保羅·薩爾皮（Paolo Sarpi），英國的霍布斯，約翰·洛克，亞當·史密斯和杰里米·邊泌，或法國重農主義者弗朗西斯·魁奈等人主張的激進的封建學說自由放任主義。他們只在風格上有所區別；曼德維爾是十八世紀阿倫·伯爾地獄之火俱樂部運動背后英國主要的理論家，他象賀加斯（Hogarth）畫中的某些人物，“公然跳出來”為撒旦張目。這也許是弗里德里奇·馮·海克非常看重曼德維爾的原因。就象著名的《蜜蜂的寓言》中描寫的一樣，曼德維爾寬恕了最不道德的行為，認為這是人類欲望的組成部分，必須讓其自由表現。曼德維爾認為，這樣惡就可以逐漸轉變成為圓滿的自由主義，代替真實與道德。賀加斯的畫《浪子的進步》描繪了曼德維爾的追隨者鼓吹的“自由貿易”的明顯好處。

英國典型的哲學家有霍布斯、洛克、曼德維爾、休姆、史密斯和邊泌。他們共同的成就在于他們都是前后一致的楷模，是魔鬼自己的邏輯學家。他們自始自終堅持錯誤，道德上堅持墮落，自始自終都給民眾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使民眾成為他們學說的犧牲品。這些自由派人士對限制無比憎恨；但是，這些限制對一個寬容的社會至關重要，對一個體面的國家至關重要。在過去 30 多年中，主張自由貿易的激進派的影響日益上升，我們的社會已不再是一個體面的國家了。

我認為，所有這一切全都包含在使徒保羅的《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中。道德不是準則：道德是方法，是與個人人性一致的方法，正如男人和女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就的一樣。人性主要表現于完全獨立的認知過程；依靠完全獨立的認知過程，人才創造了美好的事物，發現了自然原則，并使其成為改良的社會實踐的一個部分。

4. 新時代的結束

在競選聲明的前面幾章，我們已經強調了這樣的事實，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其生存不僅僅取決于拋弃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中形成的民眾意見，我們還必須恢復如今常常受到反對的思想。受新時代影響的一代人已經習慣地認為，這種思想早已過時，但同時又太新穎，無法接受。典型的例子是，許多較為年輕的成年人在看過半小時長的故事片“火星上的女人”之后，反應都不好。這部片子原來在電視網上播放，是1980年我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所作工作的一個部分。影片表現了一項長期的高科技項目。在幾年前，我構思出這個項目，并發表了項目的細節，這個項目可能成為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刺激因素。(37)影片中的項目完全能滿足在今后四十年內在火星上建立初始工作殖民地的要求。直到今天，新時代出身的那些人的典型反應是拒絕接受這種計劃，認為這是六十年代“過時的”念頭，早已被人遺忘，對今天的世界來說又“太牽強”。(38)

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部分強調的那樣，有關經濟和文化許多特別新穎的觀點在最近幾年非常流行，現在逐漸被現實所粉碎，理所當然地失去了權威性。激進的貨幣主義觀點和新時代的觀點已失去信譽，這使相對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注意到從三十年代華爾街大蕭條恢復時期民主黨的領導和選民中間流行的杰出思想。現在是恢復那些杰出思想的時候了，正是這些思想帶領我們走出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泥潭，使約翰·肯尼迪總統能成功地動員全國力量，按預定計劃將人送上月球。我們必須恢復以普遍福祉和核心選民思想為基礎的政策，這代表我們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傳統的向往；三十多年以前，這一傳統一直是我們的主流。

羅斯福總統的傳統自創立之日起，一直是我們最有用的法寶，要恢復這一傳統，我們必須分析我們論落、變化、使經濟遭到破壞的過程，分析當前處于支配地位的后工業化範例的變遷。我們必須分析，在三十多年后，使我們處于衰老的新時代末期的文化影響。我們必須概括這些自殺性觀點逐漸侵蝕我們的方式。我們必須分析這些思想得以侵入并流傳下去的方式所具有的明確含義。一句話，我們必須為垂死、衰老的新時代寫下墓志銘。

讓我們回想一個林肯總統充滿希望的思想，每當國家因自己民眾的某些嚴重失誤而遭受破壞時，正如新時代時髦的思想今天正在顛覆我們的國家一樣，我們要再次背誦他的格言：你可以偶爾欺騙所有的人，在大多數時候欺騙大多數人；但是，你無法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

林肯總統在被英國刺客謀殺前不久，在最后一次公開講演中他提到民眾愚昧的時期；今天，我們應以此為背景來牢記他的格言。在那個時期，林肯提出，剛剛投降的的南部聯邦應該重新回到共和國，就象他們從來也沒離開過一樣。這是偉大政治家慈悲政策的典範，同時他也承認，在大多數時候，我們國家所犯的嚴重錯誤是由于當時，現在也是如此，大多數人，至少是共和國一大部分人，又一次自己愚弄了自己。否則，南北戰爭、大蕭條以及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就不會發生。(39)

1997年6月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舉行的，以火星風光壁畫為背景的，火星開拓者飛行任務新聞發布會。1988年電視競選運動，“火星上的女人”用辨論證明一個旨在40年內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的計劃將對美國經濟起到自發的刺激作用。當時，很多年輕的成年人認為這個“牽強附會”的念頭令人作嘔；現在，這個國家的存亡全看是否仍然放任這樣那樣的邪惡腦袋的判定。

大多數美國人愚弄自己的習慣使自己遭受今天全球性危機。我們必須放弃自我愚弄的習慣，否則，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也不會克服目前的危機；即使我們在這次危機中能幸免于滅亡，國家至少也要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

在歷史上很多的時間里，過去那些消亡的帝國、民族、滅絕的文化，以及這些國家和文化的人民，他們的行為被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虛假觀念所控制。那些主導信念的專業名稱叫“思想”，通常最終導致民族、帝國和文化的滅亡，就象詩人描述的奧西曼迭斯，自作自受，在荒無人迹的沙漠廢墟中枯朽腐爛。我們毅然拋弃了英國帝國主義靠債券利息為生的人以及金融家鼓吹的帝國主義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如1776年至1783年的獨立戰爭，推行聯邦憲法，以及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成功地使自己三次擺脱了那些可能使國家滅亡的思想的控制；每一次至少是暫時擺脱了控制。(40)

讓我們以如今已變得陳舊的自我毀滅的思想，即今天那位白發蒼蒼、禿頂、大腹便便，危機四伏的新時代的思想為例。對我們美國人來說，新時代的觀念是從國外輸入的思想，是建立在“生態學”和“人口控制”偽科學和破壞性迷信觀念上的騙局。這種迷信思想現在的形式源于英國愛丁堡公爵及其獵奇古怪的兒子查爾斯王子所代表的階層。這種迷信思想有多種形式，大約從1972年開始就在所謂的“新左派”中流行；直至今日，它仍繼續以某種方式或在某種程度上糊弄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許多人。

然而，就象我多次說過的，新朝代的迷信思想如今已日薄西山。最近世界經濟蕭條繼續惡化，世界上戰爭和戰爭威脅又重新蔓延，這對新時代迷信是沉重打擊，其末日已經不遠了。我們要么拋弃這種迷信，象治療從國外感染的疾病一樣，要么疾病就要在毀滅自己的同時毀滅病人，毀滅美國和其他受害者。今天，你們每個人要自問的是，我們是不是要在新時代這艘年久失修，銹迹斑斑、裝滿傻瓜，開始漏水的破船沉没之前拋弃它？

絕大多數暫時流行的思想，如“新時代”時髦的生態學觀點，它們最聰明的地方在于這些思想含有鎮痛劑，可以暫時緩解愚蠢的信徒自我毀滅的痛苦，就像那些致命的“消遣”藥一樣。在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思想都給人以幻想，使人無

法意識到這是一種思想，一些幻覺，最終將毀滅繼續受蒙騙的人，甚至使整個社會走向滅亡。

我們以目前世界金融體制的崩潰為例。這個例子最能說明極端瘋狂的思想所帶來的后果。

在不久的將來如果有人要書寫危機的歷史，我們會看到，今天金融形勢突然惡化不可避免地將發展成嚴重的經濟蕭條，究其原因就是最近華爾街新的暴跌。事實將說明，導致新的世界經濟蕭條的暴跌與1998年9月23日華爾街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破產同時爆發。長期資本管理是維護紐約和其他各大國際銀行利益的陰謀集團，是以腐朽的戈爾副總統在華爾街銀行業，以及俄羅斯投機商黑手黨中的同伙組成的國際財團的核心。

要了解思想如何引發新的世界經濟蕭條，在這里再次指出下列事實是十分重要的：1997年羅伯特C. 默頓（Robert C. Merton）和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因提出黑－斯科爾斯公式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黑－斯科爾斯公式更恰當的名稱是“黑洞公式”（The Black Holes Formula），這一理論將長期資本管理，大部分美國和世界銀行體制吸入全球金融派生物的黑洞，在三個多月之后仍不見其洞底。

更糟糕的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格林斯潘與西歐各國中央銀行的行長，再加上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政府，都以最狂熱、最不理智的方式對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破產作出反應：通脹性金融資本注入。更糟的是，自從1999年新年開始以后，世界墮入了比1997年10月或1998年8月到9月重新爆發的危機更加深刻、更加廣泛的全球金融崩潰。甚至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格林斯潘和七國集團以更無節制的方式進行通脹性金融資本注入。如果不加制止，他們將使全球重蹈1923年德國賴希斯馬克（Reichsmark）通貨膨脹崩潰的復轍。

這不是你的貨幣在曼哈頓大通銀行或花旗銀行中發揮作用，這是思想在起作用，這說明中央銀行的銀行家，甚至七國集團的政府首腦全都發瘋了。戈爾的“信息社會”愛好者俱樂部所謂的網上股份就是最恰當不過的標志，戈爾的華爾街“衍生金融交易”愛好者俱樂部，即長期資本管理組織，于1998年9月召開會議，正在將當前通貨膨脹的瘋狂行為引向華爾街。如果我們要仔細考察“黑洞”（默頓－斯科爾斯）陰謀是如何出臺的，那么9月23日長期資本管理的崩潰以及后果就可以看成是所謂“信息社會”思想騙局的產物；目前正在出現的全球金融潰敗就是自我毀滅的“新時代”鼓吹者后工業化烏托邦的典型表現。（41）

美國是1964年至1972年所發生的變化的自然產物，必然受到來自歐洲那些自詡為神學思想的顛覆。這種思想有時被稱為“寶瓶座時代”、“新時代”或“搖滾樂－毒品－性青年－反文化”。（42）1964年至1972年間出現的所謂“文化範例變遷”有時以“信息社會”和“后工業化”烏托邦主義的化名出現。（43）在這些化名下，“新時代”思想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事業機構，成為1976年至1988年期間“象往常一樣的政治”中的流行思潮。這一變化實際上導致了我們國家和西歐經濟的破產，如果按美元價值計算，這也導致了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經濟的破產。“寶瓶座時代”的鼓吹者宣稱，寶瓶座的到來將結束雙魚座（基督）的暴虐統治。“新時代”思想如今已經老朽，氣息奄奄。今天，鼓吹“與往常一樣”的政治和政府的大好時光已經結束。

以上我們簡要地回顧了一下過30多年中的變化，回顧了這些變化是如何將我們國家引向當前爆發的危機。

自從約翰·肯尼迪總統、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馬丁·路德·金和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一個接一個被政治謀殺之后，美國，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走上了一條艱難、毀滅的下坡路。在美國國內，一小部分人顯得非常富有，然而那些原來靠自己的勞動能有穩定收入的生產企業家、技術工人和專業人員卻變成了新的窮人，債臺高築；整個人口中處于絕望悲慘境地的人數急劇增長。這些變化表現為大多數公民、政治派別與民選政府日益疏遠，這在八十年代初表現得尤為突出。

所有這一切每況愈下都不是非這樣不可，這是我們絕不應該走的路。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條泥濘不堪道路的盡頭，前面沒有跨越深淵的橋

1964年里"正是那幫急促地奔跑經過俄德·滕爾墨的國際電視舞臺的斃頭死成為一種英國侵略的時疫，"將"新時代"文化示範引進的手段。

梁。我們沒有選擇，要么一頭掉進深淵，要么轉身回頭。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們政府和政黨在過去三十多年中養成的習慣造就了我們今天面臨的全球經濟、社會和政治災難。

現在是轉變觀念的時候了。是清掃房間的時候了。首先要清掃的地方是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后，當前這些混亂逐漸積累起來的地方。這些混亂就是發端于所謂的"新時代"。

1964年，英國的甲殼蟲象瘟疫一樣蔓延，風靡埃德·沙利文的國家電視臺。從那以后，在肯尼迪總統以后的1964年至1972年以后的階段，我們大多數民衆在精神和其他習慣上發生了劇烈變化。這一變化有種種名稱，"新時代"、"性革命"，"搖滾樂－毒品－性－反文化"或"文化範例變遷"。這象一種新的惡性性病四處蔓延、從美國和歐洲的大學生到更廣泛的年輕人和年輕的成年人。大學生畢業后，通過私有和公共企業機構慢慢向上升遷，"新時代"的觀念也隨之對國家文化和經濟政策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在七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新時代的政策思想就象吸血鬼一樣緊緊地咬住了我們主要政黨和政府機構的脖子。

對于政黨的傳統選民來說，這一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震驚，而且是一場經濟和文化災難。許多家庭因參與了技術進步和提高農業、工業和經濟基本建設的生產力而得到生活和社會保險；如今，他們在生活水平和保險標準上都經歷了一次令人震驚的倒退。從1971年8月15日不祥的事件開始，隨着尼克松總統推行后來大家熟悉的野蠻的緊縮一攬子計劃中"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方案，人們更尖銳地感受到上述變化。從那以后，美國勞工的生活水平和經濟安全感開始直綫下降，最后變成絕望。1971年8月15日，舊的布雷頓·伍茲體制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混亂和毀滅性的"浮動匯率"貨幣體制。到1975年至1977年，我們大多數生產選民感到的經濟震驚已遠不只是痛苦而已了。

1979年開始采取的措施，再加上卡特執政的最后幾年采取的一系列取消管制的措施，從根本上粉碎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從那以后，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黨傳統選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每況

愈下。其結果是原來相對較窮的人感到絕望，原來成功的農民、產業工人、獨立的企業家、科技專業人員和老年人也感到前途無望。大多數家庭中，成年的家庭成員每人被迫從事二到三份工作。即使如此，今天的實際收入水平比二十五年前，甚至十年或六年以前的可比收入都要低得多。

目前正在進行的全球性危機帶來了上述特殊的震驚效果，在早些時候，這會使那些較為幸運的國家和他們大多數的民眾擺脫長期流行的幻想。這些幻想可能導致他們的滅亡。然而，僅僅是防範過去的壞思想還不够，我們得防範被未來新的壞思想，甚至更壞的思想所侵蝕。我們不能忘記，阿道夫·希特勒是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相對集中的一系列事件后在德國掌握政權，并鞏固政權的。開始是 1933 年 1 月 28 日至 30 日的議會政變，2 月 28 日的國會縱火案，然后是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7 月 25 日奧地利陶爾斐斯 (Dollfuss) 被暗殺，8 月 2 日興登堡總統 (Hindenburg) 逝世。為了防止我們采取某些新的反應，使類似希特勒的事件重演，我們決不能莽撞行事，陷入啤酒廳毫無理智的感情用事，被民眾的情緒所左右。

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面臨的局勢，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對自己帶來的后果，認識到這一切產生的原因。否則，我們便不能真正擺脫那些致命的副面影響。這些影響是長期流行幻想的產物。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下面一部分的兩個問題：是哪些人，為了什么目的干了些什么事？這一切又是如何完成的？

4.1 新時代：一個戰略問題

自耶穌基督及其主要門徒主導的基督教開始一直到現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自然觀念以及對人類自然權力和義務的不同看法一直是所有歐洲擴張文明的主要戰略問題，并因而引發國與國之間正規的、有時是非正規的戰爭。這一戰略問題可以簡明精確的方式概述如下。一方面，先知摩西說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均是造物主按照自身的形象創造出來的。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另一方面，羅馬帝國時期的巴比倫卻給我們留下了那一份可怕的遺產，也就是時至今日艾爾·戈爾副總統還在極力維護的那種可怕的觀念。(44)

與臭名昭著的約翰·洛克和洛克的追隨者、法官坦尼一樣，艾爾·戈爾聯合了共和國及其文明不共戴天的敵人，反對基督教關于人類自然屬性的教義。在英聯邦王室、愛丁堡公爵和其他相關集團的影響下，戈爾狂熱鼓吹人類生性就是一種動物，因而在法律上只配擁有與牲畜同等地位的觀念。正如早期的約翰·洛克、坦尼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等實證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一樣，戈爾的墮落和對基督教的反對，無疑使人受制于非正常的法律觀念，使人像畜群一樣接受審判和處死。這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實為奴隸主或農奴主的即興所為，或由遵奉戈爾思想的國家政權以犧牲其臣民的利益的方式來進行。

一方面，基督教堅持認為社會事物必須在法律上按照基督教關于人的自然屬性的觀念來進行安排。另一方面，關于人的自然屬性和法律屬性一直都存在着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觀點，代表這些觀點的有已經衰亡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帝國、羅馬帝國、歐洲封建主義和古代威尼斯的金融寡頭統治以及代表短命的美國南部邦聯各州的憲法和反道德觀念。這后一種觀點是戈爾副總統極力表明和推行的觀念，是美國及其敵人之間冲突的根源，這些敵對勢力包括英國王室和梅特涅的聖神同盟以及美國南部邦聯的種族主義者和當代“新邦聯”的流氓暴徒。他們的存在是對美國國會、聯邦法院體系和聯邦司法部的污染。

新時代是由英國王室的英－德金融寡頭泡制的一種腐朽的意識形態，它的目的是削弱、毀滅美國以及那些在自然原則的觀念上和對民族主權的維護上與摩西的基督教觀念保持普遍一致的民族。新時代的產生和發展從根本上就是要消除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社會形態，剝奪他們的自然權力以及《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緒論中普遍福祉原則賦予個人的權力。這些觀念正是我們這一執法、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共和國建國的基礎。

英國王室從來都是基督教自然原則的敵人。(45) 這種敵對狀態根植于篡位者和屠夫奧林奇

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所推行的政策，也根植于奧林奇的威廉的信徒漢諾威·喬治一世登上聯合王國王位時的英國王室本身。自 1688-1689 年聯合王國限制馬薩諸塞州各殖民地的權力以來，美利堅共和國與英國王室之間不可避免的冲突就隨着第一位英國君王、威尼斯式的寡頭喬治一世的上臺而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顯現。自 1815 年法國在威靈頓公爵和富歇的傀儡路易十八統治下遭到破壞以來，以英國的卡斯爾雷和梅涅特的神聖同盟為代表的勢力的主要目標一直是顛覆和摧毀美利堅合衆國。對他們來説，美國這個主權-民族國家是當今英國王室“永遠的敵人”。

邦聯分裂主義者在南北戰爭中被擊敗之后，美國在 1861-1876 年間成為技術上最先進、國力最強盛的現代民族－國家，迫使英國王室被迫由公開發動戰爭轉而進行顛覆活動。為了達到這后一個目的，英國王室依賴于“高貴人士”、華爾街和邦聯殘余隱密組成的叛國集團，讓他們成為新形勢下的大英帝國“英聯邦”的美國代表人物。正是這一針對美國的新的戰略姿態，使新時代的新威尼斯崇拜得以在美國一八六五年的勝利之后不久即產生。加入這一崇拜集團的全是一些自我聲稱的陰謀家，如牛津大學的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神智運動、屠殺非洲的羅茲計劃、（46）以及由牛津和劍橋控制的思想基地費邊社和二十世紀初的圓桌會議。

勃拉瓦茨基夫人、艾雷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和亞歷克斯·明特（Alex Munthe）等人都説明了新時代運動形成方式的本質。尼采的存在主義者、作曲家瓦格納、希特勒、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以及與喬治·盧卡科斯（Georg Lukacs）有聯的所謂“法蘭克福學派”就是這一運動的結果。此外，卡普里島也一度成為這個撒旦式反基督運動的狂熱中心。通神運動的實質顯然是惡毒的、反基督的。戈爾副總統“世界宗教”方案中的思想伙伴、英國王室的愛丁堡公爵把通神運動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無論過去或現在，這個問題的實質都是巴比倫王朝對基督教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造物主按照自身形象創造這一摩西原則的仇視。

儘管操縱新時代運動的幕后力量一直是英國王室，但新時代運動的根源卻是梅涅特王子的神聖同盟解體之后的封建貴族及其走狗的道德敗壞。憤怒的封建貴族們都渴望回到過去的年代，再度實行其統治，因而成為保守革命的核心力量，并由此產生了理查得．瓦格納、弗里德里克．尼采和阿道夫．希特勒這樣的納粹狂熱分子。在美國國會，代表今天“新邦聯”的是被打垮了的邦聯奴隸主的“貴族統治”，如羅伯特·沃倫（Robert Warren）和威廉·艾略特（William Elliott）的納什維爾“重農主義者”。新時代運動得以在今天開展的關鍵在于英國王室。而在美國，南部邦聯奴隸主的“貴族統治”代表的卻是今天美國國會“新貴族”的納粹狂熱。（47）對于今天正在準備下屆大選的美國公民來説，充分了解這種心理以及了解美國的對手都是十分必要的。

具有代表意義的是，保守黨人的革命應能解釋理查得·瓦格納對巴赫、莫扎特和貝多芬音樂的反猶太憎恨。（48）所謂的保守黨人是十九世紀新康德和后康德的浪漫派人物，他們的憤怒與過去弗雷德．阿倫廣播劇中被刻畫成滑稽可笑的“克拉格霍恩參議員”的邦聯奴隸主的憤怒如出一轍。他們之所以憤怒，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了給本階級帶來滅頂之災的威脅，因此決意通過最為可怕的報復方式來恢復他們的權力。（49）

因此，要了解歐式的保守革命，人們必須了解歐洲的封建貴族以及他們的走狗，這就好象傳説中瀕臨滅絕的物種注定要發怒一樣。這樣才能深入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等人的心理。

對另一位寡頭的走狗亨利·基辛格來説，歐洲那些受到威脅的封建貴族就是仇視美國革命和一切與革命有關的東西的封建貴族。（50）因此，神聖同盟的代表們就把他們的仇恨歸咎為現代農業和工業國家采用了“美國模式”這一事實。就像行將滅絕的最後一個種群的最後一聲鬼哭狼嚎一樣，梅涅特和没落貴族均希望美洲從來不曾被發現，那些實際上或基本上失去往日威風的没落貴族希望現代歷史的車輪倒轉，希望消滅美國，因為美國的勝利不僅是在于它獲得了獨立，而且

是建立了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主權民族－國家。

貴族們的榮耀已不復存在，但那些氣急敗壞的、有文化的沒落貴族開始認識到，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和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基督教關于所有人都是造物主形象這一教義的直接結果。尼采就是這些明白這一因果關系的浪漫派走狗中的最典型代表。

他們叫囂：殺死基督，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們急于根除一切，包括摩西留傳后世、使基督教得以傳播的東西。尼采首先公開宣稱自己反對基督，當然也少不了一八四八年之后的浪漫派人物，如作曲家理查得·瓦格納和他的追隨者希特勒。他們實際上是說：隨着占星時代的結束，世界必然回到异教諸神的時代。

用你的鼻子去聞一聞保守革命的惡臭吧，你會了解這些保守革命黨人的狂暴靈魂究竟意味着什么。帕默斯頓勛爵之后的英國王室撿起來的正是這樣的污濁之物。他們并不僅僅是這一家族的成員，而且也是家族中可以隨便犧牲的斗鷄。他們這樣一只力量可以引導到消除美國革命影響的軌道上。就像那些反美的保守革命力量和縮在地堡里的希特勒一樣，企圖在毀滅他們自己之前先毀滅美國革命。

所以，在二十世紀來臨之即，反基督的存在主義者尼采就把卡普里島，即提比略二世的皇宮遺址選定為他們的精神中心。這一選擇因為有了歷史上反基督原始化身的提比略二世的存在而得到了證實。阿道夫．希特勒曾通過赫爾曼．戈林去購買卡普里島，試圖以反基督的提比略第二自居，但卻遭到當時該島主人的拒絕。而歷史告訴我們，殺害基督的人正是提比略的女婿龐蒂亞斯·彼拉多，他執行的也許正是提比略發自卡普里島的命令。

這個精神中心的英裔頭目、通神運動最大的領袖是克勞利。克勞利把朱利安和奧爾德斯·赫胥黎兄弟倆領進了他們的圈子，并與赫胥黎兄弟一起成為H.G.威爾斯和伯特蘭·羅素的政治、文化密友。朱利安·赫胥黎對促進今天的優生學，或所謂的生物學運動，以及奧爾德斯·赫胥黎在創建“搖滾樂－毒品－性”反主流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均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很快你將了解有關威爾斯和羅素密切關系的有關情況。

新時代的“信息社會”觀念是與這兩個人有密切關系的圈子的直接產物之一。諾伯特·威納教授被公認為偽科學及宗教狂熱或個人崇拜的創始人，他與小喬賽亞．梅西基金會資助的組織關系密切。該組織的成員包括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夫人和她從前的丈夫格里哥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該組織是由伯特蘭．羅素和新時代的羅伯特．哈欽斯于1938年創建的，與戰后麻省理工學院的RLE有着很深的思想淵源，同時也與大英帝國在美國的旗手、戈爾副總統在紐約聖約翰大教堂的一幫朋友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聖約翰大教堂及其林迪斯芳信徒(Lindisfarne cult)對格里哥里．貝特森于1972年在美國公開發起的生態學狂熱運動起到了關鍵作用，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馬林·明斯基博士和諾姆·喬姆斯基教授在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制造“人工智能”的偽科學騙局，也是這個圈子的直接產物之一。與這一圈子相關的還有一度為羅素走卒的威納，米德、貝特森、哈欽斯和羅素等人。他們在一九三八年建立了一個叫做“科學聯合會”的組織，并以其作為所有這些“新時代”運作的保護傘。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些人在美國本土建立了新時代的思想體系。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和瑪格麗特·米德“隱身”的所謂美國人類學校就是這個思想體系的產物。（51）這一思想體系有許多十九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歷史根源。但是，與我們的研究密切相關的卻是與極端親英分子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有關的歷史根源。

與西奧多．羅斯福有關的人物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集中在普拉茨堡老式訓練營地的人。在那里，英－美－加聯盟表示要讓美國回到英國王室的懷抱，進而使英國的王室在美國得到鞏固。今天，英－美－加聯盟在美國主要的情報機構仍然是由華爾街的銀行家和律師組成的所謂的權力集團，其代表人物有史汀生、哈里曼、洛克菲勒、杜勒斯、邦迪和麥克洛伊。我們之所以把這個權力集團稱為陰謀集團主要是因為它使人想到臭名昭著的斯圖亞特光復內閣以及克林頓總

統最討厭的在華爾街的敵人，或艾爾．戈爾副總統在華爾街的主要朋友。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代表這個陰謀集團影響的是創建于二十年代的紐約外交關系理事會）。該理事會是英國皇家國際事物協會在美國的前沿陣地。

以上兩條綫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美國華爾街集團、通神崇拜運動掀起的“新時代”運動和英－美－加聯盟的活動，是了解今天給我們的共和國帶來最大戰略威脅的關鍵。所有這一切活動的口號加在一起不外乎就是“世界政府”，或“全球化”等。

英－美－加聯盟中的華爾街集團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要剝奪英國王室之外所有國家的主權，“消滅”美國，使英國王室具有當英聯邦皇帝的資格。（52）這就是所謂的“世界聯邦”或“世界政府”的計劃，也就是被看作“重建政府”的計劃。它是戈爾副總統在愛丁堡公爵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指導下經營起來的。（53）

組建世界政府的計劃在本世紀的早些時候被認為是一項英國人的計劃。它與 H.G. 威爾斯（Wells）、洛德·洛西恩（Lord Lothian）和伯特蘭·羅素的名字聯系在了一起。H.G. 威爾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即撰文明確指出建立世界政府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后，來自新時代的伯特蘭·羅素在差一點就把世界政府計劃付諸實現的過程中扮演了主角。的確，正如我將揭示的相關事實所表明的那樣，世界政府的核武器以及新時代思想的傳播是同一戰略計劃中相互依存的不同方面。核武器負載的世界政府計劃與新時代思想的結合，構成了今天世界上所有危險冲突的一個關鍵因素。

我曾經在不同地方撰文詳細討論過這些問題，下面我將扼要敘述如下。

4.2 核武器、亨利·基辛格和世界政府

核戰爭的概念首先由性生活過度的科幻作家、狂暴的空想主義者、費邊社領袖 H.G. 威爾斯提出，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公諸于世。在此期間，威爾斯擔任英國王室的對外宣傳大臣一職。從一開始，威爾斯就提出要把發展并使用核武器作為逼迫各民族放弃主權、臣服于世界政府權威的一種手段。之后，在二十年代晚些時候，他與羅素就“公開陰謀”（The Open Conspiracy）計劃達成一致，并由羅素成功地勸說美國發展了核武器。不久，在瘋狂而強硬的“轟炸機”溫斯頓·丘吉爾的支持下，原子彈并非出于軍事防御的目的扔在了廣島和長崎。

正如他在 1946 年 9 月的《原子科學家公報》中公開宣稱的那樣，羅素促使發展核武器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世界政府。他堅持認為美國和英國都應該準備用原子彈轟炸蘇聯，以防蘇聯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拒絕接受把聯合國改造成為世界政府，從而達到一舉剝奪世界上所有國家主權的目的。在以后的一段時間里，羅素繼續鼓吹走以核武器創建世界政府的道路，這不僅僅使亨利·基辛格奇异地脫胎換骨，而且還使羅素本人成為連

希特勒都不願扮演的人物角色，這簡直就是反基督的提比略的翻版。

然而，不要因此而責怪大英帝國主要的科學家之一洛德·拉瑟福德（Lord Rutherford），但是，核武器的政治歷史卻從他開始。二十世紀初，在加拿大化學家、拉瑟福德的同事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公開進行的講座中首次提到新發現的物理原理，使計劃發展核裂變力及核裂變武器成為可能。到了二十年代，人們才開始有了鈾元素核裂變的概念。但是索迪所做的工作使包括 H.G. 威爾斯在內的許多有關集團認識到了這一物理原理的重要意義。

盡管威爾斯狂妄之極，但是在利用核裂變力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方面他卻得到不少指點。通過索迪，威爾斯對核裂變的連鎖反應可引起爆炸有了相當的認識。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威爾斯就知道核裂變武器是可能想到的最為可怕的戰爭武器。從此以后，在他的科幻小說中就有了許多非小說性的激情。在他看來，核裂變武器是如此恐怖，以至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會因為核武器的存在而臣服于世界政府，不會冒然發動戰爭。

威爾斯早期的想法和建議是基于鐳元素的高密度放射性而提出的。鈾的裂變率要低得多，因而暫時還沒有考慮用它來發展核武器。

二十年代的一系列索爾維國際科學會議均旨在使科學家們就這個問題取得普遍一致的看法。在一些會議上，羅素所起的作用是相當關鍵的。這些會議的目的就是給一些相關科學家洗腦，讓他們相信受控熱核裂變是可能的。當時的一些發現没有公諸于世，往往是由于更高的政治和經費的考慮。（54）在一些被誘騙的科學家中，有一位就是后來為受控熱核聚變過程作出突出貢獻的恩里科·費米。然而，只是在羅素通過其間諜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了解到奧托·哈恩（Otto Hahn）以及其他人于1938年在柏林成功地證明了鈾裂變反應的可行性之后，發展核武器的秘密才泄露出來。于是，羅素立即采取行動，利用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和尤金·威格納（Eugene Wigner）這些匈牙利流亡寶貝，誘使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那封寫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啟動曼哈頓工程的信上簽了名。

在英國人通過這種方式或其他方式傳遞給羅斯福總統的信息中還包括另一個騙局，即：與羅素有意誤導的報告相反，希特勒的德國并不打算發展核武器。近三十年來，我和我的同事以及當時德國主要的火箭專家和核科學家之間進行的討論已經證實，當時的德國科學家應該從事過這項事業。由耶穌教會培養起來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也許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曾經想過要發展核武器。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不管有没有希特勒，一個如此盲從、荒誕而反科學的德國，是找不到發展核武器的有效途徑的。

的確，象戈培爾幽靈兵團一樣，在歐洲二戰的最后幾個月里，德國所有的“奇异”武器都説明她原本就具有、而實際上只是被“封存起來的科學工業潛力”，如納粹政府先前因希特勒對科學、科學家以及人類理性“綠丸（greenie：運動員為增加氣力而在賽前服用的興奮劑—譯者注）”式的反感為由而封存起來的 Peenemuende（德語詞匯）。

羅素并没有因為他預計德國將發展這種武器而催逼發展核武器。不過，他卻掌握了許多情況。正如他在 1949 年 9 月的《原子科學家公報》中所證實的，他打算戰后才使用核武器，用核武器來恐嚇世界，使世界臣服于世界政府帝國。

就1945年廣島和長崎該不該用原子彈轟炸的問題，在一些有能力的軍事、政治權威看來是不值一談的。當時美國在軍事上絕對没有使用地面部隊進攻日本的需要。麥克阿瑟將軍針對日本的進口貨物實行非常有效的海上和空中封鎖，他實際上已經贏得了戰爭，只等日本軍方認識到除了通過梵蒂岡（即后來的教皇保羅六世）的渠道接受裕仁天皇與盟軍達成的協議，體面地接受投降條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選擇。這些條件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的進攻下被迫接受的。核彈的轟炸并不是出于軍事上的原因，而是英國要求杜魯門總統這樣做。美國只扔了兩顆原子彈，這也是因為當時的軍火庫里只有兩顆；如果還有，肯定還要扔。

對日本的核彈轟炸剛一結束，羅素就準備公開他于 1946 年提出的對蘇聯打一場“預防性”核戰的建議。然而，我們不難理解，正是與羅素

的關系網有密切聯系的一些組織把美國核武器技術的秘密泄露給了蘇聯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國與蘇聯核戰在即，就可能會帶來羅素世界政府所需要的全球戰略高潮。(55)的確，英－美－加聯盟特意制造的“冷戰”，也是為了實現羅素發展核武器、建立世界政府的計劃。

這一系列發展的下一個轉折點就是斯大林的逝世。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原本打算接受羅素的建議。但是，由于美國總統候選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入侵朝鮮的大肆宣揚以及當選總統后對狂妄的參議員喬·麥卡錫大加推崇，蘇聯人對羅素的看法開始發生轉變。此外，美國的另一進展是艾森豪威爾當局塵封已久、或許出于財政預算考慮由梅達里斯將軍制定的亨茨維爾計劃的出臺。(56)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蘇聯人以往發展全球戰略計劃的熱情。不過，隨着赫魯曉夫權力的鞏固，他的四名代表在出席1955年在倫敦召開的組建世界政府的會議上對羅素及其思想卻大加贊賞。因此，這次會議立即在大西洋兩岸引起深刻反響。

反響之一就是約翰.J.麥克洛伊在軍備控制與裁軍署中的作用開始活躍起來。在這方面，史汀生的前助手麥克喬治.邦迪與他的門徒亨利.基辛格并没有什麼兩樣。亨茨維爾計劃是作為英－美－加聯盟紐約外交關系理事會的一項計劃來加以實施的。因此，由威廉姆.Y.艾略特訓練、洛克菲勒和邦迪支持并贊助的基辛格一離開倫敦就施展拳脚，在紐約外交關系理事會的喬治.富蘭克林手下任職。作為對邦迪贊助的回應，基辛格的名字被寫進了紐約外交關系理事會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57)一書。于是，伯蘭特.羅素代表英國外交部，使怒氣冲天的亨利.基辛格奇异般地獲得了新生，并成為后來所謂的外交家。同時，1955年的世界政府倫敦大會還直接推動了一些更重要的進程，即一系列帕格沃什會議的召開。

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一九五八年在魁北克召開的第二次帕格沃什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角同樣是羅素的代理人利奧·西拉德。正是他和尤金·威格納才是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那封信的原作者。讀者也許還記得，西拉德在第二次帕格沃什會議中所起的作用，使他成為由同名小說改編的著名電影“畸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主角。同時，西拉德在那次會議闡明的關于核武器及武器控制的“末日”政策是理解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以及隨后的沃倫委員會這些現代歷史轉折點的關鍵，也是理解后來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 和一九七二年反彈道導彈條約的關鍵。

西拉德在魁北克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有兩點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他希望盡早在大型艦隊上部署核戰略彈道導彈。其次，他要求，任何國家都不得針對這種核彈道導彈發展有效防御體系。這真是一個花言巧語的“末日方案”！這就是今日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反彈道導彈條約中所有實質性的東西，由此我們知道世界政府是怎樣通過散布核恐怖來進行規劃的。與威爾斯、羅素和西拉德這樣的核恐怖主義分子相比，納粹的外交官里賓特洛甫都可以説是謹小慎微的了。

與他的老師羅素和威爾斯一樣，西拉德這條走狗也極其瘋狂。他是一個空想家，與羅素和今天的大一統世界狂戈爾副總統一樣生活在科幻小説里現實社會以外的夢幻世界里。不過，與完全受空想支配的戈爾不同，西拉德多少還懂得一點科學，但總體上那也是一種病態的科學。在西拉德逐漸惡化的精神狀態中，這一點微不足道的科學知識正隨着時間的推移受到越來越多與巫術混雜在一起的幻想的侵害。西拉德與大多數科幻作家（如《星際旅行》的作者）并無多大不同，但是《星際旅行》的制片人卻并没有扔什么末日核彈。在西拉德及其同類看來，科學和巫術在使人的夢想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發展這個方面，是混合在一起、彼此之間没有界綫的。當沉溺于幻想的人開始玩蘭德公司的戰略“沙箱”游戲時，魁北克會議上的西拉德和一些集團所共同抱有的瘋狂幻想，就可能在某一天突然使我們的世界土崩瓦解。

今天，圍繞着戈爾副總統建立起來的真實生活中的首腦委員會也一樣。由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即電影“畸愛博士”中亨利.H.謝爾頓將軍的原型，以及“瘋狂的梅得琳”(Mad Meddling)中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戈爾的毒瘤利昂·富爾

斯共同提出的方案包含了這個圈子的所有特征：精神錯亂，脾氣暴躁，像不太聰明的孩子，在中東玩着戰爭游戲，但他們使用的卻是真正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與這種空想式的瘋狂行為并存的還有在去年的九月二十三日，黑－斯科爾斯公式（黑洞公式）幾乎把當今世界的金融體制吹到太陽系之外。在這種情況下，災難的出現，或因能力的缺乏，或因激進實證主義者在玩“沙箱”游戲時對現實世界的漠視，其后果就是眼下“信息社會”、“無序理論”以及“系統分析”等病態概念的傳播和普及。

有一名小丑說過：“讓世界停下來，我想下去。”而戈爾之流卻說：“讓世界停下來，不然我就把它給炸了。”這就是以約翰·丁·麥克洛伊、麥喬治·邦迪和亨利·基辛格為中心的華爾街世界政府集團，一個喋喋不休、氣喘噓噓空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集團的真實寫照。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及之后，麥克洛伊、邦迪和羅素的合作直接導致了幾種構成世界歷史發展主綫的結果，其中包括：1964－1972年美國官方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戰爭，促使新時代思想傳播的政策，以及使世界金融體制瀕臨崩潰邊緣的與新時代和軍備控制與裁軍署有關的政策。

如果林肯總統還活着，他應該知道，一些既有權勢、又很知情的人都被柏林牆危機和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給愚弄了。不幸的是，許多人至今還在受愚弄，被職業魔術師簡單的把戲所愚弄。也許是他們看得太專注了，以至于受人蒙騙，對場上所發生的一切深信不疑，對魔術師的把戲視而不見，因而根本無法看穿那些把戲。

許多人至今還未弄清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因為他們都試圖去發現誰會贏得呈現在他們眼前的被操縱的比賽，這讓他們感到迷惑，以致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魔術師并没有設法去贏得比賽，而是象賭場的老板那樣，正忙于修改比賽項目的規則。

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逝世以來，英帝國及其幫凶試圖通過美國來反對蘇聯，通過美蘇兩國之間進行核競賽來恢復英國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的美國的力量抗衡。而英－美－加聯盟的魔術師們所玩的真正游戲則是改變游戲規則，以確保削弱并瓦解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基本組織機構，最終使美蘇兩國被世界政府消滅。世界政府在英國王室的英－美－加聯盟的支配下，將以世界霸權的面目出現。

從其成立之日至今，英－美－加聯盟集團象早期的H.G.威爾斯和伯特蘭·羅素一樣，正在企圖改變形勢，達到讓主權－民族國家從這個星球上永遠消失的目的。這是英－美－加聯盟集團的麥克洛伊及其在軍備控制與裁軍署中的同行在他有生之年所作的清醒承諾。邦迪和基辛格之流今天也仍舊有這樣的的承諾。

主張由世界政府干預世界事務的麥克洛伊、邦迪和羅素等人，鼓吹進行與一九六二年導彈危機有關的談判。就英－美－加聯盟的利益而言，這標志着主權－民族國家體制的結束。如果約翰·肯尼迪總統活下來，他在準備的達拉斯演講稿，清楚地表明他反對這一點。

同樣，針對國家主權與世界政府武器控制等問題，亨利·基辛格在丟掉肯尼迪政府顧問一職后，把總統對美國主權的極力維護描述為一種冒險。基辛格還在晚些時候用差不多同樣的話語對遭暗殺前的奧爾多·莫羅進行威脅。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期間他還基于下面三個原因對我個人進行刁難、排擠。一是我揭露了他與以色列的阿里爾·沙農在巴勒斯坦土地騙局中的大量腐敗行為；二是一九八二年墨西哥的債務索賠危機；三是后來被羅納得·里根總統稱為戰略防御倡議的制定。一九八二年三月，我提出了有關彈道導彈防御的建議。一年之后，我的這項建議稱為戰略防御倡議最初的藍本。正是我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所提建議中對基辛格世界政府的抨擊，才導致了1983－1989年的12333號行政命令的政府秘密行動。結果一些比我影響更大的人遭到暗殺，而我本人在一九八六年初和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曾先后受到過多次暗殺威脅，并且因為在戰略彈道導彈防御問題中與基辛格的敵對關系而受到起訴。

然而，為了摧毀主權－民族國家，僅有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反彈道導彈條約這樣的核末日方案是不够的。對麥克洛伊和基辛格這些人來說，打倒主權－民族國家和消除社會對科學

的的投入，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只要人們懂得國家和人民的福利將取決于科技進步，取決于必須把資金、人力、物力用來發展科學技術的道理，那他們就一定會勇敢地捍衛其國家主權，保衛其國家機構，就象現今的馬來西亞虎保護其幼崽，使其免遭獵殺一樣。

于是，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談判中簽定的武器控制協定就與新時代思想體系相結合，使越來越多的人陷入新時代瘋狂思想的泥潭之中。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在大學生“精英”受新時代思想的影響而成為“文化範例變遷”代表的同時，華爾街也在改變。英－美－加聯盟和它操縱的基金會也成為新時代運動主要的幕后組織者。

一方面，英－美－加聯盟的銀行家和律師集團采用“三邊委員會”中卡特當局和共和黨布什派采取的措施，來消除代表農場主和工業企業利益的政治勢力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否則，那些實物生產型企業一有機會就與華爾街對着干，以保護着重生產技術進步的美國政治經濟體制。同時，英－美－加聯盟及其下屬基金會也敗壞了青年大學生們的思想道德品質，而他們也正步入中年并開始在各行各業擔負起制定重大政策的責任。新時代思想的發展就是在這些大學校園開始的。

4.3 經濟和道德

六十年代中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特別是被稱為“新郊區居民”的那一代人，是很難理解他們的父輩在羅斯福領導之下經歷了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形成的道德觀念。作為他們的父輩，我們投身于建立美好世界的斗爭，贏得了戰爭的結束。可總的來說，我們的兒子、孫子并未意識到我們以道德力量進行參與的歷史意義。導致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是：到了五十年代早期，我們這一代中的多數人就已經喪失了原有的道德觀念。

戰后的道德淪喪始于我們這一代人。一九四五年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帶來的冲擊，1946－1948年的嚴重經濟衰退，“冷戰”開始后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敵對的關系以及許多人對麥卡錫主義的追隨和五十年代興起的“白領”熱，使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歐洲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潮再度蔓延。于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新郊區居民”和“馴順公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白領”階層、特別是他們嬌生慣養的下一代中，自我憐憫、及時行樂、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潮就開始流行起來。

對一部分六十年代的青年人來說，連續不斷的冲擊動搖着他們的道德觀念。如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總統遭暗殺，美國參加印度支那戰爭，年輕的“新郊區居民”應征入伍，以及馬爾科姆．X、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被暗殺等等，每一事件本身都的的確確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其中尤以在大學生中通過反戰運動的開展而日漸壯大起來的新左派產生的影響最為明顯。

這些看法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被貶低為空泛的概括。導致這些個性變化的“化學原因”是非常明確和具體的。現在擬將簡述如下。

正如我在前面的論述中強調的那樣，即便在今天，個人道德觀念的形成和發展仍然可以用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形容來進行描述。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道德的最高標準要么是對同時永恒的感知和體驗，要么可能是在特殊情況下使個人的精神得到升華；而道德的最低標準則是玩世不恭、享樂主義和存在主義；而居中的則是習慣上憑良知作好事，并盡其可能地避免一些給自己帶來恥辱的行為。

我們也可用另一種方式來描述這三種道德標準，即通過對社會生活的參與或站在歷史的高度來進行描述。這樣看來，道德的最高標準應該是對同時永恒的認同；其次是相對較低的對個人工作和義務的認同；最后才是亨利·基辛格這種人的道德觀，即不知羞恥地公然把自己稱為霍布斯主義者，而充其量只不過是洛克、亞當·斯密或邊沁的走狗而已。在這三種道德標準中，以尼采、薩特以及西奧多·阿多諾的追隨者們為代表的極端存在主義和漢納·阿倫特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最為墮落。

以這種參與方式來劃分人群中的道德標準有一個具體的好處，即這樣的方式直接觀察社會關系特征的變化方式，因為這些變化本身是可以促進個人的道德水平上升或淪喪。我所指出的戰后到六十年代中期的那些事變，以及在少年和青年人中盛行的享樂思潮和頹廢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學校園中那些嬌生慣養和及時行樂的年青人的道德水平。

在新郊區化頹廢思想的受害者中，赫伯特·馬庫斯法蘭克福學派中遵循存在主義各式各樣傳統的老費金（教唆犯的代名詞）們找到了他們的領軍人物，即 1964 年至 1972 年“文化範例變遷”中的新左派的頭頭們。大學生們瘋狂而頹廢的精神狀態可以通過下面這些流行的話語得到證實。如“扭住青春不放”、“我很孤獨”、“拉兄弟一把”、“長夜難熬”、“你有治頭痛的藥嗎？”等等。可見一代青年以搖滾樂、毒品和性為標志的反主流文化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

其實，社會并没有排斥他們，而是他們決意拋弃社會。正是這樣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的“孤獨”所在。當監獄的大門關上時，已經定罪的殺人犯說：“你們不能這樣對我，因為我從小就受虐待！”事實上，正是他們因不滿和仇視社會而擺脱了作為社會一分子應有的道德責任。因此，盡管他們抗議說：“是你們讓我這樣做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給社會帶來了連鎖反應，其受害者遲早將會是他們自己。

新左派的狂熱和迷信，大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孩子氣，就象存在主義者的反常行為一樣。“既然你非讓我吃不可，我就是不吃！”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前面的論述，即認知過程和學習過程之間的差異是了解新左派道德欠缺和智力淺薄的關鍵。這對于了解存在主義的各式烏托邦癖性，以及它們耽于幻想、排斥理性的狂熱的綫性思維特征都是十分有益的。(58)

如前所述，人類的意義獨特地存在于自主惹認知過程中。通過這一認知過程，個人的潛在認知能力對實在的認知悖論產生反應，從而使人們發現并證實普遍的自然原則。正如我對這些關系的闡述那樣，人類的自主認知個性即是與他人一道共同擁有已發現的自然原則的認知經驗。青年人良好的資質條件使他們不僅能很快地適應周圍的環境，而且還能在發現這些原則的過程中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通過個人內在認知經驗的積累，即使是幾千年以前處于人類認知拓荒階段的人們，也能够把人類物種看作一個整體而逐步培養、形成自己對社會的參與意識。(59)

因此，古典人文主義的教育就是努力培養個人的道德觀念，而現今的教育模式卻是扼殺這種道德觀念。“信息理論”的觀念，或用“課本”、“詞典”的學習來代替認知過程，終將使那些接受“信息社會”觀念而非人際道德觀念的個人缺乏與其智力發展水平相當的道德水平。

如果我們以早在五十年代就非常突出的社會關系模式來看今天“信息社會”病態的社會關系的話，那粗心的觀察者在不經意間所忽略的一些社會現象，就有可能揭示出人類道德觀念覺醒和發展的深遠意義。

為了盡可能清楚而又精簡地表述我的觀點，下面我將采用實例研究的方法來闡述與社會問題的普遍特征有關的主要因素。

相關實例研究

讓我們先從亨利·福特在設計、生產“T型汽車”時所表現的天賦來進行實例研究。

亨利的方針是：早些年使用“T型汽車”的農民，應該具有對汽車進行例行保養和維修的資質，也應該具有管理汽車保養和維修的資質，還應該具有采用有效新方法來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今天，我們應該對自己使用的工具和產品均有所了解，產品的設計應考慮到是否易懂、好用。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使用者必須按同一方法使用。同樣，生產這些產品的廠家也應多了解有關的操作原理等等。因此，在任何一個組織嚴密的經濟體制中，產品的供求雙方都必須就產品的設計和生產、維護和修理在認知水平上達成一致，因而產品的設計、生產以及產品的使用，都應該通過對個人認知能力的培養而統一起來，也就是同時對設計者、生產者和使用者加以培養。

福特這一例子就暫談及此，下面我將通過對英國作者 C.P. 斯諾描述的所謂“兩種文化”的比較來看看這一產品、生產、使用、教育的問題。

比較一下斯諾對文化悖論的描述和艾森豪威爾時期出現的反社會的“馴順公民”和“白領”階層的病症，就會了解六十年代中、后期新右傾主義的大學生們的病態是如何產生的，了解產生這種病態的重要前提。由此我們可以把十九世紀早期發生在柏林的一件事作為我們參照的基點。

隨着維也納會議上反動分子卡斯爾雷和梅特涅的勝利，歐洲的政治和知識環境變得十分糟糕。會后發生的兩個關鍵事件給當時整個歐洲的科學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但所幸未能完全摧毀科學。

第一個事件是威靈頓公爵成功地阻止了普魯士軍隊于一八一五年把法國的“勝利締造者”(Author of Victory)拉扎爾·卡諾推上法國總統的寶座，而代之以威靈頓和富歇腐敗無能的傀儡路易十八。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法國的綜合工科學校被接管，并受到很大破壞，其創始人和主要科學家、數學天才加斯帕德·蒙日退休后于一八一八年被處死；科學和軍事天才拉扎爾·卡諾先后被流放到了波蘭和普魯士管轄的馬德格堡。

第二個事件是一八一九年權端反動的所謂卡爾斯巴德“焚書”法令的頒布。由于讓卡諾當法國總統而作的努力最終遭到失敗，這就大大削弱了圍結在弗雷赫爾·馮·斯坦和洪堡兄弟周圍、曾制定戰略打敗波拿巴·拿破倫的普魯士改革家們的地位和權力。這些歷史進程打破了由普魯士立法集團支持的多數反動集團、包括實為梅特涅間諜的惡棍G.W. 黑格爾和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老朋友 K.F. 薩維尼之間的平衡。

正是在1815－1919年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了下面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我將闡述這些事件的歷史背景，然后討論這些事件本身。

隨着加斯帕德·蒙日在世界主要科學機構中的領導地位被人取代，歐洲科學界的命運就落在了綜合工科學校成員之一、著名的普魯士改革家亞歷山大·馮·洪堡的手中。亞歷山大圍結了法國科學界的幸存者和德國科學界的精英，如卡爾·高斯，使他們在全球範圍內與約瑟夫·亨利以及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曾孫、西點軍校的亞歷山大·達拉斯·貝奇等美國科學家聯手合作。亞歷山大·馮·洪堡在世界科學界的協調工作始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并通過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茲和克列爾的科學雜志展開。

在德國，就科學和教育政策展開的斗爭是圍繞洪堡兄弟和代表梅特涅和英國利益的反對勢力進行的。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普魯士皇家法院成了英國腐敗分子的巢穴，皇家法院指定的“國家哲學家”黑格爾則成為梅特涅的代表。這一點已為最近發現的黑格爾個人通信所證實。作為卡爾斯巴德法令的推行者，黑格爾與浪漫法的實證主義教授薩維尼兩人實際上是知識界的“蓋世太保”，而黑格爾又是十八世紀中期柏林大學的騙子莫佩爾的翻版。這一對無賴想方設法不讓現代科學進入柏林大學。

直到普魯士王室的構成發生改變，情況才有所好轉。亞歷山大·馮·洪堡盡一切可能、以多種方式發揮他的政治影響，盡量使那些遭黑格爾和薩維尼橫加阻攔的歐洲主要的科學家進入柏林大學。亞力山大使用了各種借口：支持普魯士的軍隊，而軍隊則在軍事學校中安置亞力山大任命的人，這樣他們就可以具有柏林大學教授的身分。柏林大學的語文系盡管有黑格爾和薩維尼的“蓋世太保”的干擾，但仍舊受到亞力山大的兄弟威廉的影響。這樣，語文系就在威廉的影響下開設了現代數學課程。

曾出現這樣的情況：該校語文學系主任通知他的一個教授第二年秋季開設微積分課程。吃驚不小的語文學教授回答說他并未受過數學專業培訓。而主任卻說，如果你能教古希臘文學，也就可以教微積分。到了第二年秋季，教授開設了微積分課程，且相當成功，教授本人也成為十九世紀最具造詣和創造力的著名數學家之一。

我們不妨把上面這件事與C.P. 斯諾所講的一個事例放在一起做一番比較。斯諾注意到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在“士兵權利法案”下美國國民教育的悲劇性和植根于十七世紀英國經驗主義者、笛卡爾主義者以及威廉姆·詹姆士和翰·杜威這些美國實用主義者病態的教育哲學。

要了解“士兵權利法案”導致的失敗教育，必須了解六十年代的“新生代”和他們的父輩受教育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期，小

學六年級至八年級的教育被普遍看作是多數美國青少年的標準教育，甚至在工業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是如此。伴隨着三十年代經濟蕭條所帶來的冲擊，一般學生的知識生活水平均有所降低。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促使我們采取緊急措施，以便軍隊和后方的教育以及其他特殊訓練能迎頭趕上。這一企圖提高教育總體水平的政策再加上“士兵權利法案”中規定向退伍軍人提供高等教育資助的條款，創造了擴大高等教育體系的巨大需求。

然而，向退伍軍人提供高等教育資助的“士兵權利法案”在執行中卻帶來兩個相應的副作用。一是缺乏受過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可以在教學第一綫獨擋一面的教師；二是那些退伍老兵一般只關心能否拿到文憑，能否找到就業機會，因而不在乎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這樣做的總體結果就是：“訓練加測驗”式的學習方式大大盛行，取代了注重認知水平發展和提高的教學模式。

戰后高等教育的這種尷尬局面，隨着“卡爾斯巴德”法令的出臺以及代表該項法令的麥卡錫主義的興起而變得更為錯綜復雜。我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講，思考就意味着尋找答案，因而也就意味着懷疑。

其實人類認知功能和由此產生的所有創造性思維的先期形式就是玩耍。我曾強調過席勒的觀點，即玩的特性就是快樂，就象我們精心照料寵物時的心情一樣。然而，在人類當中，這種玩耍的特性是與懷疑和求知的特性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是任何動物都不具備的。當這種能力與人的認知功能結合時，就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造力和發現普遍自然原則的能力。

在“卡爾斯巴德”法令和麥卡錫主義壓制思想的環境下，玩的特性是危險的。一段時間里，誰能做到不向當權者指出异議，誰就無异于擁有一把政治保護傘；而誰膽敢表示懷疑或提出疑問，誰就可能丢掉自己的工作，或許更多。

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這種非人所願的教育環境將會產生的結果被一位耶魯大學著名的精神病學教授勞倫斯 S. 庫比（Lawrence Kubie）博士注意到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庫比本人在當時受到梅西基金會的資助。就像他曾對我的一位同事說過的那樣，庫比認為，學生在他們的職業生涯正式開始以前所具有的良好資質正隨着教育系統科學創造性的喪失而不復存在。庫比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寫作就是針對這一致命后果有感而發的。

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大學生們既害怕沾染上政治污點，又害怕在經濟上有所損失，因而特別忌諱與企業工會組織的牽連。如果你是工會成員，就會引起一些官方安全人員的懷疑，懷疑你與左派有聯系或在政治上同情左派。對于參加過二戰的許多老兵來說，擁有一個文職工作就意味着擁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和家庭的安全。當時普遍存在的偏見直接導致了病態的“白領”症狀。許多往日的左派在智力或認知水平上競相貶低自我的浪潮中被迫轉入“地下”。同樣，推卸社會道德責任使艾森豪威爾時期一度盛行“馴順公民”現象極為普遍。

這樣的社會狀況大大影響了教育的提供，也大大影響了教育的質量。這一問題成為 C.P. 斯諾演講中的“兩種文化”的基礎，并導致了工科專業學生與“文科專業”學生之間病態的、幾乎是種族隔離般的敵對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副作用。

通過柏林大學語文學系的實例，我們有效地把教育和職業化的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到底遵循什么原則才能象語文學系主任那樣成功地使一個教古希臘文學的教授同樣具有教授微積分的資質呢？如果你知道席勒－洪堡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模式，你就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要把“知”和“學”這兩個動詞區分開來。盡管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并非完美無缺，但他還不至于愚蠢到說“知之不多是危險的”地步。他實際是說“學之不多是危險的”。一個人用不多的知識來修理電器，另一個人用不求學習的態度來修理同樣的電器，這兩者之間有着天壤之別。

對社會的參與感基于作為認知過程的對歷史的反思。這是決定一個人及其同類道德品質的前提。初步講，個人對社會的認同感驅使他或她一心向善、承擔責任，不過這只是感覺層面上的道德品質。更高層次的道德品質體現在與充分理解

世界普遍原則相一致的觀念上。一個人對社會的認同感是不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在這個層面上，只有激情才能真正使他成為社會的領導者，成為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Philosopher King)。一個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哲學王”領導的社會，顯然比一個由只受過一般教育的老好人領導的社會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因此，我們可以把以上兩種病態社會現象放在同一圖表中。一是斯諾描述的“兩種文化”，其二則是前面進行過實例分析的頹廢的“馴順公民”，他們那些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后代們，以及后來由于1964-1972年間的種種社會現象大學校園活動而卷入“新左派”的人。如果對比一下這兩種病態社會現象和柏林大學語文學系的實例，那到底是實例中的什么東西促使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對病態社會性質的研究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追溯歷史，追溯柏林大學語文學系實例中的教育方針，追溯威廉·馮·洪堡領導下的教育方針，追溯弗里德克·席勒對康德學說中不道德觀念所進行的抨擊，以及使洪堡和1807－1813年普魯士改革運動的其他領導者深受教益的一些事實。請看看康德的病理主義，席勒正是在這一點上對之加以抨擊。

康德原本是大衛·休謨經驗主義瘋狂的追隨者，只是后來才試圖與休謨的晚期寫作保持一定的距離。出于對休謨早期源自亞里斯多得觀點的經驗主義的維護，康德撰寫了一系評論，時間跨度達二十年，從而奠定了以謝林、費希特、黑格爾等人為代表的“德國批判哲學”的基礎，保證了十九世紀為使所謂的浪漫主義哲學理性化所作的努力不致于付諸東流。經驗主義和康德學說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認定柏拉圖和萊布尼茲等人定義中的真理是不可知的。康德為證明他的假說所作的努力體現在他晚期的寫作中。席勒告誡說相當有害的也正是這點。

康德的辯論為以后德國病態的浪漫主義哲學對法國藝術所下的定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在經驗主義和德國批判哲學所有代表的支持下，他的辯論成為后來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和其他地方擋在科學和藝術之間的一堵非理性的高牆。這也是C.P.斯諾所指“兩種文化”的基礎，為理解我所描述的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美國大學生的社會生活結構勾勒出了一個輪廓。

正如席勒告誡的那樣，康德著作中的惡毒之處就是他給社會及政治帶來極大破壞的非理性主義的主張。

對席勒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事實上，十八世紀后期德國所有主要思想家都是美國獨立戰爭熱情的支持者。最初，包括普魯士軍方、特別是兵器工程部門的重要領導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歡迎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希望這次革命繼承美國革命的傳統，打擊歐洲的寡頭政治，給歐洲帶來他們期盼已久的自由。然而雅各賓派卻讓他們感到了恐怖。“究竟出了什么錯？”

席勒和海因里奇·海涅先后認識到了問題的結症，(60)即康德學說中的非理性以及他為非理性所作的瘋狂的辯解。

如果追溯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法西斯主義的根源，那康德的學說可以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造就了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賈斯珀(Karl Jaspers)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者，當然還有各式各樣存在主義的“惡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西奧多·阿多羅(Theodor Adorno)和漢納·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及法國的讓·保羅·薩特。這種法西斯主義及類似傾向在美國大學的體現就是發生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的大學文理分設，在英國也就是斯諾提到的“兩種文化”。

看看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美國大學校園里文理分設的有關現象，很難說是“文科”學生更缺乏理性還是工科學生更缺乏理性。工科一方所缺乏的是在個人認知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創造力和發現世界普遍原則的能力。因此，公平地說，他們更傾向于笛卡爾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時間、空間、運動和距離這樣一些科學術語和概念以外，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存在的。而在“文科”一方，學生和教授們都極力做到康德所希望的那樣既傲慢又缺乏理性。其中最惡劣的代表就是康德和薩維尼追隨者的“美學理論”，認為除了訓練藝術家及其觀眾以外，任何藝術分支都沒有原則可言。由此，一種懶散而神秘的非理性主

義——通常是矯揉造作的極端拜物教——彌漫了幾乎整個“文科”系部的學術界。

斯諾以標準的學術研究方式講到了“兩種文化”現象；而我則用實例描述了這種文化現象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其目的都為了更好地說明這種文化現象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柏林大學語文學系的實例怎樣才能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一點與席勒對康德的抨擊有着直接的聯系。因為普魯士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馮·洪堡—都是席勒的學生。法國和普魯士王朝后期的拉扎爾·卡諾以及卡諾從前的老師和合作者、綜合工科學校的創始人加斯帕德·蒙日最關心的也就是設法與席勒和洪堡兄弟的看法保持一致。他們的做法就是把卡諾的老師的教育方法肯定下來并加以更新，而卡諾老師的方法則直接繼承吁“平民兄弟會”。我們都知道，“平民兄弟會”對十五世紀文藝復興的出現起了關鍵作用。

來布尼茲和巴赫的遺產：

正如我在前面不時提到的那樣，德國古典文化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萊辛和摩西·門德爾松兩位朋友緊密合作的結果，是這一合作產生的巨大催化影響的結果。兩位合作者傾力與柏林科學院暗藏的反來布尼茲的勢力作斗爭。這股勢力的中心人物是莫佩爾蒂這一騙子及其反來布尼茲的同謀倫納德·歐拉。莫佩爾蒂和歐拉是威尼斯在巴黎的代理人、阿玻特·安東尼奧·康提（Abbot Antonio Conti）的追隨者，康提是牛頓神化的編造者，也是整個歐洲反來布尼茲運動的協調人。莫佩爾蒂和歐拉是萊辛和門德爾松的主要目標。萊辛得到柏林科學院的任命，后來門德爾松也得到提名，但遭到否決。

盡管來布尼茲的工作受到了保護并由法國的演說家們所繼續，但萊辛和門德爾松才是真正維護來布尼茲和德國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主要人物。由于有了萊辛和門德爾松，德國十八世紀的古典運動才得以啟動，而且直到今天，他們都是德國應該感謝的德國猶太人。正是古典希臘文化傳統，正是荷馬史詩、雅典梭侖、雅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斯科帕斯、普拉塞特拉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荷柏拉圖的古希臘文化，造就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著名的德國古典文化。在這中間，尤以哥德的貢獻最為突出。當然還有海頓、莫扎特、席勒、貝多芬以及洪堡兄弟等。

在創立古典原則的過程中，德國古典語文學是主要受益學科之一。與曖昧而充滿矛盾的英國多種學科相反，德國古典語文學對威廉·馮·洪堡發展創造力的原則和歷史學家、詩人和悲劇作者席勒制定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方針均有着深遠的影響。

德國古典語文學發展的意義可以通過海里克·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邁錫尼、特別是特洛伊所取得的成就來加以肯定。謝里曼年青時對荷馬的史詩十分着迷，并在以后幾十年里努力酬集資金，以便實施他的一個計劃。通過對希臘古典文獻的研究，他確定了特洛伊城的位置，結果發掘取得了相當成功。謝里曼的成功是當時古典科學方法的一次偉大勝利。這一勝利也反映了柏林大學語文學系實例的重要性，促使我們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洪堡兄弟終其一生研究德國古典語文學，其方法無疑是最直接、最科學而具創造性的。對一段歷史時期處上升階段的語言文化的了解，是掌握柏拉圖、開普勒、萊布尼茲、高斯和黎曼的數理邏輯思維方式的關鍵。

語言發展在其最具成果階段中的潛力，正如帕尼尼對梵語的描述和珀西·雪萊在《詩之辯護》中的描述一樣，是高斯和黎曼等人數理邏輯的根源。一種語言中最豐富、最具意義的表現形式是那些偉大的詩歌。現代作者寫不出這樣的詩歌。同樣，要現在缺乏語言文學知識、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理解那些古代流傳下來的詩歌也是相當困難的。古典詩歌的創作乃至發音都有極其嚴格的規定，這是所有古典詩歌的精華所在，是向讀者或聽眾傳遞比喻等修辭手法的前提。席勒閱讀過的荷馬史詩，一直可追溯到幾千年以前，這是了解古典文學藝術原則的一個最好的範例。

謝里曼的成就是對柏林大學語文學系實例的回應。在柏林大學，反對黑格爾和薩維尼的人們

更加注重維護現代科學，反對經驗主義和德國批判哲學的非理性主義。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古典藝術創作是科學發現的源泉，是促使學生道德品質發展的基礎。

因此，教育是一個挑戰，正象席勒和洪堡的改革所表明的那樣。要通過古典人文主義和其他的教育模式，讓學生不僅學會學習，而且學會認知；不僅了解“信息”，而且形成觀念。從而培養他們的道德品質。康德學說反映的是英國的經驗主義和笛卡爾主義。他企圖阻止人們進行古典人文主義的教育。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戰后的一代大學生培養起來的正是與經驗主義、笛卡爾主義以及康德教條相符的學習習慣。

如果學生獲取了有關科學和古典藝術創作普遍原理的知識，并且是以我多次描述過的方式來獲取的，那他們的道德品質的發展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如果他們試圖通過解釋“工作原理”之類的笛卡爾式的詭辯來了解科學和藝術創作的普遍原理，那結果就不僅僅是缺乏道德品質的問題，而且很可能比這更糟。

在這樣的影響之下，不管學生以什么方式來接受影響，只要他們是這樣培養起來的，那么他們在不同的思維方式面前會顯得固執、僵化。如果我們的學生都受到這樣的矯慣，則極易受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國校園里青少年所經受過的那種冲擊，從而誘發社會動蕩。這些被誤導的人缺乏健康的個性來應付個人理想公理的幻滅，而能否形成這樣的健康個性則取決于能否把個人的災難和不幸看作是一種具有新的寓意的挑戰。然而，對于康德學說的受害者來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無能為力的，且多半都會遭到排斥。六十年代中、后期校園里的“新生代”受害的結果是“變得瘋狂”。他們把“新郊區居民”夢幻世界里瘋狂的生活方式轉變成了現實生活中的肮臟品味。

運用實例中的經驗和教訓

在歷史學家看來，六十年代中期的新左派實際上就是十四世紀歐洲“新黑暗時代”自行鞭笞的暴虐的一群，是布雷赫特“三便士歌劇”中的人物角色。在舞臺上，這些人具有可以想象的所有人類性別的個性特征。

此外，歷史上還有一個相關的先例，即那些由羅伯斯皮爾、聖－賈斯特、丹勁以及馬拉等雅各賓派恐怖分子一手制造、并由被稱為“公正的菲利普”的奧爾良公爵花錢武裝并雇傭的巴黎的流氓和暴徒。這樣看來，新左派的政治特征和道德特征極不穩定。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受雇傭的烏合之衆，就象羅馬競技場觀衆席上的街頭流氓一樣。他們之所以響應古羅馬無產階級的號召，就是為了摧毀羅馬的共和政體。他們象一群撒旦的狂怒的孩子，是戴着弗里吉亞帽子的酒鬼。他們決意要處死 Lavoisier（法國人名），叫囂什麼“革命不需要科學家”。如有機會，他們甚至可能喊出“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口號。

要了解時至今日仍在繼續的 1964-1972 年“文化範例變遷”對社會及思想的影響和冲擊，值得特別注意的還有當時在政治上十分活躍的新左派的多數人中流行的反勞工情緒。在聯邦調查局的支持下，由麥克洛伊．邦迪地福特基金會及其金錢一手主導了安排的一九六八年秋季紐約教師大罷工。這一大罷工很能説明這種流行于新左派大學校園階層中的反勞工情緒。這些郊區居民對“蘭領”工作的厭惡是發動一九七二年新左派“生態學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也是以此為“事業”團結已經從骨子里反勞工的新左派的方式。這也是今天民主黨領導層瘋狂反勞工政策的根源，是戈爾副總統和已故參議員麥卡錫的表兄羅伊.M. 科恩的反勞工政策的根源。當然，我在這里也涉及到“第三次浪潮”下的民意特務迪克·莫里斯。

除了我在以下的概述中指出的方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辦法可以彌補這種道德和情感的欠缺。我的方法一是盡可能地恢復人們對工作的參與感，使他們在各自的工作領域接受再教育。二是激發大學生們固有的認知能力。新左派思想流毒的受害者不僅要有一種對現實社會的參與感，而且要有對現實社會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是他們以前從未有過的，也是他們從大學校園走向社會和家庭所必需的。

4.4 核武器和新時代

至此，我們應該吸取教訓，絕對不選軍隊總司令這樣的人當總統，除非我們對他和他的顧問們的主義有相當了解。眼下，英－美－加聯盟操縱下的白宮首腦委員會中大多數人都深受以色列影響，他們的瘋狂正使世界多數地方陷入擴大的戰爭狀態。

在非洲，由英國、以色列和美國“反伊朗型”軍火商帶來的戰爭風暴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國家和地區，導致最近的黑人死亡總人數超過了六百萬，比二戰時死于納粹的猶太人還多。古巴也再一次被卷入由英國和以色列一手挑起的、逐步升級的非洲地區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原華沙條約國的武器扮演了主要角色。

而今，這種普遍的、非正規或其他類型的戰爭已波及到南美洲。托尼·布萊爾、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以及由戈爾把持的首腦委員會之間形成的聯盟似乎已不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正在把中東地區推向全面戰爭。中亞地區也已經成為把戰爭和恐怖主義的陰影籠罩整個阿富汗的英國人的一大目標。至今巴爾干地區仍然籠罩在當年由撒切爾、密特朗和以色列人在撒切爾政府“第四帝國”摧毀德國的旗幟下發動戰爭的陰雲之中，同時，“第四帝國”運動也使俄羅斯陷入后來的巴爾干泥潭。

最近，首腦委員會披露了被歐洲和其他地區主要戰略專家認為的一場騙局，即認為生化武器威脅來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實際上，真正的危險來源于廚房里的蟑螂：“某些西方國家和以色列的秘密機構”正利用達賴喇嘛的追隨者這些日本奧姆真理教的繼承人來挑起事端，以掩蓋他們對中國及其政治目標的打擊。（61）

由于全球軍事形勢的急劇惡化，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戰爭問題。我將首先在本章結尾的這一小節中，然后在下一章談到我的經濟外交政策觀點時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給戰爭所下的定義已經作為政策而加以改變，而改變首先由一九六二年導彈危機談判和肯尼迪總統被暗殺引起。把握了政策的巨大變化，再來看看現今右翼新左派的戈爾（62）們是怎樣拋售他們只會使戰爭和恐怖主義升級的戰略方案的。其中，最危險的莫過于戈爾推銷的“特種部隊”的概念。這一概念是在十多年前的參議員、現任國防部長科恩與目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亨利.H. 謝爾頓的共同支持下提出來的。

下面總結一下以往美國軍事戰略產生的背景。

首先，由封建戰爭形式向現代戰爭形式的轉變反映了社會組織原則的根本變化。要確切而理智地了解這種變化，就必須把關注的焦點落實到最初變化的幾個要點之間的聯系上來。

1. 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那樣，這種變化最初源自政府的革命性變革，如路易十一對法國的重建以及亨利七世在英國實施的改革。這種變革遵循發展的原則，旨在使持續改革與基督教教義相符。這種轉變使進化的原則付諸實施，其目的是通過政府的不斷改革使其認同基督教關于人是造物主自身形象這一人性定義。就此而言，自然原則給人性所下的定義就是人類特有的認知能力。對教育進行的人文主義改革與平民兄弟會的工作始終保持着一致，它代表了整個人類在法律和社會地位上質的飛躍。

2. 也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那樣，伴隨着這種變化的還有法律原則的革命性變革。就象馮·德海特教授所界定的一樣，法律變革的結果也應該是讓社會政治的所有方面與基督教有關人性的教義相符。

3. 當然，還有相互關聯的經濟觀念的變化，即擺脫封建主義從戴克里律繼承下來的零技術增長慣例。這一變革，是通過科學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政治經濟模式來實現的。

變革給戰爭帶來的影響可通過法國路易十一的改革很好地得到說明。路易十一被迫在幾條戰綫上同法國的敵人作戰，努力確保法國的重建工作順利進行。他的方法相當成功，即與封建戰爭傳統徹底決裂。這種方法有效地挫敗了法國的敵人。為此，受騙上當的敵人把他稱作“蜘蛛國

王”。路易十一的成就是基于達芬奇和尼科洛·馬基雅弗利等先驅的成果，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戰略及其相關因素。同時，對科學技術進步給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政治機構以及革命給戰爭帶來的影響的透徹了解，也是路易十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規戰爭極不穩定的發展趨勢自始至終影響着法國主教黎塞留和馬薩林以及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和沃邦。1792-1794 年之間成功指揮法國軍隊的拉扎爾·卡諾所推行的戰爭革命使這種變革的發展趨勢得以繼續。普魯士在耶拿和奧爾斯塔德兩次戰役失敗之后，由格哈特·沙恩霍斯特這樣的普魯士改革家擔任了德國抵抗拿破倫暴政的領導職務。普魯士的改革在許多方面與卡諾在法國進行的改革相一致，并有所補充。

在此之前的美國獨立戰爭，影響了法國和普魯士的軍隊改革，同時又使美國軍隊的組建形式在卡諾和沙恩霍斯特的影響下有了新的變化，并由林肯總統付諸實踐。1870-1871 年由赫爾姆斯·馮·毛奇指揮的普法戰爭，集中體現了美國革命、卡諾、沙恩霍斯特以及林肯麾下的格蘭特和謝爾曼的戰爭經驗和教訓。進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軍隊的管理模式廣泛奠定了現代戰爭的基本原則，并由美國最好的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實踐中加以推行。

如果總結一下我們從歐洲擺脱封建戰爭及戰爭管理形式中所學到的經驗，那無疑是大家公認的一個戰爭原則，即戰爭不再是職業體育競技的翻版，也不再是一種報復行為。同時，戰爭的目的不再是美國和其它一些無賴國家炮制的毫無道德可言的所謂“反感行為調節”。這種愚蠢行為的範例就是克林頓－戈爾當局參與英國心理戰和對伊拉克的“行為調節”式轟炸一類的戰爭犯罪。

我認為必須杜絕這種行為，因為它帶有封建戰爭的特征。這種肮臟的封建戰爭傳統來自于了十八世紀的“內閣戰爭”。最近幾十年，美國“繼承”這種傳統而制定的軍事策略甚至變本加厲，使軍隊完全成為基辛格之流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殺人凶手。對這類聽任其武裝力量如此利用的政府，最好的話就是它們也顯然是處于野蠻狀態。對這種野蠻行為表示認可的軍隊指揮官和其他主要負責人理應革職，而由那些職業標準類似于威廉姆·特庫姆塞·謝爾曼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官員取而代之。

現代所謂正義戰爭中的奧古斯丁原則意味着戰爭的唯一合法性在于促進文明與和平，其前提只能是其他非軍事手段均無法奏效。任何戰爭方式都必須遵從這一原則。基于這一原則，戰勝方加給戰敗方的條件必須對戰敗方有利，使戰敗方能够找到一條通向完全自治和提高其人民福利水平的途徑。正是這種利益關系，而絕非霍布斯式的威脅、報復行為，才能為鞏固勝利后的文明與持久和平奠定基礎。

我認為，以上概述絕非浮夸之詞。這是我率先提出“戰略防御倡議”時針對蘇聯制定的政策。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當我在柏林向一個蘇聯人提出進行和平合作的各項條款時，我就知道，在之后一、兩年時間里肯定會出現經濟衰退。

為了說明我的觀點，不妨看看我以往的軍事戰略方針中的三個重要方面。不過，首先還是讓我簡要地論述一下基督教教義在制定戰略方針時所起的作用。

基督教知道，我們的世界充滿异教徒。如英國君王伊麗莎白二世時期，就存在各式各樣的异教。它們不僅是徹頭徹尾的狂熱團體，更是另一些狂熱團體中不可分割的主體。同時還有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和杰里·法爾韋爾（Jerry Falwell）牧師這些鼓吹仇恨的人。甚至連一個現代的喬納都會對他們嗤之以鼻，但他們對基督教教義的惡毒攻擊卻是以熱情的傳教方式進行的。不過，無論這些傳教士如何，只要喬納明白了真正的權威所在，他將履行自己的使命。

屠殺异教徒的命令并不是上帝發出的。傳道不是為了屠殺不信教的人，而是拯救他們。要么說道，要么“做”道。基督教的傳教事業中有過或主張過殺戮嗎？如果有，那也是因為別無他法，因為光說已不能有效地終止可能會挑起的事端或制造的死亡。然而，基督教卻從未放弃過它最初的使命，即拯救异教徒，履行其所有男人和

女人都是上帝子民、因而都可以獲得拯救的教義。

基督教衛道士的良知必須與基督教的使命保持一致。當被迫進行戰爭時，也必須象太平洋戰爭中的麥克阿瑟將軍那樣去帶兵打仗。麥克阿瑟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正義感，這一點遠遠超過二戰時盟軍的其他指揮官。同時，麥克阿瑟領導戰爭的方式也是相當出色的，即在通向勝利的道路上，盡可能地少用時間，盡可能地減少勝利方和失敗方的傷亡人數。

總之，麥克阿瑟將軍即便是對失敗的一方也具有高度的正義感。戰爭是必要的，勝利也是預料中的事。盡管杜魯門總統判斷嚴重出錯，用原子彈轟炸了廣島和長崎，但戰爭的結果卻是持久的和平，這是對戰敗方恢復其主權，重建家園，持續發展極為有利的局面。

以前人們常以開玩笑的口吻說，一個民族最好的命運就是先被打敗，然后再被占領。我們的軍事和政治領導者都知道，贏得戰爭就是贏得隨之而來的和平。而在今天，同樣的一句話，有人可能會說是一個悲劇。(63)

現在，我想具體說明有關現代戰爭的戰略方針。在闡述我的觀點時，希望大家注意三次不同的場合。通過這三次場合，我認為，我無論士作為總統的顧問還是作為總統候選人本人，我有資格就戰爭與和平問題提出建樹。

* 第一個重大的時刻是六十年代后半葉，討論主題是印度支那戰爭。其間，我在一篇題為“在越戰中開辟第二戰綫”的論文中概括論述了我的戰爭策略。

* 第二個重大的時刻出現在一九七六年的總統大選和一九八三年之間。我作為總統最合適的人選所制定的戰爭策略集中體現在里根總統于一九八三三月二十三日發表的演說中有關“戰略防御倡議”的那一部分中。

* 第三個重大的時刻是我于一九八八十月十二日在柏林所作的電視講話，其中概述了可能出現的東、西德以其歷史上的首都柏林為中心而統一的前景。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我在六十年代后期對印度支那戰爭的含義所提出的政策。

在回顧六十年代后期我所制定的軍事方針時，必須了解，我對全球戰略形勢的估計是在考察了六十年代令人震驚的變化后作出的。從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我針對印度支那戰爭問題而制定的方針（開初還只是觀點）其實在二戰結束時就已初步形成。我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全球範圍根除殖民主義及其殘余勢力。為此，我研究了戰后迅速發展的親殖民主義勢力和盧蒙巴總統的慘遭暗殺。同時，我還預測“短命”的肯尼迪政府前后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走向。我在六十年代末期的軍事政策就是在對全球戰略形勢所做的這樣的估計基礎上形成的。

我承認，美國在允許殖民地獲得獨立和經濟發展自主權方面的確有過誠意。但是，正如我在六十年代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有價值的改變實際上只完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早就打算做的很少的一部分，即瓦解英國、德國、葡萄牙以及法國殖民體制的金融寡頭根基。只要國際金融債主這類暴君繼續存在，殖民體制就會發展下去，甚至比以往更加猛烈，正如 1989-1992 年間的劇烈變化所揭示的那樣。

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我了解到，在印度支那戰爭之初，英國就曾命令戰敗的日本用武力占領印度支那，這是美國國務院和其他相關機構支持英國及其殖民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從一九四五年起，直到一九七五年，由美國在印度支那采取軍事行動而導致的冲突，無不帶有這種殖民政策的特征。(64)

我也知道，印度支那戰爭中所謂的“真實動機”實際上是肯尼迪之后美國政府和麥喬治·邦迪、羅伯特·斯特蘭奇·麥克納馬拉金融集團腐朽經濟的副產品。(65)因此，針對戰爭問題而采取的政治行動在我看來很可能只是那些“反戰”積極分子為達到自我心理滿足的目的所擺出的一種姿態而已，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何以讓那場戰爭繼續下去。

那場戰爭就象腐敗的波爾克總統對黑西哥進行的戰爭以及許許多多發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戰爭一樣，實際上也帶有傳染病的症狀。波爾克的戰爭是后來美國南北戰爭的前奏，具體講就是大英帝國操縱其南部邦聯的傀儡政權，試圖通過把美國分裂成兩個或更多小國的方式來瓦解、征服美國，名為反對奴隸制，實為推行奴隸主暴政。波爾克的戰爭與他手下的邦凶皮爾斯總統和布坎南總統叛逆行為之間的聯系是不言而喻的。同樣，約翰·昆西·亞當斯和林肯以及其他人聯合反對波爾克的戰爭也是明擺的事實，這是林肯總統早年維護聯邦利益、反對奴隸制和反對背叛革命的實例之一。波爾克戰爭說明了切勿被魔術師的花招所蒙騙的重要性，也說明了不能低估這樣一個事實：戰爭的爆發也許就是狡猾的魔術師玩弄花招的結果，象羅馬皇帝讓角斗士相互殘殺來取樂一樣。

這種魔術師的伎倆也用在了眾所周知的越南戰爭中。這也是一種感染。如要有效治愈，就得把受感染的部位切除。

我所抨擊的要點是：由于美國經濟因 1966-1967 年的約翰遜政府經濟政策的改變而急速下滑，所以必須有一個較為理想的戰略環境來保證大規模經濟復蘇計劃的實施，即美國和西歐向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投入資金，加速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說到戰爭對國內事務的影響，美國必須把對人權改革的承諾與為種族歧視政策的受害者提供更多經濟發展機會結合起來。整個美國勞動力市場需要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來改變業已存在的經濟衰退狀況。六十年代后期的美國缺乏的正是這種經濟發展計劃，而發展計劃的具體形成是把戰時成功的經濟方案與美國公眾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迫切需要結合起來，與經濟發展和人均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結合起來。具體行動的方式則是把戰時成功的經濟模式與六十年代美國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而迫切的需要結合起來，與經濟增長和使人均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的“應急計劃”結合起來。(66)

這樣，我們就必須把制定政策的議事日程落實到真正的戰略問題上，也就是隱藏在魔術師血腥騙局之后的問題上。我們也必須把這些根本問題擺上桌面，免得自己成為競技場上愚蠢而注定要死去的角斗士。不然的話，我們就只會以輸掉戰爭來結束戰爭，因為我們已經被困在魔術師的陷阱里了。這場戰爭的發動和升級，其真實的目的是自我毀滅美國，讓我們這個國家如此愚蠢地被誘導去打這場無必要的非正義戰爭，為我們帶來可怕的懲罰。

因此，反戰運動最終給美國和世界增添的苦惱甚至比戰爭本身給我們帶來的苦惱更多。對于當時政治辯論中的反對派來說，他們顯然沒有從美國南北戰爭和波爾克對墨西哥戰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吸取任何經驗或教訓。

一九六四年以后，美國出人意料地改變了對印度支那的政策。這種改變代表了東南亞地區和美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只要改變印度支那戰爭中根本的戰略前提，就存在終止這場戰爭的可能。如果美國，或反戰運動本身有意采納這項策略，那美國就可通過在印度支那結束戰爭的方式來贏得更大的一場“戰爭”。

下面談談第二個問題，即七十年代戰略發展的背景。

一九七一年，隨着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當時的戰略形勢主要可以通過兩個災難性事件來加以說明：

1. 正如我在一九七一八月到九月所寫的那樣，輕率地制定經濟政策，其結果必將是全球範圍的經濟災難，如 1971-1972 年失控的浮動匯率金融制度。

2. 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中所固有的“世界末日”含義。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對這兩個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調查研究，使我能够逐步形成一九八三年春天提出的戰略防御倡議。到一九七六年大選時，有關的一些潛在危機已變得明朗起來。

卡特執政期間的戰略形勢顯然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以后的所謂“最低綫”是

在1962年導彈危機的背景下，英－美－加聯盟與赫魯曉夫政府聯手實施西拉德在一九七八年的帕格沃什大會魁北克會議上提出的末日政策。其目的是想通過戰略協議逐步地削減美國和西歐戰略政策中的科技因素。

為實現這一目標，第一步就是在英國王室操縱下對英國麥克米倫首相政府一位主要官員“性丑聞”的曝光，以期搞垮那屆政府，把哈羅德·威爾遜首相的工黨推上臺，實施削弱聯合王國工業潛力的計劃。英國王室的戰略就是通過先放火燒自家房屋、再引火燒鄰居房屋的方式摧毀本國及盟國的經濟體制。

試圖暗殺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急于搞垮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后來的路德維格·埃哈德政府的政變以及其他一些行動，使世界經濟在1967－1969年的英鎊美元危機中受到巨大影響。隨后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麥克米蘭政府的垮臺，肯尼迪總統的暗殺，阿登納和埃哈德的相繼下臺，有效地消除或削弱了政治領導能力，使以科學為動力的戰略經濟計劃夭折。這一情況貫穿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到導彈危機之間的整個階段。

肯尼迪政府的太空計劃是以科學振新美國經濟的成功典範。但從1966-1967年開始，這一計劃遭到削減，同時，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的衰退加速，而這些經濟部門對實物經濟的純增長、人平收入增長和實物經濟生產率的增長至關重要。卡特政府實施永久性赤字預算，更加劇了美國經濟的衰落。這一情況從七十年代中期一直持續至今。

戰略防御倡議的經驗和教訓

因此，我們陷于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和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即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夾擊之中。戰略形勢日益變得危急。一方面，由于武器控制協定的鑒定，超級大國已陷入限制其末日方案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我們已經從經濟體制中拿走了那些對擺脫末日方案困境必不可少的東西。對于那些有知識和智慧看清這一發展過程的人來說，即使在今天，我們還處在這一不斷惡化的末日陷阱之中。坦白地講，超級大國之間大規模的導彈攻擊已成歷史，但卻使形勢因難于把握而變得更加危急。

到七十年代中期的1975年至1977年，這個戰略困境成為我關注的焦點。基于此，我制定了一項戰略計劃，也就是后來里根總統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電視演講相關部分中提到的戰略防御倡議。我最初提出的戰略防御倡議的某些關鍵部分后來被人篡改，以致時至今日也無法啟動。三月二十三日由里根總統提出的計劃的主要內容仍舊實用。而今天由五角大樓提出的彈道導彈防御計劃，只不過是用來嚇唬小孩的怪物罷了，根本無法與當今真正的末日方案相抗衡。

在最初的戰略防御倡議中，第一個關鍵的內容是由總統提出的與蘇聯共用相關技術的有關問題。第二個關鍵的內容——盡管總統在3月23日的演講中并未提到——是彈道導彈防御計劃的可能性完全取決于基于“新自然原則”而絕非先天不足的所謂高速火箭推進器的“動力學”系統。第三個關鍵的內容是用于發展戰略和戰術彈道導彈和相關防御性武器以及用于非軍事目的的有關經濟方面的技術。因此，就第三點而言，我以前已經向蘇聯政府提過，現在又在總統演講中提出，這需要雙方承諾使用這一方式來加強兩國在彈道導彈防御體系上的合作，也可象肯尼迪總統的太空計劃一樣，使科學成為發展世界經濟的原動力。

總之，我所制定的戰略防御倡議，旨在打破七十年代因經濟衰退而出現的僵局，發展戰略彈道導彈的防御體系。如若不然。末日方案就很可能出臺。

反對戰略防御倡議計劃的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阿曼德·哈默的兩個門徒尤里·安德羅波夫和M·戈爾巴喬夫（當然也包括同樣是阿曼德·哈默門徒的艾爾·戈爾）；二是與當政副總統喬治·布什相關的集團；三是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四是共和黨及民主黨一九八四年的大選競選委員會（這其中不包括里根總統）。不然的話，戰略防御倡議的實施在技術上和經濟上都是可能的。也許有許多人在明白了這些含義之后，會跪在地上乞求實施這一計劃。由于日益

深化的危機而跪地乞求的人現在將不斷增加，每天早上太陽升起之后，就會有新人加入。

美蘇在戰略彈道導彈防御體系方面進行合作還有一個潛在、深刻和關鍵的寓意。對所有文明國家及其政府來說，最關心的問題是在感到有一種戰略威脅、特別是軍事威脅時，怎樣才能削弱敵對勢力，瓦解敵對勢力之間的關系。今天，看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戰略發展的背景，再看看八十年代末蘇聯是怎樣土崩瓦解的，任何一位有思想的觀察家都會問："既然情況是這樣的，我們為什么要成為核對抗國家？在以后的幾十年里，這個問題將會有多嚴重？如果相互敵對的狀態在八十年代末就很快結束，是否就表明當時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如果找到并采用了正確的方法，這個問題是不是早就解決了？難道我提出的戰略彈道導彈防御計劃不正是應該采納的方案嗎？

現在，不妨再來看看我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二日在公開場合談到這個問題時提到的另一方面。

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在華盛頓最后一次與蘇聯的一個代表會面。他向我表示，他的政府將拒絕接受我針對麥克洛伊、邦迪和基辛格的"確保共同摧毀"而提出的蘇美兩國在發展戰略彈道導彈防御體系中進行經濟與科學合作的計劃。根據隨后幾周內所發生的事情以及 1983 — 1989 年總的情況來看，我當時的回答在以下幾個方面直到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說，如果里根總統公開向你們的政府提出我的計劃，而你們的政府加以拒絕、或一直不予采納的話，那蘇聯經濟將會在 5 年之內崩潰。總統的確公開提出過那項建議，可蘇聯政府拒絕了，之后也一直未予采納，且言詞極為強烈，對總統如此，對我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六年十月的雷克雅未克會議。在幾天之后的另一次會議上，美國政府里的一個派別在司法部的威廉·韋爾德（William Weld）指使下提出一項議案，作為一齊向我與其他的一些人開火的幌子。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自一九八九年夏、秋的波蘭和東德開始，華沙條約國也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而解體。

后來，我把這"大約五年"的預測載入了大量發行的公開出版物中。

我怎么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根本原因是我本人是一個經濟學家。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預測。

在蘇聯民用經濟體制臭名遠揚的同時，其所謂的科學、軍事和工業體系卻集中擁有世界上最強的科學勢力。關鍵的問題是，這反而成為發展民用經濟的障礙。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始，直至肯尼迪總統的航天計劃都反復證明，太空計劃的發展將促進民用工業的發展。如果把我在彈道導彈防御計劃中的建議付諸民用，再加上美國與蘇聯、西歐與日本等國的合作，有可能創造一次全球的經濟大發展，其副產品自然是重建困難重重的蘇聯工、農業體制。

如果放弃這一選擇，那么蘇聯不健全的經濟體制中資金的疲軟將在大約五年時間里導致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就這樣，一九八八年的夏季和秋季證實了我一九八三年的預言，華沙條約國作為一個整體已開始逐步瓦解。因此，我作了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的公開演講，警告人們大約在 12 個月內將會出現的危機，并建議把解決食品的供應作為華沙條約國開放的前提。

不幸的是，我的對手喬治·布什當選總統。他倒是就職了，而我卻進了監獄。一切正如我所預言的那樣，布什把所有的事情搞得一團糟。現在，艾爾·戈爾副總統又極力想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更糟。

最后，再來說說戰略防御倡議本身。1977 — 1986 年，我搜集了大量證據，表明只有基于"新自然原則"的戰略彈道導彈防御體系才能發揮作用。為了避免出現戰略防御倡議中所列出的各式各樣可能出現的問題，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發起一場科學技術革命，實施一項大規模的、以科學為發展原動力的計劃，以擯除自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以來美國戰略政策中的諸多弊端。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吸取的經驗教訓是：一個國家的戰略規劃并不是從制定戰爭計劃開始的，而是從創造歷史開始的。要創造的是歷史，而不是戰爭。

是創造歷史，而不是制造戰争

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軍事戰略方針不單單是一種技巧，也不只是有關軍事行動的一組特殊的原則。它總體上是國家戰略事務管理的一個完整體制。這種國家戰略事務管理正面臨着歷史的挑戰，因為它的任務就是竭力使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國家機構擺脱以往那些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極不健全的寡頭殘余的控制。

換言之，僅僅把軍事戰略建立在國家之間的冲突上是没有發展前途的。以國家之間的冲突為由實施的軍事戰略必須首先考慮是否文明受到有效的保護，是否人類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這是我在制定印度支那戰爭策略和提出經濟戰略發展計劃的戰略防御倡議以及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闡明我的戰略學説時從管理國家的角度曾經考慮過的問題。

衡量戰略級别的標準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對自然原則所特有的觀念，它是所有法律的根本。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存在均有着這個意義上的法律依據。

因此，按照今天的説法，所有戰略計劃，包括軍事行動的目的都是建立并維護一個主權－民族國家公正、公平的社會生活制度，因為這是充分體現所有人性美德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與之相反，所謂世界政府的概念只不過是令人憎惡，可以讓人們想起倒塌的通天塔形象。

與艾爾·戈爾副總統見解相反的觀點是，戰爭不是把一個人内心的觀念強加給受害者的手段，不管受害者是個人還是國家。利用國家的力量、特别是強大國家的力量來反對任何個人、政府或民族，以達到這樣的目的，是對人性的犯罪，哪怕這種反對還只停留在觀念階段。戈爾所藐視的道德法則，正是使我們人類區别于其他物種的自然原則，也是各個國家必須遵循的唯一公正的法則。

如果我們不接受和強化這種道德法則，那麼現在地球上日益變得混亂、遭到破壞的文明就無法渡過將要過去的二十世紀。

為此，政治家必須具有對同時永恆的認同感，不然他就没有資格、也没有能力在如此危急的世界形勢下作出應有的判斷，管理好自己的國家。同樣，一個有能力、有膽識而不濫殺無辜的軍事指揮官也必須具有聖人一樣的良知和高尚的道德品質。我堅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就是他們中的楷模。要達到這樣高的道德標準有時是很困難的，但只要我們不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堅持不懈地完善自身，就有希望減少自己與高標準之間的差距。

政治家和軍事指揮官的良知還必須在過去和未來與道義保持一致。他們必須以史為鑒，總結出根植于自然原則的根本規律。因為責任感不是空洞的原則，它必須反映出有高度教養的良知，對歷史的了解與把握，以及對人類世界普遍原則的發現與認同。遺憾的是，現今的中、小學和大學已不再開設這方面的課程。

如果你認為這些嚴峻的事實并不是真地讓我感到擔憂的話，那麼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其實，我的擔憂超出了你們大多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因此，我迫切希望并強烈要求自己具有洗新革面的勇氣。

所以，我的戰爭觀點是：絕不為了戰爭而故意挑起戰爭，我們需要創造歷史。

5. 外交和經濟新政策

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以來，世界形勢的發展進入了極不穩定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前進中的世界歷史不再以過去政府和一般公民所習慣的方式形成，人們對當今歷史的觀念的形成也不再通過以往歸納演繹主要歷史事件綫性發展脈絡的方法。

相反，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以來，當今歷史無時無刻不在重新形成和重新變化之中。它既不是單一的歷史事件，也不是一系例綫性發展的歷史事件，而是物理學家描述的全球範圍的、連續不斷的、復雜而多樣的相變過程。要説明這種歷史進程非同一般的特性，可以用這樣一句話："導致事故的原因已不再是交通阻塞，而是地震。"

在政治領域，給人地震一般強烈冲擊的相變集中體現在三個權力集團的關系上。主宰當今世界歷史進程的正是這些相變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歷史事件本身，更不是新聞媒體習慣上所指的"問題"。

在最后一章里，我將談論三個重要的問題，以期幫助大家理解并把握走馬燈似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我將盡可能簡要地説明什么是當今歷史形勢下的相變。其次，我將用最近發生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來論證這一點。最后，我將提出自己的應對辦法，為有識之士和下屆美國總統迎接挑戰作參考。

5.1 什么是相變？

就我所指的"相變"而言，有一個簡單的比擬是比較恰當的，即冰變水，水變水汽，水汽再變成等離子。這説明，盡管物質的化學結構顯然没有變化，但其物理狀態卻在外界的作用下發生了根本變化。

取一燒杯蒸餾水，放在常壓室內，然后使其冷卻。這時水温開始下降，但并無任何其他變化。當温度降至華氏 32 度，也就是攝氏零度時，你也許會注意到水的體積有所改變。然而，水仍然是水。之后，變化開始出現，冰在水面形成。如果繼續降低温度，就會出現一塊冰，燒杯也許會碎裂。再取一燒杯水，加熱后很快水就沸騰，水變成了蒸汽。每次物理狀態的變化，都伴隨着運動方式和影響環境方式的根本改變。

如果你把一個物體放在一根無限長的充滿空氣的管子里，然后使其不斷加速，這時的相變顯然有所不同。當該物體的推進速度相當于聲音的速度時，其物理狀態將發生變化，產生黎曼超聲激波峰（Riemann trans-sonic shock-front），這是因為物體與空氣媒介的關系有所改變。再如，把氫的同位素與鋰元素混合后用特殊方法進行壓縮就會產生核爆炸，等等。

自然界充滿各種相變現象，相變產生的結果經常令第一次觀察到這種現象的人感到驚奇、神密。然而，一個人所經歷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心理方面的相變卻有着與以上各例自然界相變現象不同的特征。盡管如此，我們所説的政治變化仍然是一種相變現象，只是與物質世界的相變有不同的變化規則罷了。換言之，生物界比非生物界有着更為錯綜復雜的多種特征，而人類的行為又比其他任何生物的生長過程要復雜得多。與人類相比，自然界没有任何"力量"是神密的，只是對新的事物都得有一個認知過程罷了。

我們可以把具有以上各例相變特征的非持續性的相變現象叫做“狀態變化”。然而，如果有許多大規模的社會制度，其中每一個制度都在經歷自身狀態的變化，而每一個制度又同時對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相鄰制度狀態的變化作出反應，我們又該把它叫做什么呢？這種現象即出現在人類歷史的早期，也出現在現在以及所有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結果只有在標志從一種社會狀態向另一種社會狀態過渡的動蕩時期才能被一般人所了解。這個動蕩時期是臨產前的陣痛，是社會形態的新生。就歷史而言，没有任何“一般時期”，也没有全然不同于動蕩時期的歷史規律，而只有相對更為平靜、無法預知確切“生產”時間的孕育時期。在劇烈陣痛到來之前，大多數人都在打瞌睡，做着一些簡單的夢。

而今，簡單的夢業已成為過去。劇變已成為平常的社會狀態。粗略地講，在過去的十五個月里，世界所經歷的正是這種全球範圍內、各種社會制度之間的劇烈的變化。這種根本性變化決定了世界上不同歷史事件的變化形式。

這些變化主要指三國集團之間結構關系的相變。這種國際事務新狀態出現的結果就是一個大的“三角”關系的形成，成為世界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這個事實可以從許多方面來進行説明。

最簡單、也許是最令人吃驚的例子就是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政府對正在進行的非洲黑人的種族屠殺麻木不仁。這是瘋狂的大屠殺，從血腥暴政的烏干達一直蔓延到越來越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這場種族屠殺主要是在英國的煽動下，在以色列的直接參與下，以及梅德琳·奧爾布萊特與首腦委員的美國國務院之間達成默契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些政府官員和機構要對六百多萬非洲黑人的死負責。至到今天，大屠殺不僅還在進行，而且被這些人越演越烈。

這種令人震驚的事件如今已不再使大衆和各國政府受到良心上的遺責了。難道一定要等到千百萬非洲黑人被這場持續的種族屠殺奪去生命以后，梅德林·奧爾布萊特的國務院才會拋弃蘇珊·賴斯以及繼續讓賴斯充當旗手的策略嗎？

艾爾·戈爾副總統激昂而虛偽的“人權”到哪里去了？你怎么啦，艾爾？是不是因為他們是非洲的黑人，你就象看待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前美國參議員和一九九六年民主黨全國大會期間美籍非洲人、正義斗士卡羅·莫斯利－布朗那樣去看待他們？它是如何反映你對美籍墨西哥人的態度的？你無視國務院對非洲大屠殺的支持，是否在暗示我們必須閉讀你的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政策，暗示你把拉丁美洲人基本上視為奴隸勞力？

這就是我們的時代，這就是他們的習俗。

因此，目前我們這個星球的命運掌握在最近才出現的三個權力集團的手中。

* 首先是所謂的“英－美”集團，即超級自我膨脹的的銀行家俱樂部（“他們當然應該富有羅，因為既然他們以超高速的速度自己印制鈔票），一個擴大的英－美－加聯盟，其中心并不是美國和英聯邦，而是華爾街那些律師和銀行家精英日益密集的圈子。

* 其次是被公正地描述為歐洲大陸相對較窮的“窮人俱樂部”。這個地區過去那些高傲的主權－民族國家而今卻變得日漸俗氣、日漸古板，成為撒切爾、密特朗和布什 1989-1990 年馬斯特里赫特騙局的受害者。(67)

* 第三集團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以后才出現的。它是一個“后戈爾時代”的歐亞集團，可以恰當地稱為“幸存者俱樂部”，是由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組成的一個三角集團。同時它也包括前蘇聯和東亞以及南亞被這三個國家吸引的國家或地區。這就是歐亞地區三個最大的權力集團。眼下，這些政權正傾力鞏固各自的地位，因為它們都面臨着權力困境，正如俄羅斯總理普理馬科夫最近所描述的“幸存者俱樂部”的戰略困境一樣。

除此之外，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全都運行在環繞這三個最大的、主要的戰略“俱樂部”的軌道上。

在進行有關集團問題的討論之前，讓我先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三個主要跨黨派議員集團勢力

以女皇伊利仨白二世和幾窩鷄・布什為象征的英－美－加人集團。

從前元氣充沛和至高無上地繼續增加孤注一擲的歐洲大陸尸體群，如德國總理舒哈德・隰若德。

“逃生者集團”，包括中國、俄國和印度，以及其它歐亞勢力。這里顯示的是1998年中國主席江澤民在俄國搦肟汜庫閼粗緙，他在那兒預告俄國對亞歐科技發展的巨大潛力。

在下面的論述中，除非特別注明，我都把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真正的美國公民看作是華爾街以及艾爾・戈爾虛幻美國的局外人，就象中、南美洲的國家和人民一樣，被排斥在三個主要集團的權利之外。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大約有 80% 的美國公民都表示支持克林頓總統，反對彈劾。所以，真正的美國人民并不屬于三國集團的任何一方。

如果有人對美國人民大多是第一集團的局外人還表示懷疑的話，那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彈劾的設計者“在宗教意識上”（按杰里・福爾威爾牧師的話說）或“在民主意識上”（用艾爾・戈爾的話說）忽略了據估計有 80% 的民衆的意見。他們急于彈劾總統，因為他們擔心在華爾街金融風暴日益逼近的情況下美國人民可能會憤而奪回他們的政治權力，從而很有可能導致第一“俱樂部”，即艾爾・戈爾在華爾街的那些律師和銀行家朋友的權力機構的終結。這就是他們急于使華爾街推舉艾爾・戈爾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的真正動機。

還有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戈爾的升職只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一是通過彈劾現任總統，而不是大選；二是通過暗殺，就象西奧多・羅斯福副總統入主特迪・羅斯福的“白宮”時所做的那樣。

那么，在世界上變幻莫測的相變過程中，三個集團之間又是怎樣發揮其各個不同的作用呢？

第一集團，即“銀行家俱樂部”，是一個瘋狂追求權力的集團。他們就像戈爾副總統這個烏托邦瘋子一樣，其幻想和瘋狂的程度簡直可以與十七世紀的“鬱金香狂熱”和十八世紀早期曇花一現的英、法泡沫經濟相媲美。華爾街的這些“自由貿易”狂，實際上都是些瘋子，象地窖里行將滅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伊麗莎白二世那些通神的溫莎宗派子弟一樣。這些人寧願把全世界的人都打入地獄，也不願放弃戈爾的支持者 D.E. 肖對俄羅斯經濟前景表示的懷疑。戈爾在濫用

“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些字眼時其惡毒的用意在于給人們造成一種“奇境中的艾麗斯”式的假象。看看這些銀行家俱樂部的成員及其食客們，他們張開肥大的嘴東游西蕩，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只不過是制造有史以來最大、最嚴重、毫無價值可言的通貨膨脹和債務而已。他們知道，正如艾倫·格林斯潘不時暗示的那樣，他們正在用非理性主義的狂潮把世界推向滅亡的邊緣。然而，他們我行我素，用阿道夫式的瘋狂來尋找防衛自身體系的“唯一”方法。

第二個集團是由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三國形成的一個權力三角，它也包括許多其他國家。該集團各成員國雖不屬同類，但他們都意識到了互為依存的重要性，因而必須協調一致。這個歐亞集團是戈爾副總統無意之中建立起來的，因為他無耻粗暴地推行金融腐敗，干預俄國的內部政治生活，因為他在奈良、在吉隆坡和其它地方無加掩飾地顯現出仇視亞洲的種族主義思維。這一歐亞集團完全有理智的，自然也是美國人民真正的伙伴。按我們美國人的標準，他們是理智的。他們所表現的這種理智正是今天的戈爾和華爾街所缺乏的。

第三個集團是歐洲大陸的窮人俱樂部，對這樣一個集團我有着非常復雜的心情。這個以法國和德國為中心的集團代表了那些經濟和其他方面已不如從前、但民族意識又不斷提醒他們與俄羅斯及俄羅斯現在或將來在亞洲伙伴國保持經濟或其他互惠關系的國家。他們視為生死悠關的利益也正是現在被布萊爾——戈爾瘟疫般學說視為垃圾的東西。

比如，布萊爾－戈爾反對伊拉克是因為伊拉克讓他們感到害怕、感到震驚。因為幾乎所有歐洲主要的軍事和其他專家都知道，首腦委員會没有能力處理軍事事務。如果首腦委員會一意孤行，繼續現行的政策，那戰略災難就將提前形成。

由此看來，目前支配歐洲大陸的是一種復雜的情感和混亂的政策。同時各國又痛苦地意識到，歐洲大陸的根本利益絕對不在華爾街和布萊爾王國共同為他們指出的道路上。如果形勢繼續朝着布萊爾和戈爾指出的方向發展下去，那歐洲大陸即便能與華盛頓站在一起，也不會持續太久。

有趣的是聯合王國與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聯合王國內，越來越多的所謂的“右”派和“左”派正開始考慮布萊爾和戈爾的朋友們的愚蠢行為。

伊麗莎白二世集團赤裸裸的通神論者的愚蠢而瘋狂的行為和“亞當斯家庭”式的垃圾（68）以及卡米拉·帕克鮑爾斯没完没了、毫無品味的“表演”，使戴安娜女士的枉死成為今天聯合王國全部政治生活中説不清、道不明的現實之一。戴安娜女士的雙眼將永遠讓住在那幢通神房屋里的人感到害怕，她的幽靈將會一直出没于伊麗莎白二世的住所周圍，讓女王不得安寧，象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麥克白斯夫人以及路易十一被他死去的女兒珍妮攪得不得安寧一樣。這不僅僅是丑聞的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無怨言地意識到，聯合王國如果没有溫莎家族也許更有生存發展的潛力。這種意識更多地是基于聯合王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有時是基于皇室的暴力和其他丑聞而產生的。如果站在倫敦來看華爾街將會受到的冲擊，也許人們不禁會想到，宇宙畢竟不是在公元一七一四年被創造出來的。

同樣，英聯邦也已經開始土崩瓦解。

眼下，這三個集團還没有出現基于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動的明顯的迹象。相反，在第一集團內倒是出現了越來越多根本不同的見解和看法。

俄羅斯和中國政府曾以多種方式明確表示，他們與今天的戈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本没有共同點。但華爾街和戈爾絕不會心甘情願地放弃目前瘋狂而愚蠢的行為方式。歐洲大陸國家和聯合王國的一些人倒是願意推進與歐亞“幸存者”集團國家的關系，不過這也説不準。就目前的情況看，歐洲的任何地區，無論是大陸或英倫三島，都不可能在七國集團的經濟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還在暗中推行的條件各自相安無事，繼續求得生存和發展。

必須打破僵局。不然，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區將很快在現在的青少年還未成人之前就陷入新的黑暗年代。

同時，目前還未找到發展三個集團國家良好關系的共同方案。只要艾爾·戈爾的華爾街不願理智地去處理三個集團國家之間目前極不穩定的局面，那世界上的任何地區都不會存在什么共同方案。

下面談談相變產生的典型方式。

5.2 相變：艾爾·戈爾和“長期資本管理”組織

最近，艾爾·戈爾副總統正加緊維護自己名不副實、日漸降低的“誠實”的名聲。這當中包括近十五個月以來不少相變發展和相變之間相互作用的例子，即始于一九九七年十月的經濟危機。它標志着全球金融秩序開始進入最后階段。

戈爾副總統是個非常下流、非常腐敗的家伙，他利用他在競選辦公室的影響來進一步開展根本沒有把握的國際金融業務。其中一些有案可查，涉及大量資金。而他個人得到了許多經濟上的好處。肮臟的金錢交易一直以來都是政治腐敗的顯著特點。據《紐約時報》的記載，一九九五年就有一些這樣的交易被中情局的反情報“探雷器”抓個正着。(69)

戈爾與《紐約時報》記載的不正當行為之間有着更深一層的聯系，這種聯系一直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五年。這些肮臟的關系于一九九八年三月隨着當時的葉利欽總統解除戈爾的朋友、俄羅斯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的職務而開始浮出水面。(70)這可以看作是對當時召開的莫斯科會議提出的政策問題的總結。那次會議我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與俄羅斯主要的經濟學家們一道出席的。(71)看看有關會議進程的記錄，再看看戈爾是怎樣濫用其競選官員的職權掠奪俄羅斯，破壞美國極其重要的戰略利益的。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出于對個人利益的考慮。難道你不能從中嗅出克林頓總統彈劾案中所散發出來的氣味么？

圍繞戈爾進行的肮臟交易導致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他躲在克林頓總統背后一陣又一陣歇斯底里地發作。在俄羅斯方面，戈爾成功地使他的朋友切爾諾梅爾金重返政壇，成為俄羅斯總理的提名人。然而，隨着九月二十三日長期資本管理的出臺，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出現新的相變現象。戈爾耍陰謀的結果是：切爾諾梅爾金并沒有第二次當上總理，而是由老資格的俄羅斯官員、外交部長葉夫根尼·普理馬科夫取而代之。這又是一次相變。

同時，克林頓總統改變了早些時為全球金融危機進行呼吁所作的承諾。于是，十月份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七國會議上又出現了一次新的相變。作為對戈爾與長期資本管理組織之間腐敗關系暗中進行曝光的回應，美國政府發起了一場超級通貨膨脹風暴，竭力掩蓋真相，保護那些與戈爾為主角之一的特大丑聞有牽連的人。

這樣又導致出現一系例關鍵的歷史事件，包括克林頓總統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亨利·基辛格在西岸的故舊 A. 沙農施加的壓力。結果導致了一個由打入戈爾首腦委員會內部的以色列特工推出的對伊拉克實施新一輪“行為調節”式轟炸計劃的產生。雖然克林頓總統取消了轟炸計劃，去了以色列，但訪問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就給戈爾之流再次背着總統實施其轟炸伊拉克的計劃提供了一個機會。同時，克林頓總統的懷河協定被內塔尼亞胡和沙農成功阻斷。與之同時，在華爾街的支持下，彈劾總統的進程得以加快，使這位覬覦總統寶座而又無法正常當選、丑聞纏身而又可能受到控告的戈爾差一點就當上了總統。

現在再來看看這一系例相變過程對歐亞“幸存者”俱樂部戰略發展的影響。

正如我指出的那樣，一九九八年發展和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一九九七年世界金融貨幣制度在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衰退后進入最后階段時所爆發的危機。自一九九二年以來，這個衰退過程的主要特點是由一系列非法“垃圾債卷”、衍生金融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手段導致的整個金融系統的腐敗。美國的加恩 - 聖．杰曼和肯普 - 羅思法案(Garn-St Germain and Kemp-Roth bill)在 1979 — 1982 年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無節制地發放由三邊委員會擬定的高利貸中起了關鍵作用。可以說，一九九七年十月相變的影響給戈爾副總統與切爾諾梅爾金和戈爾在華爾街

的老朋友之間進行的一些敏感的三方交易和勾當施加了一定的壓力。

這樣，戈爾在“長期資本管理”組織中的一些知名的競選贊助者就特別需要俄羅斯的合作來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因為在利用俄羅斯債務進行的投機買賣中已經出現了衍生金融交易的漏洞。因此，戈爾陷入了與切爾諾梅爾金同樣尷尬的境地。

進入一九九八年秋季或初冬以來的形勢發展，在促使歐亞集團開始形成以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為核心的三角關系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吉隆坡亞太地區經合會議的背景下，這種形勢的發展在首腦委員會的頭目戈爾和奧爾布賴特的眼皮底下引發了由托尼·布萊爾首相和“代理總統”艾爾·戈爾一手挑起的對伊拉克的新一輪轟炸。這次轟炸在改變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階段性關系中有着“最后稻草”的作用。

所以，歷史事件引發相變，而各種相變本身又在全球範圍內相互作用。請將我剛才談到的這些主要事件再回想一遍。將我所談到的這些事件與我在本章開篇中解釋的相變作一比較。

在冰變水、水變汽、汽變等離子的過程中，致使物質狀態改變的不間斷的傳動作用是一燒杯化學結構為“水”的物質能量流通密度的穩步加大。在 1997 — 1998 年戰略發展的實例中，由能量流通密度的逐步增加所起的傳動作用體現在我在前文就有所描述的“三曲綫函數”表中。表中自左向右的曲綫運動代表從 1966 — 1998 年的時間跨度，它的功能與作用相當于在冰變水的相變過程中能量流通密度的增加。

然而，從數學上講，“三曲綫函數”表中的傳動作用形式屬于符合高斯 - 黎曼超級幾何學標準的更高層次的組成形式，也就是多連通簇。它遠比冰變水的相變現象更為復雜。不過，即便對所有相關現象都加以考慮，在這兩種相變現象中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具有很大意義的共同特征。

首先，我們可以用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巴門尼德》對話錄中的觀點來給處于能量流通密度和壓力各種變量中所有物理狀態下的水下一個定義。什么是作用的原則，變化的原則？我們應該巧妙利用“水”這一不變的定義來說明所有物理狀態下的水以及水的各種狀態之間的相互轉變。來布尼茲用來規範其計算的標準，就是高斯和黎曼超級幾何學定義的標準。按照這種標準，在函數曲綫的每一個點上用來限定、說明一個社會制度所有可能狀態下的關鍵變化的特征，實際上就是這種超級幾何學可以測定的關鍵的特征函數。(72)

在“三曲綫函數”表中，有特點的是按每人每平方公里計算的實物經濟、貨幣和金融總值之間的關系。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三曲綫特征函數是一種熵變函數。它代表着自六十年代中、后期以來與較早時期美國經濟的發展相反的美國和世界經濟衰退程度的逐步加深，與水變化中能量流通密度的加大正好相反。

這張“三曲綫函數”表反映了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其中尤以美國和歐洲最為突出）在目前和最近的發展走勢中的特征。這一特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世界的每一個地區。同時，受這一特征的影響而產生的熵變也導致了一系列其他相變，而這些相變之間的相互作用又成為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關系變化的首要因素。

這些相變過程與冰變水的過程一樣，不斷地變化導致產生一連串不同的物理狀態。因此，當今經濟學家使用的統計方法無法預測這一過程中產生的狀態變化。這一過程是一個綜合過程，一個完全非綫性的過程。

然而，頭腦健全的戰略家依靠“沙箱”戰略計劃的時代卻遲遲沒有來臨。戈爾、科恩、謝爾頓和奧爾布賴特這樣的傻瓜和笨蛋根本不知道他們實際上在玩什么“沙箱”游戲，也不知道怎樣預測通過這些孩子式的戰略臆想將會得到的結果。同時，戈爾副總統還涉嫌經濟丑聞，這也許表明他最終將會受到起訴。再者，戈爾在華爾街的那幫老朋友已經使得在全球範圍內誘發一場金融大火成為一種可能。

鑒于以上考慮，再來看看戈爾和“長期資本管理”帶給我們的困惑，以及“長期資本管理”組織與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瘋狂的通貨膨脹政策之間的關系。

戈爾是英國“溫莎”王室中的英－美－加聯盟的一個寶貝，也許不能說是“可以循環利用”的，但卻肯定是“可以自由利用”的。也許在英聯邦統治集團內，他的級別比加拿大的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還要低得多，但是他除了像一粒槍子直接奔你而來以外，還能做任何其他事情嗎？在這一點上他與查爾斯王子很相象，你是不會因為他的緣故而去欽羨他的父親的，不過，他又確實是他父親的兒子。

作為伊麗莎白“麥克白斯”二世英國王室和華爾街英－美－加聯盟的寶貝，戈爾的栖身之地就在“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秘密小集團中。這個集團對彈劾克林頓總統的態度在《華爾街日報》和默多克及霍林格的英聯邦媒體辛迪加中均有所反映。除伊麗莎白本人以外，這個集團內部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沒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只不過是老費金及其少年團伙掏腰包的離奇的翻版而已。可以說，這就是事情的本來面目。

同樣，我們可以說，華爾街的錢都是不干淨的，因為華爾街搞錢不擇手段。不要把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叫作“海盜”，因為他們都有大英帝國的捕押許可證。“長期資本管理”組織是論功行賞的。華爾街及其分支機構的欺騙手段就是“衍生金融交易”。因此，華爾街的多數銀行家和貪得無厭的冒險家都用對冲基金作集團或辛迪加投資，對世界上一些目標地區進行搜刮和掠奪，其中尤以“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為最。對俄羅斯所欠債務進行套利投機活動也是華爾街集團依靠的主要欺詐手段之一。戈爾副總統無疑是一個主角，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尋求華爾街經濟上和其他形式上的支持，而他反過來又幫助華爾街控制俄羅斯的債務形勢，以便給卷入“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華爾街各幫都能帶來好處。

當事實證明衍生金融交易受制于俄羅斯的債務形勢時，艾爾·戈爾和他的華爾街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相變。華爾街對這一相變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發落戈爾。可“長期資本管理”最終還是完蛋了。克林頓總統無所適從，只好聽任艾倫·格林斯潘把自己推上高速通貨膨脹的軌道。可以想象，一九九九年初世界還會出現許許多多的金融問題。

5.3 對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選擇

在目前形勢下，對美國總統來說，除了制定出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外，沒有任何政策是穩健的。最近幾個月以來，我一直試圖闡明這一觀點。這不僅僅是一個更好的方案的問題，而是唯一選擇的問題。任何相反或不同的方案都將給世界帶來自十四世紀“新黑暗時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

無可否認，目前也有其他方案可供選擇。但是，華爾街的方法卻只會給全球現有的金融體制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從形式邏輯上講，現有的金融體制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所提出的修改方案在功能上均是不健全的。問題的核心是，華爾街寧願保持這種不健全。更有甚者，美國政府既沒有意願、也缺乏勇氣把凌架于政府之上的華爾街拉下馬來。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背道而馳的結果就是華爾街可以隨意對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發號施令，施加影響。

之所以說我提出的方案是唯一可選的健全方案，原因是這個方案是在目前特定形勢下使經濟得以復蘇的唯一方案。也就是說，它并非源自我一時的想法，而完全是源自于我的知識，源自于我對危機的性質和在這種類型程度的危機下應對方案的知識。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沒有哪個狗屁不通的經濟學家具有這樣的知識。

把相關的一些數據放在三曲綫圖表中進行對照，結論是，世界現有的整個金融貨幣制度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與一九二三年秋季的魏瑪德國馬克一樣。所不同的是，如今再沒有堅挺的美元來實施“道威斯計劃”，像1923-1924年挽救德國那樣來挽救全球金融制度。

目前美國政治危機的實質是許多人對曾經讓他們誤入歧途的七國集團主要的銀行家和美國政府還心存幻想。一旦美國政府認清形勢，那解決危機的方案顯然就是立即終止“全球化”的進程，對整個體系進行破產重組，在有關主權－民

族國家和政府的監督下重新建立一個完整的金融制度。

任何其他不同的方案或多或少都會帶來不利的后果。我們知道必須做什么，是因為考慮到了自然界不可抗力的存在。如果不立即采用行動，這個世界上的多數、甚至全部文明很快將不復存在。

全球金融制度的重新建立必須在兩個層面上同時進行。狹義地講，就是把重建工作交由每一個主權－民族國家來進行；廣義地講，就是通過主權－民族國家之間簽定新的條約和相關協定的方式來建立對條約各方行之有效的新的制度，或其他相互諒解的形式來保護各主權－民族國家的關稅和貿易利益。下面讓我們先討論一下國家破產重組這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我們必須明白，在破產重組之下，任何現存的債權或債務，即所謂“金融資產”本身都不可能僅僅依靠以前簽定的或口頭約定的契約責任合同來保證其萬無一失、不可侵犯。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是，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的多數國家和處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所有國家實際上都已經毫無希望地破產了。這個體系不僅是破產了，而且是無法起死回生地破產了。更糟糕的是，任何試圖逃避在有關主權－民族國家監督下進行破產重組的做法都會致使金融制度更早地崩潰瓦解，也許還包括民族－國家本身。這就是我所說的“無法起死回生的破產”。

因此，任何企圖以債權瓜分資產的努力，都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多數債權被迫冲銷。在現有的金融制度下，想要債務、甚至一部分債務得到償還，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因此，我們必須立刻承認當前金融制度是徹底破產了，原有的金融債務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但只要主權－民族國家願意采取行動，就可部分或全部重新恢復原有的債權關系。

事物發展的這種狀態迫使我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是作為未來的總統，或者是作為能够影響新任總統的人，我都應該這樣做。下面我將談談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整理日常的文書工作

一些債權在清償過程中將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下來，另一些債權則將部分保存了下來，更有一些債權是有條件地保存了下來。在破產之前以美元計算的債權大多將不復存在。換言之，為了償還一些債務，多數其他債務注定要作廢。要麼所有的債務象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馬克和南部邦聯的美元一樣化為烏有，要麼有選擇地讓國家的行為來確保只有一些債務、而不是全部債務都化為烏有。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貨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它只不過是一種政治虛幻。在現代文明中，貨幣只有在主權－民族國家的許可下才得以存在。只有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而非單單對物質財富的擁有才具有自身的經濟價值。現代國家發行并使用的貨幣是十分方便的，但卻必須保證它的使用在效果上與發行保持步調一致。很明顯，當一個國家必須在以貨幣形式出現的債務和以共同福利為代表的利益之間作出選擇時，國家必須廢除過量的貨幣債務，以保護其共同利益。

這些問題的許多方面都由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根據國家銀行有關國家債務和債權的規定以報告的形式提交給了美國國會。而國家政府必須通過一些可行的合理方式來體面地承兌自己的債務。之所以必須這樣做，并不是因為貨幣本身具有什麼固有的權力，而是因為主權－民族國家有義務維護自身的榮譽。這不僅是出于對應盡義務的考慮，而且是出于對能够繼續有效地服務于國家的考慮。如果債務原本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也就是并未得到主權－民族國家的認可，那這樣的債務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據，因而可以合法地加以廢除。

一些債務必須全部償還，要麼立即現金支付，要麼在没有償還能力時由主權國信托代理機構配給新的等值財產來償還。償還或廢除將取決于美國“大眾福利”的憲法條款。

以往的金融資產自動而完全的重組顯然是盡量保證所有普通家庭自給自足以及中、小型工商企業和專門服務機構能得以生存、維持下去。歸入這類財產的還包括小額個人銀行存款、養老金、健康服務費用等等。只要自給自足的普通家

庭的利益還存在，大規模的資產回收和其他形式的、潛在的金融混亂就是不允許出現的。對這方面的問題加以考慮必須盡可能地符合慣例。

有鑒于此，我們應該立即作出全面而明確的決定，以便正在進行資產重組的那些機構能着手處理其他爭奪更為激烈、數額更為龐大的債務問題。

關于有爭議的大宗債務，有兩個定義廣泛的方案可以用來指導主權國家機構進行破產重組。這是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因而必將自動波及并影響到國際關系領域中的管轄權問題。

談到破產機構資產重組的有效途徑，有兩個普遍的問題在重組過程中必須首先加以考慮，以判斷其重組清資核產是否適當：

1. 必須明確定義導致破產的自身失誤，其對內和對外的影響必須消除。

2. 必須有助于經濟快速而健康的發展。進行破產重組的國家經濟必須盡快恢復到自身穩定的實物經濟生產盈利狀態。

通過對以上兩個指導原則的說明，我認為必須在觸及美國以及與美國有關的其它國家關系上強化美國憲法中“大衆福利”的條文。

在三曲綫函數表中，我詳盡地研究了第一個問題最為突出的特征，這無疑有利于我們閱讀并了解第二個問題。

鑒于此，我們必須用三曲綫函數來說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病理學現象和熵變效應，這是最近三十多年美國和世界經濟呈衰退勢頭的特征。因此，三曲綫函數描述，反映了那些影響很大的國家政府和私人機構在政策制定中其行為反常的病理學特征。這些行為特征是一個國家或私人機構體制內部所特有的病理因素，因而必須從自身着手加以根除。

除此之外，三曲綫函數的熵變形式還暗示着一個反熵三曲綫函數，即自然經濟、貨幣和金融的曲綫正好與描述病理變換函數的曲綫相反。其中，按人平和每平方公里計算的實物經濟增長曲綫的發展速度相對較快，而金融曲綫的上升勢頭總是顯得相對較弱。在確定債權、發放新信用和為新信用確立相應條款時，反熵在經濟復蘇中的影響必須優先考慮。

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暗示着主權－民族國家不僅要承擔廢除最近幾十年與三曲綫函數表中有關的各種金融、貨幣慣例所帶來的后果，而且還要承擔各項金融事務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所帶來的后果。

這就是廣泛意義上的金融資產重組。它理應用來引導主權－民族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資產重組進行有效管理。

5.4 歐亞大陸橋：對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回應

極不光彩的“戴克里先律”把零技術增長確定為一個普遍原則。它統治并毀滅了拜占庭，是西歐封建主義霸權的自我腐蝕和野蠻的象征。英國王室的愛丁堡公爵曾作過種種努力，妄想用它來重建世界秩序。與“戴克里先律”正好相反，現代文明的進程在艾爾·戈爾之流的極力反對下，在全球範圍內堅持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方針。這只能通過加大對科學技術的投入力度來實現。

現代歐洲文明起源之初，庫薩的尼古拉斯主教曾強調，所有的人都有獲取知識和從事有用發明創造的權力。的確，現代歐洲文明不公正的一個突出標志就是與庫薩原則截然相反的帝國主義原則：即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否認全世界的人豁某些國家的人擁有自由索取這一能力的權力。

自從世界政府集團取得部分勝利和肯尼迪被暗殺以及麥克蘭、阿登納、埃哈德和戴高樂下臺以來，拉丁美洲地區的經濟持續衰退；種族災難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近又出現了東南亞金融危機。同樣，自一九八四年英迪拉·甘地總理遭暗殺以來，南亞次大陸除部分城市人口的經濟收入有所增加外，整個經濟形勢也每況愈下。盡管蘇聯的科學工業潛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由于沒有把足够的科學技術有效地用于非軍事生產上，它的經濟也并不景氣。

從政治上看，盡管美洲、非洲、西歐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衰退現象越來越嚴重，但一些局部

地區的經濟政策還是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中國最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功和近幾個月中俄羅斯放弃實行自由化經濟政策，使全球經濟政策發生了一個關鍵的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起點。如果美國和西歐的一些經濟勢力把關注的焦點放在開發歐亞地區的經濟潛力上，那這種變革就能在全球範圍內取得成功。

顯然，世界上與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相關的地區無論就面積或人口而言都不算小。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即便是實物經濟增長的年率和人平實物經濟增長的年率不高，也可以轉化為巨大的技術進口市場，從主要的機床技術出口國進口。俄羅斯和烏克蘭均是具備這種技術潛力的大國，它們既可以滿足振新國內經濟的需求，也能滿足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巨大需求。如果我們重新給全球經濟發展方向定位，集中精力發展基礎經濟設施，加速提高人均實物經濟投資，那就一定會享有經濟戰略為我們帶來的突出成果。

屆時，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交通運輸量很快就將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大西洋上的交通運輸量。美洲也將重新調整那條一八六五年以來的太平洋航綫，而在麥金利總統被暗殺以前，這條航綫一直都被看作是美國的經濟命脈。

特別是隨着海洋技術的徹底改進，水路仍然是最便宜的貨物運輸通道。穿過巴拿馬地峽或哥倫比亞的運河體系將成為巴拿馬和巴西這些國家的主要貿易通道，同樣也成為美國西部各州和加拿大西部進行太平洋貿易的主要通道。亞洲人均經濟能力的提高將使這個經濟發展的市場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同時，俄羅斯利用其巨大的科學潛力，把她的北極地區轉化成為生產和交通運輸的發展區域，這也將成為本世紀經濟增長的一個新領域。

從運行成本上講，陸上運輸和海上運輸是不一樣的。海上運輸每噸英里的運費相對較低，但是被動運輸。就歐亞大陸而言，到印度洋和太平

圖 6

歐亞大陸：歐亞大陸橋的主要綫路和次要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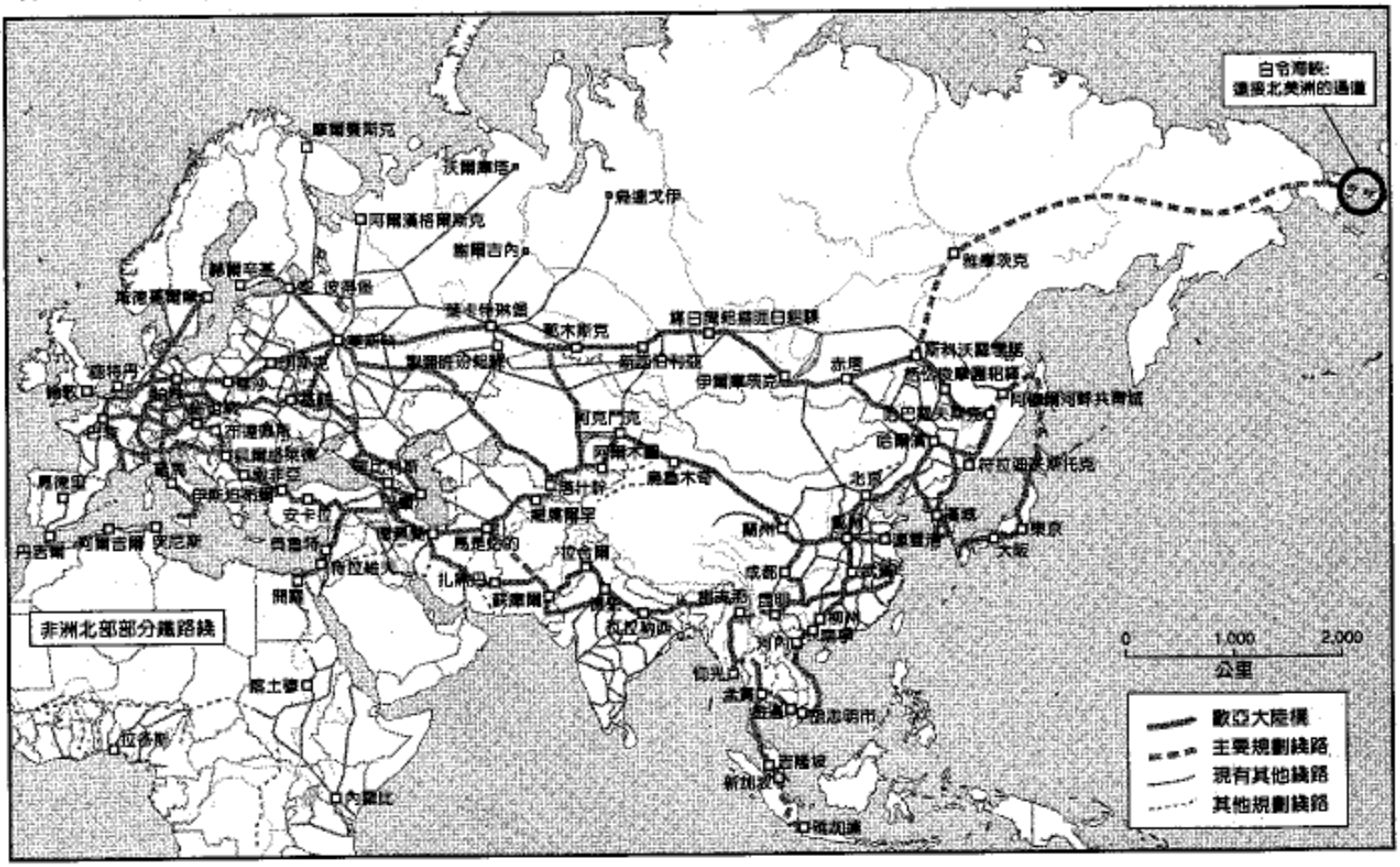


圖7

=中亞、東亞水路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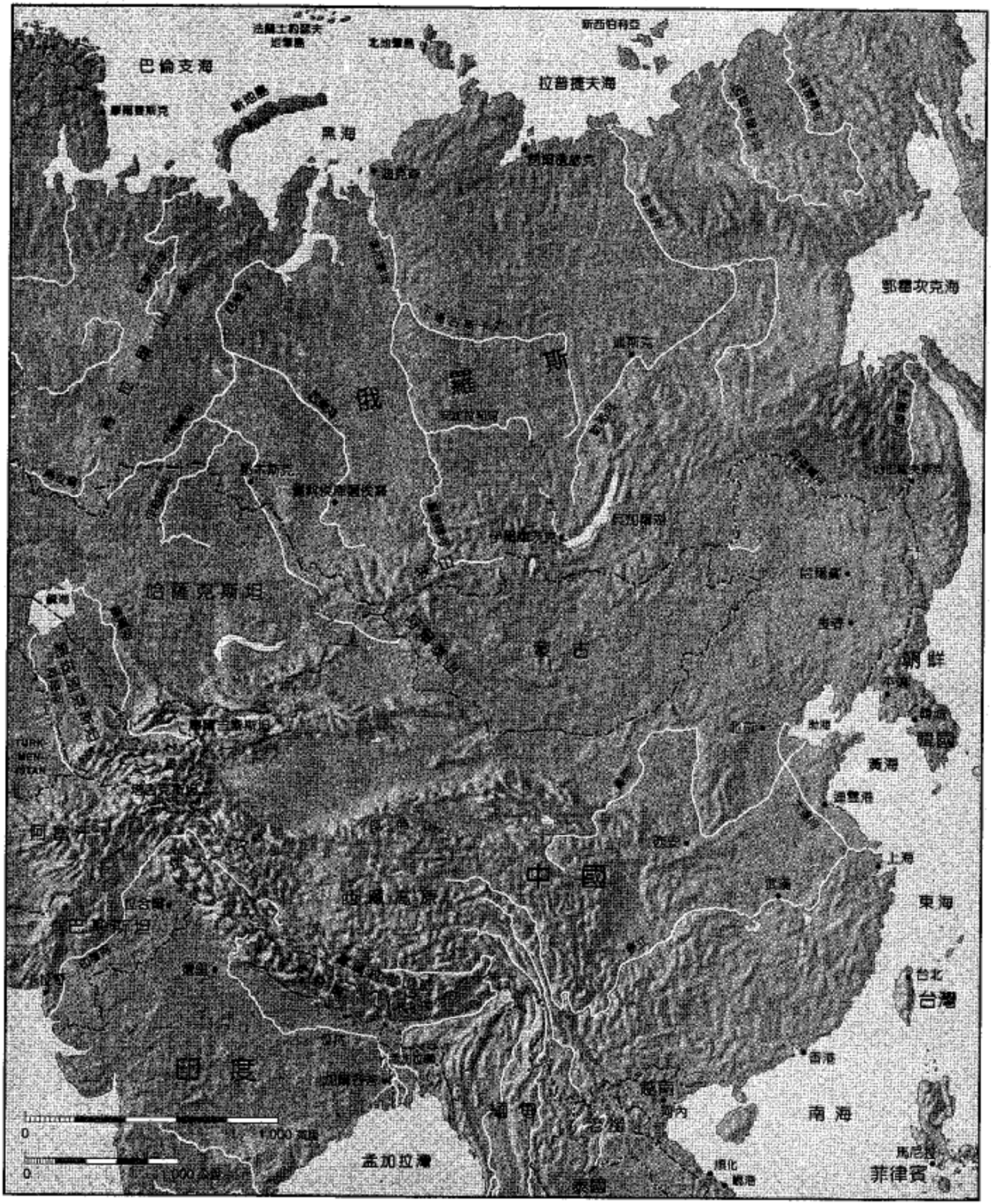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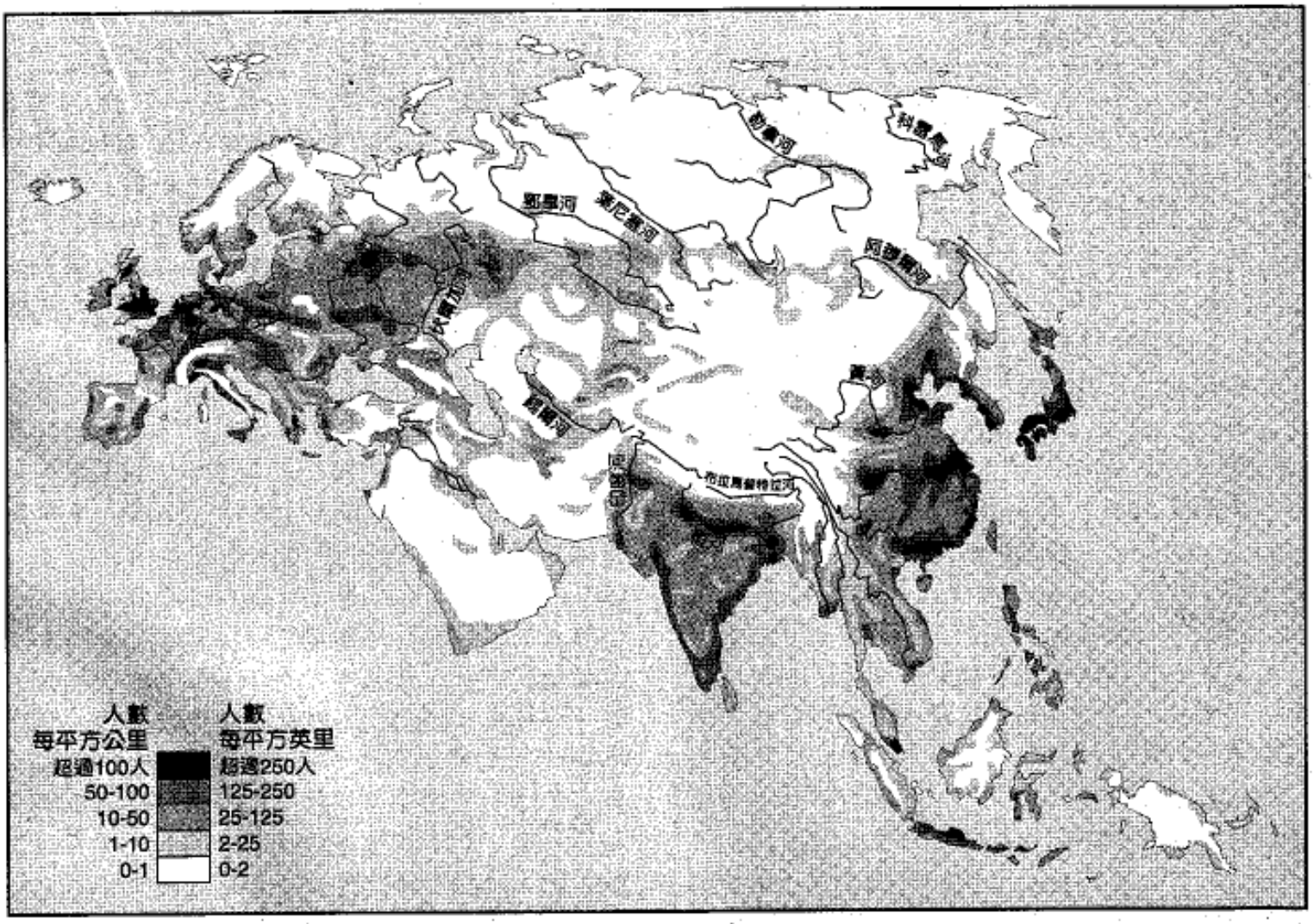

巴倫支海
黑海
拉普捷夫海
新西伯利亞
鄂霍次克海
俄羅斯
哈薩克斯坦
蒙古
朝鮮
韓國
黃海
東海
中國
青藏高原
台灣
印度
越南
南海
孟加拉灣
菲律賓
泰國
TURK-MEN-ISTAN
0
1,000 英哩
0
1,000 公里

圖 8

1990年歐亞大陸人口密度及亞洲北部主要河流



洋更為可選的貿易綫路主要在陸上，而非海上。一條精心設想的陸上運輸綫每噸英里的運費比海洋運輸更高，但是不要讓這一事實把自己給蒙騙了。因為美國早期開發西部的農業和礦山時，依靠的就是陸上的鐵路運輸綫。一條設計合理的鐵路運輸綫，可以通過每噸英里運輸的附帶收入，抵消出海運的運輸成本。

因此，從中國的太平洋港口城市連雲港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之間就形成了一條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的歐亞大陸橋（見圖 6），成為大西洋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陸上通道。我們可以仔細看看圖 6 中穿過歐亞大陸的多條“新絲綢之路”，還可對各歐亞大陸橋綫路上特別感興趣的技術細節進行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

首先，歐亞大陸橋是什么樣的鐵路系統呢？

建立一條摩擦系數低的鋼軌系統也許是首先遴考慮的問題，但我們必須做得更好。因為距離太長，所以速度不能不說是減少商品積壓和避免因貨物運輸緩慢而花費額外運費的一個重要因素。德國的磁懸浮列車就為經濟發展帶來過極大的榮耀。（73）通常，說到磁懸浮列車，人們更容易想到客運列車。盡管磁懸浮列車本身是空中客運的補充，但它所具有的經濟優勢已開始體現在貨物運輸方面。（74）興建縱橫交錯輻射的磁懸浮鐵路體系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效果。

其次還有水路運輸。看看中亞的水路系統（見圖 7）。在亞洲中部，印度次大陸以北，包括中國的西藏地區，一直到阿爾泰山脈，其中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對中亞水路系統的形成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再看看這些水路的流域及其流向，特別是通向北極地區的鄂北河、葉尼塞河和勒拿河。所有水路都被干旱地區、甚至沙漠地區分隔、包圍。然后再來看看歐亞大陸橋沿綫的人口密度及其分布狀況（見圖 8）。顯然，

對水路運輸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分配是至關重要的。

解決中亞地區所需的水資源一般有三大途徑：水資源保護、水資源重新分配和大量采用核裂變工藝進行海水淡化。當今的先進方法是采用德國制造的一百至二百兆瓦的高溫反應堆，或者采用中國或其它地方制造的更大功率的同類反應堆。在歐洲，水資源重新分配的傳統做法是興建多用途的水庫、河道和運河。水不僅僅可以傳輸，而且也可以承擔大規模的貨運任務，如運輸谷物。請看看從太平洋到鹿特丹的中綫絲綢之路的一些特點。

請集中注意一下缺水的黃河入海口附近地區。黃河從渤海入海，是中國主要的工業區之一。這一地區從南到東與古代的大運河相鄰。大運河橫穿黃河。從這一地區向西，從連雲港開始，可以形成連雲港－西安－鹿特丹的運輸綫。

這是一個城市工業和核能生產集中的自然區域，它可以利用余熱來淡化海水和提供淡水資源滿足衛生需求。如果我們采納并接受中國政府表明的戰略方針，使中國人口向內陸和西部地區遷移，那對水資源的開發也必須西移，以適應人口分布的變化。這樣看來，使用核能進行海水淡化這樣的方法可以減少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水資源的需求，對于全方位開發中亞地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因此，歐亞大陸橋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由三個主要因素組成的網絡，即水、能和運輸。歐亞大陸橋的興建可使沿綫一百英里寬的地帶得到開發，同時出現以沿綫各城市居住和生產中心為節點的內部網絡結構，還可以承擔能源、貨物及人口的交通運輸。其產品包括食品和高能通密度的合成制品以及高價值產品。正是歐亞大陸橋的這一高產出活動，可以償付開發、維護和運行歐亞大陸橋的所需費用。

當務之急是把對歐亞大陸橋的開發與十九世紀早期一位美籍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開拓性工作做一番比較。這位經濟學家是發展美國和歐洲鐵路運輸的先驅，他首先提出用鐵路把歐洲西部與太平洋連接起來的歐亞大陸橋系統的戰略思想。原有的穿越西伯利亞的鐵路綫就是李斯特這一戰略思想的產物。只要讀一讀歷史，我們就知道，曾為賓夕法尼亞州公民的李斯特曾在林肯總統的倡議下興建了賓夕法尼亞州的鐵路，使其繼續向西延伸，直至穿越美國大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穿越美國大陸的鐵路運輸綫，把整個美國與太平洋和亞洲連接起來，是李斯特等人早期的成果。而對鐵路運輸沿綫進行的農業開發和城市建設才是李斯特等人發展鐵路的初衷。這一初衷為我們今天開發利用歐亞大陸橋沿綫的經濟潛力提供了一個幾近完美的模式。

我的建議最初是分四個階段提出來的。第一步是我在戰略防御倡議中提出了基于新的自然原則的戰略彈道導彈防御技術必須用于發展各參與國和全球民用經濟的觀點，受益者不僅是各參與國的國民經濟，而且是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75）第二步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精心制定了一個太平洋和印度洋盆地的發展計劃。（76）第三步是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哥倫布紀念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上提出的有關柏林的建議，當月晚些時候電臺還就此作了一個半小時的特別節目。（77）第四步是針對德國的統一而建議組成一個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的“生產性三角”，其“旋臂”從中心向外延伸。（78）一年多以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妻子和同事，并由他們于1990－1991年期間進行宣傳。一九九二年，這個“生產性三角”計劃被改為歐亞大陸橋計劃。（79）

自此，我針對發展美國戰略方針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着歐亞大陸橋的政策制定而進行的。

5.5 發展美國與歐亞大陸的伙伴關系

這個世界上總有那么一些人，即便我們把他們說成是“精神錯亂”也算是仁慈的了。他們堅持美國在戰略上與中國保持敵對關系的態度。普理馬科夫政府并未給戈爾的朋友們帶來他們想得到的好處，因而俄羅斯同樣受到責難和攻擊。就美國的利益或中國當權政府的性質以及普理馬科夫的政府而言，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充分的理由

讓美國相信會受到可能來自中國或俄羅斯的戰略威脅。

毋庸諱言，長期以來我們與過去的戰爭盟友蘇聯的確有過戰略冲突，盡管冲突實際上是由一些异已分子（最著名的要算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了）一手挑起的。但是，敵對關系一旦存在、形成，我們就不得不采取相應的行動，直到這種敵對關系從根本上消除。如果有人打算殺死你，你必須面對這一事實，強迫自己作出相應的反應。戰略就是廣義上的歷史，在這一點兩者十分相似。多少次國家之間被迫進行戰爭，而一些明智的領袖人物、特別是那些知道怎樣象基督教傳教士那樣去進行思考的領袖人物，原本就知道戰爭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

洛德·帕默斯頓曾對英國議會說，女王陛下的政府没有永遠的盟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富蘭克林、華盛頓、約翰·昂西·亞當斯以及亞伯拉罕·林肯時期的美國于此正好相反。在全世界的國家中，我們没有永遠的敵人。我的方針，與我們國家過去所有愛國英雄的方針一樣，就是要盡量讓世界擺脱那些使各個國家、民族相互為敵的邪惡勢力。美國國會里的那些雖談不上卓越、卻有目共睹的瘋子和傻瓜們似乎并没有認識到，把一個準備成為你伙伴的大國變成你的敵人簡直是極其愚蠢的行為。如果你不希望有任何外部力量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那就不要到根本没有敵人的地方去制造敵人。

我要直接了當地披露一些關鍵的事實。幾個月以前，我了解到，在歐洲和美國的一些集團似乎正在打算通過推翻葉利欽總統，在莫斯科實行軍事獨裁統治的方式來“修理”一下這個世界。這一行動的密謀者相信，他們能够操縱俄羅斯一些與華爾街和倫敦的經濟利益有密切聯系，與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和“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利益相一致的富人集團；打倒普馬科夫政府；把葉利欽總統搞下臺等等。這些勢力至今依然存在，只是相對從前已被大大地削弱了。也許他們在政治上會以失敗告終。

于是，美國的一小撮人前不久還與莫斯科過從甚密，而今卻隨着俄羅斯總理人選之一的切爾諾梅爾金被葉利欽總統撤職經歷了巨大的心理變化。這些人中不僅有共和黨的著名人物，也包括民主黨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果這些家伙現在希望馬上就去地獄走一遭的話，那對于吃政治這碗飯、經歷過大起大落和連鎖反應的他們來説，無疑是選對了方向。

我們必須為接下來的幾個禮拜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因為根據一些綫索，還會有更多有待揭開的秘密。形勢將變得極為有趣，就象有一個家伙所説的那樣：“你給我聽着！”

自我們的共和國誕生之日起，她主要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種世界秩序，當年的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稱之為“原則社團”。亞當斯的這一觀念與庫薩的尼古拉斯主教在對話録（De pace fidei）中的論點以及十八世紀來布尼兹和J.S.巴赫的追隨者、正教徒摩西·門德爾松的觀念不謀而合。摩西.門德爾松在萊辛的《智者納旦》里被描寫為一個全基督教式的人物，他在十九世紀為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根據亞當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觀點，我們的共和國確保其終極戰略利益的方法應該與庫薩、萊布尼兹和門德爾松的方法一樣。

説到中國，全基督教的原則體現在我們的朋友孫中山博士的遺訓中。我想説明的是，現今中國的領導層對美國的一些派别、人物以及利益幾乎不抱任何幻想。然而，中國卻希望與美國保持長期、平等的伙伴關系。他們的觀點絕非中、小學生們的時髦觀念，而是經過認真考慮、計劃之后對長期互惠合作的一種認識。没有這樣的伙伴關系，雙方都不可能進行互惠合作。

迄今為止，克林頓總統把這個問題處理得很好，同時也考慮到了會遇到的一些阻礙，如他與艾爾·戈爾副總統的政治關系就是一個不利因素。這也是美國在處理與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中國以及世界上多個地區的許多國家的關系時一個主要的不利因素。克林頓總統全力發展與中國、俄羅斯和德國等國的伙伴關系，在維護美國的外交利益方面，比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還要大。象美國近80%的公民一樣，許多國家實際上都很喜歡比爾·克林頓總統，盡管他也有一些我們所認為的缺點。但是，總統在民主黨黨內或黨外的那些對手們就不敢説了。

同樣的一句話，換一個角度就可以用來形容俄羅斯。

美國方面的問題通常是：我們有太多南部邦聯的繼承人，象艾爾·戈爾，身居高位卻無所建樹。我在這里專門指的是那種你認為是在思考但卻是道德低下的人。這就是戈爾，他在國際電視觀衆面前用語言羞辱前美國總統候選人羅斯·佩羅特所使用的伎倆。在梅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策應下，戈爾在吉隆坡官宴上的所作所為正是當年阿道夫·希特勒試圖模仿他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所做的。在中國，在日本的京都，無論在哪里，只要他感到自己不能一意孤行，象一九九六年春、夏期間強行讓民主黨以及白宮接受他的老朋友紐特·金格里奇的“一九九六年福利改革計劃”，他的嘴臉全都是一個樣的。

這就是艾爾·戈爾。他一再暗示葉利欽，他的朋友切爾諾梅爾金是總理的最佳人選。可葉利欽還是把切爾諾梅爾金的總理提名解除了。于是，艾爾·戈爾暴跳如雷。這就艾爾·戈爾，他假惺惺地擺出一副“紳士”姿態，說：“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不講道理，但是，我懇求你讓我按照我的方式行事。如果你不願意，我也不打算放弃……”同時，在伊拉克，導彈仍在呼嘯，炸彈仍在翻飛，戈爾就像站在房前走道上模仿黑手黨傀那樣說道：“殺戮正在進行。”戈爾，在無助的伊拉克你可以不受到懲罰，但是，同樣的方法你能用來“對付”中國、俄羅斯或馬來西亞等國政府嗎？

我們美國在外交戰略的規劃方面不需要戈爾的幫忙，也不需要來自共和黨方面的幫助。

憑直覺，比爾·克林頓總統尋求與德國、俄羅斯和中國的伙伴關系是正確的，換了約翰·昆西·亞當斯或亞伯拉罕·林肯也會這么做。而如果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至少他會很看重與俄羅斯和中國的伙伴關系。

出于我在這篇競選宣言中概述的經濟原則的考慮，如果没有代表世界主要科學技術生產能力的國家的參與，面臨全面崩潰的世界金融體系的復蘇的前景是不允樂觀的。這些國家至少還有一些經濟能力幸存下來，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如果没有大量的輸血，没有大量地進口技術生產能力，它們將從地球上消失。

世界上有四個國家或地區代表着這種科學技術生產力，它們是：美國、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在歐洲和美洲，其他一些傳統工業國家也具有這方面的生產能力。與這種生產能力相適應的最大市場就是“幸存者俱樂部”集團里的各個國家。其中，俄羅斯既代表科學技術生產力的一方，又代表產品市場的一方。

大多數國家經濟復蘇必須根據科學原則和技術措施來進行，這將反映出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之間建立伙伴關系、參與重建世界貿易制度的一個相變現象。從霍布斯式的戰略關系向互惠互利的經濟模式的轉變，將帶來各個參與國家自身國家利益觀念的根本轉折。

殺戮是否必須無休止地進行下去？“下一個該殺的是誰”這個問題是否必須是我們想得到的軍事戰略計劃的最終結果？難道我們的災難還不够多嗎？是不是通常要付出巨大犧牲的正義戰爭只會使新的戰爭或其他類似形式的冲突没完没了地一直持續下去？我們能不能使正義的戰爭給自己帶來持久的全基督教式的和平，讓世界上各主權民族－國家基于“原則社團”的觀念和睦相處、共謀發展？

眼下，展望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伙伴關系的前景，我們有信心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使之變得更加美好。在這一點上，德國的立場可以用來代表歐洲。讓美洲國家也加入到我們的行例中來；讓我們的伙伴日本在亞洲發揮她的特殊作用；讓我們把公正還給非洲。我們的共同目標不是建立一個烏托邦，而是齊心協力，努力工作，創造共同的未來。把“全球化”和“世界政府”這些垃圾統統丢到一邊去吧，因為它們只不過是些大騙局。讓我們在各主權－民族國家之間建立起一個共同的生活空間，互助互利，使即將過去的二十世紀發生的那些悲劇不再重演。讓我們在自然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世界人民共同生活的“原則社團”吧，因為這是我們人類區別于其它動物也高于其它動物的根本點。

現在，你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響應，開始思考。為此，我就是你們的人。

注釋

1. 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德國政府正式公布了1389頁秘密文件。這些文件雖沒有明確指出赫爾豪森的政策，但記錄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法國總統密特朗當時的這些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浩劫。欲知這些秘密文件的背景，請參閱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四日（EIR）中黑爾加·澤普－拉魯旭的文章：“德國喪失了一九八九年的歷史性機會”。

2. 除了媒體和政府機構之外，對我進行抵毀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由美國司法部操縱的肮臟行動，由存在已久的“反抵毀同盟”實施。當然，反抵毀同盟主要是依據它那騙人的“反親猶太主義”的論調。他們早已知道，我與猶太教的特殊關系可見證于我對德國偉大的摩西·門德爾松的支持。反抵毀同盟從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開始在美國猶太人中間誹謗和抵毀這同一個門德爾松。在抵毀我時也像抵毀他人一樣，其慣用伎倆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這些聯邦調查局行動中，反抵毀同盟通過工會官僚機構和全國秘密情報組織進行了非常黑暗和肮臟的活動。這一情報組織由前美國共產黨的頭子、現已去世的杰·拉夫斯通（Jay Lovestone）組建，是埃德加·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對外情報機構中華爾街英（國）美（國）加（拿大）幫進行滲透的工具。拉夫斯通的門徒、現也去世的里奧·切爾恩（Leo Cherne）是一九八三年一月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政府應基辛格請求、通過總統對外情報顧問委員會對我采取秘密行動的重要組成人員。這是在那一時候對我采取秘密情報行動的遮掩（總統行政命令12333號），由副總統喬治·布什在1983-1989年間從事“伊朗－尼游”和“反恐怖主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這些針對我的行動都是相似的，當時整我的機構和人基本上也是一九九二年喬治·布什競選總統失敗之后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機構和人。

3. 正如我將在下文中談到的，核心選民中也有犯罪的或在其它方面不合法的選民，如高利貸者、犯毒者等等。決不能犧牲合法選民真誠和公正的利益來滿足非法選民的利益。

4. 這里所談的封建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區別就是一種精確的科學區分，它代表着社會發展的階段，一種明顯的分段，相當于哺乳動物中封建與現代的區分。

5. 比如，戈爾競選籌款與蕭（D.E. Shaw）和戈爾的俄國同夥切爾諾梅爾金之間的關系，與華爾街的關系，以及戈爾的盟友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與國會中“新邦聯”分子之間的關系。

6. 林登·拉魯旭“為什么謝爾頓將軍現在必須退休”，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的（EIR）。

7. 了解在當今美國流行的“新邦聯主義”的特徵，是明白希特勒納粹反猶太主義根源的關鍵。凡是熟悉中歐富裕與貧窮猶太人法律地位的人，尤其是熟悉普魯士弗里德里克二世部份改革和奧匈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時代的人，都非常清楚這一點。目前在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其它部門的“新邦聯主義”潮流，就相當于今天的納粹。

8. 向美洲國家殖民的想法，最初是由意大利的紅衣主教庫沙的尼古拉斯的門徒提出，是一種驅趕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敵人的戰略。庫沙及其門徒所繪制的地圖與做出的計劃直接促使了葡萄牙人經好望角到印度的航海，也直接導致了哥倫布加勒比海航行計劃的實施。隨着西班牙在伊沙貝拉女王逝世后不久之后開始的衰落，西班牙人開始向今天的西語美洲移民，部份原因也是為了逃脫西班牙國內的迫害和政治環境。接下來的移民浪潮主要是來自英國和法國，時間是十七世紀初期到末葉之間，地點是馬薩諸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9. 見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遙觀災難性的十四世紀”；威廉·維爾茲（William Wertz, Jr.），“近觀：十四世紀這一新黑暗世紀的教訓”。

10. 正如上文所述，現代民族－國家形態最初出現在路易十一的法國和亨利七世的英國。還需注意的是，從1500年到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歐洲發生的所有戰爭幾乎都是由封建勢力發起的，如威尼斯的金融寡頭。他們要么是尋求存在于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前的非民族－國家形態的全球化社會，如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梅特涅的神聖同盟。要么是直接反對在歐洲建立美國式的憲法民族－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英國愛德華七世一手謀劃，目的是破壞美國、法國、俄國、日本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之間的和平合作，因為這一合作被英國認為是一種“地緣政治威脅”。二次世界大戰則是倫敦及其華爾街幫凶聯合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九日把希特勒扶持上臺的直接結果。并不是主權民族－國家引起這些破壞性的戰爭，引起戰爭的正是反對主權民族－國家的勢力。

11. 在亞力山大大帝摧毀了腐朽的波斯帝國之后，柏拉圖古典希臘學說開始成為包括巴勒斯坦的東地中

海區域的主體文化。希伯來語只是一種書面語言，而不是口頭語言。猶太人實際使用的宗教語言是希臘語。根據專家們的研究，這種希臘語實際上是一種口頭語，不是書面語言。柏拉圖的希臘語匯通過持希臘語的各種信徒而滲透了各主要的語言。

12. 引人注目的是，“新邦聯主義”思想和戈爾副總統經常公開地站在摩西、柏拉圖和基督教的對立面。例如，戈爾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四日對聯合國組織發表的講話中，直接攻擊“人類豁免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人類可以比動物更能承受生態破壞。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戈爾當時在建立可持續發展總統理事會的行徑，代表着戈爾和白宮宣傳機器到目前為止一直奉行的政策。這一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戈爾無力勝任白宮職務。

13. 從某種稍有差异的角度看，我的觀點與二十世紀最杰出的法學家弗里德里奇·馮·德·海德特教授的結論基本一樣。

14. 林登·拉魯旭“法國最偉大的軍事英雄如何成為普魯士的中將”，發表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的（EIR）上。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的（EIR）上還有伊麗莎白·海倫布羅伊奇（Elisabeth Hellenbroich）的文章“拉扎爾·卡諾：危機時期的卓越領袖”；安德魯斯·蘭克（Andreas Ranke）的文章“卡諾如何成為普魯士軍隊的中將”；迪諾·德·庖利（Dino de Paoli）的文章“卡諾的技術理論：實物經濟學基礎”；拉奎斯·克明內德（Jacques Cheminade）的文章“永不失色的世界公民”。

15. 在這里我只是簡要提一下現代科學方法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實。開普勒和來布尼茲相繼發展起來的代數學，其基礎是物理過程中的絕對非綫性原理，這一原理的代表是無窮小理論。無窮小理論本身就是當今實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原則。非綫性原理的出現，使高斯和黎曼得以發展出新的理論，其別名就是“非綫性幾何”或“多連通簇”。這些現代科學方法論均可追根尋源到庫沙對圓周運動的深刻理解。

16. 當有人這樣批評我時，我總是倍感興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我的批評常常是要我大大簡化我的政策聲明。人們需要認識到，當今美國最時髦的說法就是“越簡越好”。產生這種愚蠢觀點的根源常常是一種誤解，即認為簡單化就是民主化。這種與科學精確背道而馳的時髦偏見，使衆多公民失去了他們的財富與權力。人們可以說，要騙一個美國人，最便捷迅速的方法就是讓該人的生活簡單化，不要告訴他合同細節條文的真實含義。

17. 欲知這種先天驅動力（如兒童與其心愛寵物玩耍時顯現出的那種天然驅動力）與后天驅動力之間的區別，請參見我的文章“道德的實質”，發表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EIR）上。

18. 生活在十五世紀的現代科學創始人庫沙的尼古拉斯也同意我的觀點：兒童與寵物的關系非常重要。庫沙認為，這樣的關系是低等動物參與高等動物的活動。事實上，寵物的玩耍動力與高等動物（如人類）的認知能力恰好重叠。通過兒童的玩耍動力而使寵物得以參與兒童的認知潛力發育，而這種認知潛力則是任何低等動物所不具備的。

19. 與這些問題所相連的原則就是高斯－黎曼的多連通簇原理。這里所描述的多連通簇思想，來源于柏拉圖對話中著名的認知悖論。

20. 有一些音樂家雖然他們真正偉大，但卻不能像通俗藝術家那樣成功。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崇拜者或朋友們看來，不成功的原因是未能在作品的開場音程中建立起能與全部有音樂素養的聽衆相共鳴的優美樂章。正是這種一般聽衆所不具備的素質，使著名的富特文格勒成為本世紀最有音樂成就的樂團指揮。除非以適當的方式處理作品的開場音程與其后的關鍵性轉折，否則，聽衆大腦就會偏離作品主題思想的統一性，其結果要么是奏出“詮釋性”的音樂，要么釋破壞整個作品的完整性。我曾經對富特文格勒指揮的舒伯特第九交響曲與布魯諾·沃爾特（Bruno Walter）指揮的同一作品作了一番比較。這是我在戰后的親身經歷，揭發現后者跛腳的指揮使作品（尤其是第二樂章處）的完整性喪失至盡。我還記得當時對沃爾特進行的一次電臺采訪。在采訪中，沃爾特像尼采那樣胡說八道，認為勃拉姆斯作品與貝多芬作品之間的區別在于：勃拉姆斯是“太陽神”，而貝多芬則是“酒神狄俄尼索斯”。沃爾特把勃拉姆斯與令人憎惡的布拉克納（Bruckner）混為一談，把貝多芬與卡爾·車爾尼（Carl Czerny）的門徒李斯特牽扯一起，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情。沃爾特是在詮釋音樂，而不是演奏音樂。從富特文格勒指揮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舒伯特第九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等三大作品的演奏中，可以看出其獨到之處。只有這樣的指揮才能為有音樂素養的聽衆所接受。

21. 勃拉姆斯在他自己的第四交響曲中引用貝多芬作品 106 號奏鳴曲第三樂章中的灰諧曲，就是這種古典主題通奏樂曲規律所主導的作曲規律的光輝典範。如果看看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的創作與貝多芬第七交響曲所表達的新思想之間的關系，這種作曲規律的作用就更加明顯。見林登·拉魯旭等人所著的“古典主

題通奏樂曲的範例”一文，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的（EIR）。對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的討論，請見該刊98-103頁，對利第安音程的討論，請見該刊52-76頁。

22. 這一論斷并不適用于某些披着宗教音樂外衣的現代派或后現代派浪漫主義音樂（如柏遼茲的作品）。在這類音樂中，作品和演奏所表現的情感是一種情欲效果（如李斯特的作品），或者是無耻地表現與現代派和后現代派一脈相承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存在主義。

23. 古典音樂可以上朔到古希臘時期，當時的詩歌就要求有聲韵結構。正是這樣的聯系，使得研究學者把古典音樂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六千至八千年。古典詩歌中的多音音樂特質，借助于古典音樂的媒介，成為認知過程中啟迪“音樂思想”的基本物質。

24. 欲知古典悲劇對政治學發展的關鍵作用，請參見我的文章“道德的實質”，發表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EIR）上。

25. 因此，我們不能把（古典）悲劇的嚴格意義與通常所說的“個人悲劇”混為一談。對某些人而言，這兩個名詞都是一樣的，但同樣也有些人不能區分白天與黑夜。悲劇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它要么是通過占主導地位的輿論，要么是通過具有影響力的人們行為模式中的生理缺陷而實現的。

26. 黑爾加－澤普·拉魯旭“席勒與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的（EIR）。

27. 林登·拉魯旭“道德的實質”。

28. 應該指出，林肯在聯邦政府中發揮主導作用，最初是始于所謂的“現場解決”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林肯強烈反對波爾克總統在倫敦操縱下發動的對墨西哥的戰爭，正是這場戰爭成了推動后來的南北戰爭的火車頭。在與無賴波爾克進行斗爭中，林肯是當時的國會議員約翰·奎西·亞當斯、輝格黨領袖亨利·克雷、亨利·凱雷的兒子馬修·凱雷等人的盟友。馬修·凱雷后來成為林肯總統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人。

29. 見安東·查特金（Anton Chaitkin）“背叛美國”一書的第二版。在擴大的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塊遮羞布下，由愛丁堡公爵、查爾斯王子、戴安娜王妃和戈爾副總統組成的盎格魯騙子都公開支持這一效仿英王英聯邦的政策。

30. 亨利·基辛格吹噓他在尼克松和福特總統任內發揮了英國外交部特務的作用。請見他1982年五月十日發表的演說。在這篇演說中，他認為他自己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均認為英國王室的固有觀念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等人開創的美國思維格格不入。見亨利·基辛格“夥伴關系的反思：英美戰后外交政策”（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

31. 但它的母親卻是共和黨。

32. 以“垃圾債卷”為武器的企業吞并風潮根本就不應該得到鼓勵，或者說根本就不應該存在。對華爾街金融機構操縱的、而非出自經濟原因的兼并與收購應該加以更多的限制。對公司所有權轉讓進行改革有一個十分清楚的原則。上市公司持股人在企業中的資產必須得到法律保護，但這僅僅是眾多原因中的一個，而且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一個生產性企業如果植根于一個或多個社區，其雇員、管理層以及整個地區的勞動力的重要權益都必須加以考慮。另外，國家和聯邦內各州的利益也必須考慮，州與國家的經濟資產必須保護。如果一家公司由于純粹的實物經濟生產原因而合并、被購和搬遷，我們應該允許這一企業以一種合理有序的方式執行這一公司的決策，盡可能防止將對周圍地區產生的不愉快但卻可以避免的副作用。所有權的實施者應該是那些對企業的繼續繁榮有最直接利益的人。我們不應該鼓勵一九八二年以來四處泛濫的瘋狂并購，不應該允許華爾街及其金融投機分子隨意將完好的贏利企業賣來賣去，把這些企業的人員像白菜一樣運來運去，從加州運到芝加哥，只是貨票可以轉讓多次。凡是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都不能容忍這種在所謂“全球化”趨勢下發展起來的并購風潮。

33. “賣冰的人來了”中有一段話很有意思，尤為適合我在這里所談的現實生活的實質。在劇中人物希基揭開面具顯現出其真實面目之后，酒吧中的一個醉鬼盯着在前一場中尚未動過的威士忌酒杯。酒鬼對問他為何不喝的人回答說：“希基，你一生都在酒中度過。”在那些由于共同基金突然下跌而被套牢的人身上，也有某種這樣的情況。對他們來說，一生都在華爾街酒中度過。

34. 我個人的標準一直到最近都是每周工作七十至八十小時，一周六天，每天十二至十四個小時，另外，星期天再工作四至五小時。我覺得我將很快回到這種工作節奏或與之相差不大的節奏上來，也許每天減少一兩個小時一做治療、特殊鍛煉和短暫休息。我的工作性質也和任何嚴肅科學家的工作性質一樣：以使命為中心。這就需要長時間集中精力不受干擾地工作。這種知識性的工作也同樣帶來各種享樂，其他人也應該從工作中尋求樂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因為我的妻子也和我作同樣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合作。大多數其他人以及他們的孩子

則需要有定期的休閑，從而始他們獲得我通過工作就能獲得的知識和樂趣。我的同事們的工作方式與我相同或者相似。因此，對我們這些遵循我們的道德目標、采用這種方式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工作時間與其他人是不同的。對其他人而言，一周工作四十小時的模式符合當今美國的生活習慣和社會經濟狀況，是一種正常的衡量標尺，應該被視作為在現代技術和人口素質條件下人們從事教育與休閑的一種權利。

35. 雖然許多企業家投身商場都是為了擺脫絕對或相對貧困（如少數族裔的企業家），但要遵循一個總的原則，即企業家或公司主管如果受貪婪的驅使，唯利是圖，則絕對是一個傻瓜，也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使自己成天生活在緊張與壓力之下。企業家的目標應該是像一個專業人員那樣生活，其成功的標志是對科學與藝術的推動：他們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樂意這樣做，他們有興趣這樣做！專業人員和企業家生涯的樂趣就在于對問題的解決，在于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平衡公司預算僅僅是諸多不可回避的挑戰之一，就像科學家和工程師一樣，使“業務運轉”只是該行業的要求之一。如果他們感到沒有樂趣，那只是說明他們入錯了行。這也應是農場企業家的正確動機。正是這種企業家精神和專業技術生活，使勞動力中的多數人得以從休閑活動中改善其認知能力。

36. 大約在一年多以前，我們時代的一位享有國際盛名的古典歌唱藝術家去世了，享年九十二歲。她是我的一個朋友。在她去世前不久，我妻子和我以及另外兩個人與她一起交談了兩小時。在交談中，我的妻子背誦了女主人選定的德國古典詩歌，我們的女主人也從她多年以前錄制的作品集中選聽了與這些詩歌相應的作品。在這次兩小時交談快結束時，我們的女主人這樣描述她的一生：“我一生都在演唱這些詩歌。”

37. 老資格的空間科學家、致力于向月球進行工業殖民的太空項目設計人克拉夫特·埃利克（Krafft Ehricke）在一九八四年末去世。為了紀念他，我的妻子黑爾加·澤普－拉魯旭于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弗吉尼亞的雷斯敦組織了一場國際科學會議。在準備我在會上的發言期間以及在此之后的一年里，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設計了一個空間計劃，其核心是重開“桑吉爾計劃”。克拉夫特認為，在月球上建立空間站可以有助于實施這一計劃的下一步：向火星殖民。桑吉爾計劃是準備在速度達馬赫6至馬赫8的飛機上裝上火箭推進器，讓飛機從地面的普通機場上起飛，把貨物和乘客經濟快速地運上地球軌道。這一火箭推進器和飛機都將返回地球。這種噴氣式飛機自身可以不停頓地環繞地球半圈。我曾與一些國家的科學家們一同研究過我為火星計劃提出的建議。我在1985-1986年期間對此問題的研究，為一九八八年的電影“火星上的女人”提供了背景材料。

38. 提出這些反對意見的年輕人在表面上并不是如此前后不一。如果向一位數學家問這樣一個問題：“地球有哪個地方會與這樣一種反對意見巧合”，他也許會生氣，然后回答：“那么人又如何從昨天到了他今天的位置？”

物理學家的回答是：“他不知道，因為他剛到那里。”

此時，幾何學家笑了。“他也許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愚蠢。他并不是前后矛盾。在物理幾何學看來，從邏輯上講，宇宙中確實存在着這樣一個地方，它完全符合所描述的特徵。”

“哪里？”

“不是哪里，而是無處。”幾何學家回答說。

問話人對這一回答想了一下，然后緩慢地點點頭。他對幾何學家說：“我想你是對的。依我對他的了解，這正是他目前的思維所在。”

39. 像希特勒這樣的暴君專制之所以在德國出現，是因為大多數人都自欺欺人地接受這一暴君。凱撒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

40. 我們也許還可以加上由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六十年代的革命。金是我們國家真正的英雄。他就像林肯總統一樣，高瞻遠矚，而并不僅僅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吉姆·克勞（Jim Crow）的反對者。反對克勞的人很多，這一點是對的。但是金牧師與他們不同，他的目標不僅僅是反對克勞，而是徹底埋葬克勞的學說以及這一學說所代表的勢力。金比我們都站得高看得遠，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認識到，我們國家必須盡快擺脫克勞的致命性蠢行，從而保證全國人民的生存與繁榮。只有為全體人民帶來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

41. 就此而言，“信息社會”是羅素的兩個臭名昭著的門徒“信息論”教授威納與“系統分析論”炮制者紐曼同流合污的產物。在黑洞方程影響下長期資本管理組織的崩潰給了怪誕難懂的“信息論”邏輯實證定義當頭一棒，也給了紐曼瘋狂的邏輯實證假說當頭一棒。紐曼的學說在一九三八年出籠，它假定經濟運行完全可以用同時綫性不等式來加以表述。諾貝爾獎委員會為默頓－斯科爾斯混亂解釋說，并不是這一方程出了問題，而是長期資本管理組織忽略了這一方程與現實生活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

42. 占星術士使用“寶瓶座時代”說明迪奧尼斯－撒旦戰勝了耶穌基督。這一教條的來源是尼采和英國

的通神學家阿雷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新世紀”這一名詞的使用是因為有了所謂“茲普夫定律”，其簡稱就是“寶瓶座時代”。布拉瓦斯基（Blavatsky）女士、尼采和克勞利通神學的作用下面還要談到。

43. “信息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的同流合污，最初是在一九六四年在當時正不斷發展的“新左翼”內部得到廣泛傳播。也就是在這一年，“披頭士”開始出現。這一觀念反映在當時出版的由羅伯特·西奧波爾德（Robert Theobald）等人所著的一本書 << 三相革命 >> 中。這部書的出版發行由福特基金會通過羅伯特·哈秦斯（Robert Hutchins）給予資助。當時，這部書在后來組建“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的學生中頗有影響。盡管它的出籠已經基本被人遺忘，但是它的主題思想卻成為“新左翼”在 1964 至 1972 年間發展的根源。戈爾等人在一九七二年發動的全球“生態運動”也是以“三相革命”的主題思想為指導方針，戈爾、紐特·金格里奇和色彩斑斕的托夫勒的密切合作也是以這一主題思想為指導方針。

44. 所謂“非正規戰爭”，或德國的弗里德里克·馮·德海得教授所謂的現代小型戰爭，與如國防部長科恩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等無能之輩所說的“特種部隊戰爭”毫無共同之處。正如已故的海德特教授和我公開闡明的那樣，“非正規戰爭”代表各種特殊的政治冲突，它包括游擊戰、政治打擊等等，可與戰爭的目的相提并論，但不是所謂特種戰爭。正如使徒保羅和聖·奧古斯丁所說，基督教自身也是一場永不停頓的非正規戰爭，其敵人是羅馬文化及政府中的邪惡。

45. 英國法理中的這種道德缺陷甚至進入了頗有影響力的基督教學說，使得基督教一直否認人在出生時便具有“理性神聖火花”這一觀念。這種否認的理論基礎是哈伯或洛克的學說，即人本質上是禽獸。這種觀點在英國王室的庇護下從喬治一世一直延續至今。

46. 臭名昭著的羅茲計劃以屠殺非洲黑人為目標，得到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無耻地吹捧，現在正通過國務院負責非洲事物的助理國務卿蘇珊·賴斯（Susan Rice）這一英國代言人而實施。在英國王室與美國國務院的賴斯以及美國駐非軍隊中的腐化分子合作進行的大屠殺之下，有六百多萬非洲人受害。

47. 敏感的人們可以看出佛羅里達奸詐的國會議員麥克寇拉姆（McCollum）的形像與 << 瘋狂 >> 雜志時髦人物“阿爾弗雷得·紐曼”（Alfred Newman）的形像如出一轍。在現代歐洲歷史學家看來，這位議員在提議彈劾克林頓總統的發言中表現出的邏輯混亂，就像描繪臭名昭著的納粹外交部長里賓特洛普的漫畫。同樣，離任的眾議員金格里奇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改革法案”得到采納，毀壞了克林頓政府的士氣，使其權力大落。這一法案的支持者表現出納粹式的觀點，認為窮人是“無用的飯桶”，應該通過某種“工作營”計劃而脫貧。

48. 即將發表的我的同事們所寫的文章記錄了門德爾松家族在繼承巴赫思想和作品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沒有門德爾松家族的這一作用，就不可能有一七八一年后莫扎特和貝多芬等人對音樂的發展。門德爾松與萊辛一道捍衛來布尼茲和巴赫，正是門德爾松創立了德國古典主義，其作品反映出巴赫的思想，認為德國的猶太人是德國人中的驕驕者。正是門德爾松對猶太人的創新見解，使德國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在統一德國文化、團結德國人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正是這一批德國人和波蘭猶太人成了希特勒決心屠殺的對象。正如希特勒答應的那樣，如他贏得歐洲戰爭，下一個目標就是消滅基督徒。

49. 就像并不神秘的三K黨徒（如來自田納西的希克曼·厄文的崇拜者）一樣，他們手持槍支對着非裔美國人“禮貌”地警告說：“你們如果不離開，你們知道等待你們的是什么。我的事兒一旦行不通，老子就把你們一個個全都殺死。”

50. 見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與“夥伴關系的反思”。

51. 要了解年輕時代的美利堅合眾國，途徑之一就是通過今天眾所周知的普林斯頓大學。亞倫·伯爾（Arron Burr）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地獄之火”俱樂部的成員之一，而該俱樂部則是于英國自由主義的渥爾波時期開始形成的英國“地獄之火”俱樂部的分支機構。相對而言，霍格思的《浪子回頭》是描述十八世紀英國地獄之火運動的潔本。到了十九世紀，阿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在杰弗遜總統和麥迪遜總統手下扮演了叛逆的角色，而他撿起來并加以推崇的也正是這種新時代的齷齪之物。在加勒廷的晚年，他成為后來所謂的美國人類學校大騙局的制造者。

52. 這一點也體現在戈爾副總統公開提出的讓聯合王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中。采取這一措施的目的顯然是象削弱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那樣來削弱美國，摧毀新西蘭，并阻止這些國家加入女王自己的英聯邦。

53. 在意大利，這一國際透明計劃的代表是英國王室“清白”的陰謀家。這是一項可耻的計劃，它是由無耻的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在她的私人游艇上為反對意大利而制定的，是“世界政府”計劃的最新翻版，其目的是讓整個世界聽命于三國集團的獨裁統治。這一三國集團將實施實際上的世界獨裁專制，它將發揮克倫威爾式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由美國、聯合王國和目前實際上已經流產的“歐洲大陸”貨幣聯盟即“歐元”組織所構成。

54. 我的朋友喬納森．滕能鮑姆（Jonathan Tennenbaum）明確指出，“只有婦女”才被排斥在與索爾維會議有關核裂變報導所使用的障眼法之外。結果正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主要的女科學家最先使有關鈾裂變的報導，使得這一障眼法不攻自破。

55. 權威資料顯示，自 1989-1991 年以來，盡管蘇聯科學家在弗爾納斯基于一九四〇年為斯大林制定的原子計劃的基礎上發展了核裂變武器技術，但蘇聯政府還是決定使用通過美－英－加聯盟渠道收集的信息技術來進行首次核試驗。之后，正如我所發現的那樣，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蘇聯核聚變計劃完全按照黎曼和弗爾納斯基的傳統進行。

56. 梅達里斯·馮·布朗（Medaris von Braun）等人估計，亨茨維爾計劃在蘇聯發射衛星之前就已經具備發射衛星的能力。一旦亨茨維爾計劃在空軍和海軍的一連串計劃失敗后得以恢復，那就表明一切都準備就緒，有必要在某一時刻暫時把它封存起來。這就好像由美－英－加聯盟操縱、違反美國憲法的對克林頓總統的彈劾程序一樣，是通過美國國會中共和黨人的渠道來進行的。因此，我們絕不可忽視肮臟的政治因素。這種肮臟的政治因素既存在于我們自己的政府當中，又存在于現代歷史的形成過程之中。

57.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與外交政策”（由“紐約外交關系理事會”安排出版）

58. 就后來成為六十年代“新左派”的撒旦聖經，請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戰略情報局和中央情報局元老赫爾伯特．馬庫斯（Herbert Marcuse）的“一維人類”一書。老費金馬庫斯的追隨者及其狡猾的騙子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他們都把自己稱為“科學數據庫狂熱分子”。通過馬庫斯的積極參與與安排，這些狂熱分子得到了麥克喬治．邦迪的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和贊助，構成了未來“氣象預報員”組織的雛形，其代表就是新郊區居民和具有“雙重正義”感的約翰．雅各布斯（John Jacobs）和馬克．拉德（Mark Rudd）。他們的特徵可以說是“三維的”。不過，他們所謂的“三維”和法國迪卡爾主義的“一維”并没有什么兩樣，都是倒行逆施的旁門左道，狂暴而充滿仇恨。

59. 這種教化形式對于我們今天抵制基督教道德觀念的普遍淪喪是十分重要的。在實際生活中，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教義是通過閱讀 << 新約 >> 的認知過程來加以體現的。讀 << 新約 >> 應該象閱讀經典科學著作一樣，在大腦認知能力的範圍內再現書中記載的實際的歷史環境和歷史事件。一個人必須具有一種參與感，就象對同時永恆和使徒行傳的認同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閱讀基督教經典著作時最具欺騙性的不單單是毫無根據的憑空捏造，而且還有對幾個世紀以來地中海地區使徒行傳的歷史貌似真實而實為附會的曲解。

60. 海因（H. Heine），“德國的宗教與哲學”第一版。

61. 世上總是有人熱衷于不斷地玩弄新的花招，可又老是喜歡制造一些個借口。實際上，這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危險就是由一些“相關秘密組織和機構”為了與首腦委員會公開表明的態度保持高度一致而發起的實實在在的攻擊。眼下，約旦國王寫給哈桑王子的那封著名的信與這種情形如出一轍。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有關秘密組織和機構”的行動才得以展開。首腦委員會科恩等人無耻的詭辯，在許多方面與戈爾副總統的個性—或曰没有個性—十分相似。因此，回顧一下戈爾與羅斯．佩羅特之間那場著名的“辯論”是十分有用的。佩羅特試圖把辯論引向一些有關的證據，而戈爾卻拒絕就此發表任何看法。他的辯解倒更象狂人獨白，根本不讓佩羅特有講話的機會。假如佩羅特對當時的形勢有足够的了解，那他就應該意識到與戈爾進行辯論的唯一方法就是當着他的面說他是撒謊者和瘋子，并且隨時準備就戈爾的謊言和瘋狂行為進行辯論。其實，佩羅特也知道這個實際的問題肯定會出現在辯論之中，但是他顯然没有勇氣把它說出來。因此，改變了一九九二年總統大選的佩羅特實際上是給戈爾攤販式瘋狂叫賣的伎倆擊敗而結束自己政治生涯，并就此從美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在有關生物化學武器的問題上，戈爾所特有的撒謊方式也得到了國防部長科恩的響應。

62. “右翼新左派的放浪形骸”就是所謂的“第三條出路”。因此，在阿道夫．希特勒上臺之前的著名的德國柏林電車司機大罷工期間，當地有大批的共產黨人和納粹分子每周一次地不斷交換着他們的成員資格。

63. 象羅斯．佩羅特和他的觀察員一樣，你已經看到了戈爾在他的行事方式失效時是怎樣不擇手段的。

64. 日本軍隊受命再次攻占印度支那，直到英國軍隊來接管，為法國收回并占領這個過去的殖民地做準備。英國人重新占領印度支那時，胡志明一直都是美國忠實的軍事和政治盟友。自一九四六年以來，美國就在英國的授意下為了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而不斷的背叛印度支那盟友，這與以后 1965-1975 年戰爭期間各方面的特徵均有着很大的關系。

65. 正如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博士指出的那樣，麥克納馬拉中間的那個名字 Strange（奇怪）的確很奇怪。也許有人會說：“上帝做事的方式有時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66. 相反，約翰遜當局作出的反應要有多糟就有多糟，可以說與現實要求背道而馳。約翰遜政府并不是利用現有的太空發展計劃來刺激生產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基于國家稅收的經濟增長，而是給 1966-1967 年的太空技術發展的各個方面釜底抽薪，代之以病態的“偉大社會”這樣的傻事。

67. 誠然，撒切爾首相并没有帶領聯合王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在牧人把牛群趕進屠宰場之后，他本人卻謹慎地呆在外面。也許撒切爾的確渾然不知，但她手下的那些幫手們卻并非如此不知情。

68. 電視劇“Lurch”中對愛丁堡公爵的刻畫。

69. 詹姆士．里森（James Risen），“戈爾拒絕承認中情局有關俄羅斯腐敗案中的證據”，“紐約時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0. 參見米歇爾．斯坦柏格（Michele Steinberg）的“掠奪俄羅斯：打開戈爾彈劾案文件的時刻”一文，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的（EIR）。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戈爾－切爾諾梅爾金委員會在美國舉行的會議結束之后，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就解除了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和第一副總理阿納托里．邱巴伊斯（Anatoli.Chubais）的職務。根據西歐一些高層人士提供的信息，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的突然垮臺似乎與葉利欽總統風聞切爾諾梅爾金想盡早取代自己的計劃有關。而這項計劃正是在切爾諾梅爾金與戈爾舉行的會議上提出來進行討論的。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葉利欽與邱巴伊斯在莫斯科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會議的記載證實了針對俄羅斯國家財富而進行的內部交易等等腐敗問題已經到了公諸于世的時候。一直以來，戈爾都是通過舊金山的一家名為“Golden ADA”的公司與邱巴伊斯和切爾諾梅爾金取得聯系的。而根據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的 <<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 >> 的報導，這家公司曾于一九九五年的晚些時候因盜竊俄羅斯政府的財產而一度遭到查封。

71. 這次會議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召開，由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和俄羅斯自由經濟學會和席勒科學文化學會主辦。參見“俄羅斯、美國和全球危機”，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EIR）。

72. 來布尼茲創建的微積分學為“后來的數學家”開普勒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開普勒通過測量證明了火星的軌道不是圓形，而是橢圓形的。這一發現證明，整個太陽系都是在基于火星橢圓形軌道的原則上形成的。由此，開普勒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數理方面的問題，即怎樣才能通過觀察行星運行軌道一些小區間不斷變化的曲率來確定天體整個運行過程的軌迹。后來，高斯曾經用同樣的方法來確定谷神星（最早發現的最大的小行星，在火星和土星之間）的軌道。因此，來布尼茲的微積分學是在微商非綫形概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全然不同于牛頓等人試圖用簡單的無窮極數復述來布尼茲微積分的方法，也全然不同于奧古斯丁．考奇試圖通過他的“考奇分數”使來布尼茲的微積分適應于綫性的迪卡爾簇的方法。來布尼茲的這一發現為高斯－黎曼的多連通簇（即非綫性功能）的超級幾何學奠定了基礎。參見黎曼一八五四年撰寫的學位論文。

73. 美國迫切需要這種變革。然而，一些眼光狹小的人卻是“為了芝麻丟西瓜”。美國過去也曾試圖建立這樣的運輸系統，但最終還是放弃了。目前日本和烏克蘭已經在設計類似的運輸系統。

74. 每小時 300 英里的速度標準也許是令人難忘的，但地下管道式封閉列車的超音速冲壓噴氣發動機卻能使速度達到更高的馬赫數。這種管道式封閉列車將成為下個世紀月球工業和火星殖民地的必需品。越來越多的太空應用技術將體現在地球及其周邊環境的運用上。

75. 一九八二年秋，愛德華．特勒發表聲明公開支持這項政策，并把它稱為一項實現“人類共同目標”的政策。這一論斷今天仍舊適用。

76. 林登·拉魯旭，“印度洋盆地五十年發展策略”，（EIR）專題報導，一九八三年。

77. “我們不滿意的冬天”，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電視廣播，這包括拉魯旭在柏林 Kempinski-Bristol 飯店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全文發表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EIR）上。

78. 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的（EIR）社論“歐洲發展三角”；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EIR）的文章“巴黎－柏林－維也納：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一九九〇年三月二日（EIR）的文章“歐洲經濟快速增長的拉魯旭計劃”。這最后一篇是在一九九〇年二月十日至十一日巴黎席勒學會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會上，黑爾加·澤普－拉魯旭概括論述了生產性三角怎樣促使歐洲大陸各個區域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繁榮。一九九〇年，（EIR）還就生產性三角的問題用德語發表過一篇報告。

79. 參見喬納森·騰能鮑姆，“歐亞基礎設施建設聯盟：世界和平的關鍵”，發表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七日的（EIR）上。